

分类号\_\_\_\_\_

密级\_\_\_\_\_

UDC \_\_\_\_\_

编号\_\_\_\_\_

華中師範大學  
硕士学位论文

清代洛阳城市地理研究

学位申请人姓名: 张乐锋

申请学位学生类别: 全日制硕士

申请学位学科专业: 历史地理学

指导教师姓名: 张全明 教授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

  
Y2557523

# 硕士学位论文

## 清代洛阳城市地理研究

论文作者：张乐锋

指导教师：张全明 教授

学科专业：历史地理学

研究方向：中国历史地理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4年5月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

---

# **A Research on City Geography of LuoYa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M.A Degree in History*

**By**

**Zhang Lefeng**

**Postgraduate Program**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upervisor: Zhang Quanming

Academic Title: Professor

Signature 

Approved

May, 2014



## 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中已经标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日期：2014年6月2日

### 学位论文授权使用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华中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华中师范大学。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允许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保密论文注释：本学位论文属于保密，在 \_\_\_\_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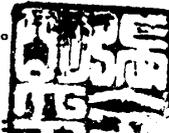
非保密论文注释：本学位论文不属于保密范围，适用本授权书。

作者签名：

日期：2014年6月2日

导师签名：

日期：2014年6月2日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CALIS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发布章程”，同意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CALIS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全文发布，并可按“章程”中的规定享受相关权益。同意论文提交后滞后：半年；一年；立即发布

作者签名：

日期：2014年6月2日

导师签名：

日期：2014年6月3日







## 摘 要

清代洛阳城，随着北方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在历史传统、区域环境和国家制度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不同以往的城市空间格局。对清代洛阳城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清洛阳城市发展的脉络，而且对于传统社会末期内陆地方城市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本文主要利用历史文献材料，结合实地调查，尽可能准确地复原清代洛阳城的空间格局及其变迁过程，并探讨其分布规律与形成原因。

本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清代洛阳城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地理背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洛阳盆地环境进行考察，分析区域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清代洛阳城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区域的视角来审视清代的洛阳城。

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清代洛阳城政治空间与城池防御结构的空间组合及变迁状况。通过分析府、县衙及其附属机构的分布变迁过程，揭示礼制、经济等因素对洛阳城政治空间格局的影响，进而分析城池结构与城区地势在军事防御和防洪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清代洛阳城的街道格局与商贸空间分布。运用地名学的方法对城区街道的结构和规模进行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定期集市、店铺、庙会，以及沿交通干线布局的城郊市镇的发展演变与空间组合状况。

第四部分在考察清代洛阳城市人口规模及分布的基础上，探讨文化空间的分布格局及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清代洛阳城人口规模和居民空间分布结构，考察学校、祠庙等文化设施，在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传统影响下的分布、变迁，及西关信仰中心的形成机制。

第五部分主要探讨清代洛阳城空间格局的变迁过程及原因，分析其演变特点，并判定其在清代河南地区城市中的地位。

**关键词：**清代；洛阳；城市地理；空间布局



## Abstract

Luoyang City was formed a pattern of urban spac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historical traditions, regional and national environmental system, in Qing Dynasty . Study of Luoyang City in Qing Dynasty, not only help clarify the context of urban development, but also has positive influence in the study of cities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In this paper, the use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materials, combined with field work, as accurately as possible to recover spatial pattern and change process of Luoyang city, and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and causes in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focuses on the existence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for Luoyang City. From the aspects of Luoyang basin environment to inspect, analyz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region natural and human geography environmental rising from the Luoyang city in the Qing Dynasty, with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o look at the city of Luoyang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the composition and spatial changes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Luoyang city space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defenses cultures. By analyzing the government,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ounty government and its subsidiary bodies change process, reveal the impact of ritu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city of Luoyang, and then analyzes the structure of city and urban terrain in military defense and flood control.

The third part focuses on the commercial street pattern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uoyang City in the Qing Dynasty. Top only my use methods on the structure and size of city streets statistics, analysis on this basi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the situation on a regular basis with a combination of market space, shops, festivals, as well as suburban towns along the transportation routes layout.

The fourth part in the study popul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uoyang city in the Q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cultur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the environment. By analyz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Luoyang City in the Qing Dynasty, population siz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visit schools, shrines and other cultural facilities, located in the state system and the traditional influence of the local community, change, and religious center of the West off.

The fifth part focuses on change proces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Luoyang City in Qing Dynasty, Henan indicate its position in the regional cities of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Luoyang City; Urban Geography; Spatial Layout



##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绪 论.....	1
(一) 选题意义.....	1
(二) 时空界定.....	2
(三) 学术回顾.....	2
(四) 资料来源、研究方法和目标.....	9
一、清代洛阳城发展的地理基础.....	10
(一) 自然地理基础.....	10
1. 地形地貌.....	10
2. 河流.....	11
3. 气候.....	12
4. 自然灾害.....	13
(二) 人文地理环境.....	15
1. 政区沿革.....	15
2. 人口和民族状况.....	16
3. 交通条件.....	18
4. 经济状况.....	19
5. 城址迁移.....	20
小 结.....	22
二、清代洛阳的政治空间与城防结构.....	23
(一) 清代洛阳城政治空间格局及其演变.....	23
1. 府级行政机构的分布与变迁.....	23
2. 县级行政机构分布与变迁.....	24
3. 府、县署位置关系及其意义.....	26
(二) 清代洛阳城的军事防御体系.....	26
1. 清中前期城墙修建与规模.....	26
2. 关城.....	29
3. 军事设置.....	31



(三) 清代洛阳城的防洪体系.....	32
1. 地势与城墙 .....	33
2. 沿河堤坝 .....	35
3. 坑塘 .....	38
小 结.....	40
三、清代洛阳城街巷格局与商贸空间.....	41
(一) 清代洛阳城内街巷分布格局.....	41
1. 街巷结构与微观地貌 .....	41
2. 街巷规模和名称 .....	44
(二) 清代洛阳城外街巷分布格局.....	48
1. 四关街道结构 .....	49
2. 桥梁 .....	51
3. 渡口 .....	53
(三) 清代洛阳城的商贸空间.....	53
1. 集与商贸街区 .....	53
2. 庙会 .....	56
3. 会馆 .....	58
4. 市镇 .....	59
小 结.....	62
四、清代洛阳城的居住与文化空间.....	63
(一) 清代洛阳城居住区分布格局.....	63
1. 里坊格局 .....	63
2. 人口规模 .....	64
3. 居民结构 .....	66
4. 民居类型 .....	67
(二) 清代洛阳城教育机构的设置.....	70
1. 府、县学 .....	71
2. 书院 .....	73
3. 经学 .....	76
4. 新式学校 .....	77
(三) 清代洛阳城信仰空间格局.....	78
1. 祠庙分布与集聚 .....	79



---

2. 寺观.....	88
3. 坊表.....	91
4. 教堂.....	92
小 结.....	94
<b>五、清代洛阳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与特点.....</b>	<b>95</b>
(一) 清代洛阳城空间格局的发展变迁.....	95
1. 城市功能分区的变迁.....	95
2. 城乡空间格局.....	97
(二) 清代洛阳城的性质与特点.....	99
1. 中原文教重镇.....	99
2. 中原宗教重镇.....	100
3. 中原商贸重镇.....	101
小 结.....	102
余 论.....	103
参考文献.....	105
后 记.....	112



## 图表目录

图 1.1 伊洛河水系图·····	12
图 1.2 清代河南府政区图·····	15
图 1.3 洛阳城址迁移图·····	21
表 2.1 清代河南府、州城池規制情况表·····	27
图 2.1 清代洛阳城关全图·····	30
图 2.2 清代洛阳城坑塘与水流分布图·····	39
图 3.1 清代洛阳城区街道格局图·····	42
表 3.1 清代洛阳城主要道路概况表·····	44
图 3.2 清代洛阳城四关街道格局图·····	49
表 3.2 洛阳城主要庙会时间表·····	56
图 3.3 清代洛阳地区城镇分布图·····	60
图 4.1 史家大院布局图·····	69
图 4.2 清代洛阳城教育机构分布图·····	74
表 4.2 清代洛阳城坛庙分布表·····	80
图 4.3 清代洛阳城关祠庙分布图·····	83
表 4.3 清代洛阳城区寺观情况表·····	88
表 4.4 清代洛阳城寺观祠庙分类表·····	90
图 4.4 清代洛阳城区寺观、教堂分布图·····	93



## 绪 论

### （一）选题意义

洛阳作为七大古都之一，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都为人们所关注。近年来，日本学者提出了“洛阳学”的概念，以期能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关注和研究洛阳，为诠释历史提供新的思路。<sup>①</sup> 洛阳城作为“洛阳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在唐朝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外移，尤其是北宋以后，地位一落千丈，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相关研究亦是如此，从华夏文明起源至北宋时期的西京，有关洛阳城的各项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与之相比，宋代以后的洛阳城似乎被人们所遗忘，深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清代作为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过渡时期，在商品经济发展和西方影响逐渐加深的情况下，各类型的城市皆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尽管洛阳城被视为“衰落”城市的代表之一，但是作为地方社会活动的中心，其发展演变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对当时社会变迁的反映。因此，对处于传统社会后期和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的，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清代洛阳城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1. 通过梳理洛阳城从“都城”到“府城”的演变，揭示清代洛阳城的城市面貌，丰富传统社会后期地方城市的研究

洛阳作为中国古代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唐代以后开始衰落，但作为城市的洛阳城依然存在，仍不失为一个重要地区性中心城市。研究清代的洛阳城，把握其从“都城”到“府城”，进而缓慢开启近代化的演变轨迹，是洛阳城市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样，清代洛阳城失去了作为政治中心的各项优越条件，并不意味着其区位优势就此全无。位于东西、南北大道交汇，“天地之中”的位置，加之伊洛河平原为腹地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洛阳的城市空间结构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中国地方城市众多，各地区自然、人文状况差异，不同区域的地方城市具有不同特点。因经济发展程度和材料等方面的限制，目前有关地方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南、华南地区，中原地区的研究较为缺乏，对清代洛阳城市地理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地区研究的不足，并为全面认识明清城市整体风貌提供实证案例。

<sup>①</sup> (日)气贺泽保规：《“洛阳学”在日本诞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2日第13版。



## 2. 推动“老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改造

作为至今唯一保存下来的洛阳古代城市建筑，明清洛阳城（老城）保存有比较完整的清代的街道系统和数量可观的寺庙、民居等建筑物，以及这些建筑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通过分析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演变过程，考察其原因，探讨清代洛阳城市社会风貌，为老城历史街区的改造和开发，提供认识基础和背景材料，推动洛阳城市建设和发展。

## （二）时空界定

### 1. 时间范围

本文将有关洛阳城的研究置于清代二百多年的时间范围内，但不局限在清代，因相关问题论述的需要，适当上溯到明，下延至民国时期，以说明问题为要务。

### 2. 空间范围

城市地理的研究，必定以城市为对象，而有关城市空间范围的解释种类繁多，尤其中国古代治所城市，都有高耸的城墙作为标志，而单纯物理空间的划分实际上割裂了城市的社会空间，且古代城市中许多都有城下街区的存在。因此本文所论述的对象不仅为城墙以内的洛阳，还包括周边关城及其郊区相关的附属设施。

## （三）学术回顾

### 1. 城市历史地理理论研究

中国古代从都城到县城、市镇，有着数量巨大、内涵丰富的各类城市，这为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城市历史地理学逐渐发展，并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侯仁之先生作为我国城市历史地理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其《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和城市规划》<sup>①</sup>从城址起源和演变、城市面貌的形成和特征、城市位置的转移及其规律以及地区开发和城市兴衰的地理因素等几个方面对城市历史地理提出了诸多建议。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sup>②</sup>中对于汉水流域历史时期城市地理的发展演变，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府、县级城市的研究和有关唐宋以来中国城市变革的思考，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城

<sup>①</sup> 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和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

<sup>②</sup> 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版。



墙内的城市?——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sup>①</sup>认为中国古代有许多治所城市都存在有“城下街区”,甚至有的城市城下街区的规模要大于城内,使得笔者意识到城下街区在城市地理研究中的重要性。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sup>②</sup>在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之后,指出了研究地方城市 and 运用要素分析法开展研究的必要性,对于本文进行城市结构分析具有启发意义。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sup>③</sup>中城市部分的研究以个案的形式,论述了杭州城形成发展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过程,对杭州城的街道、城市轴线、宫殿区、官署区、居住区、军事区、居住区、文教区、商贸区的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尤其是结合运河等交通线路对城内外商贸区的分布和职能的分析,从而对整个杭州城的城市生态有了有机的把握;将宁波城置于区域内的交通联系和城乡互动中进行考察,来阐释宁波城市发展的区域特征。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体系的形成及意义》<sup>④</sup>通过考察明清时期城乡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结合施坚雅的分层模式,提出了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市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使得市场层级划分简化,有利于对城乡市场体系的研究。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sup>⑤</sup>从环境交通、赋役区划、民间信仰、主佃关系诸角度较全面地审视了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的关系。这些研究对从区域和城乡视角考察洛阳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城市是人类活动的中心,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城市中有其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活动空间,城市除了其物质形态之外,还有着重要的社会空间形态。王均、祝功武《清末民初北京城社会空间的初步研究》<sup>⑥</sup>指出在北京近代化过程中,因社会结构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导致了城市社会空间出现相应的变化。张晓虹等人《南宋临安节日活动的时空结构特征》<sup>⑦</sup>依据文献材料,利用功能分区法和时间地理学的方法对临安城的居民生活空间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sup>⑧</sup>从宫城、里坊、市场对都城时代的洛阳城市社会空间进行研究。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sup>⑨</sup>从权威和祭祀两种建筑的角度对北宋

<sup>①</sup> 鲁西奇、马剑:《城墙内的城市?——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

<sup>②</sup> 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sup>③</sup> (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sup>④</sup> 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sup>⑤</sup> 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sup>⑥</sup> 王均、祝功武:《清末民初北京城社会空间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9年第1期。

<sup>⑦</sup> 张晓虹等:《南宋临安节日活动的时空结构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辑。

<sup>⑧</sup> 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sup>⑨</sup> (日)久保田和男著、郭万平译:《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开封都城地位的确立与演变进行探讨。刘凤先的《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sup>①</sup>及其一系列论文，从文化视角对明清城市的各种类型建筑的空间布局进行分析。以上研究使得笔者认识到城市地理研究中社会文化空间的重要性。

## 2. 有关清代地方城市的研究

明清时期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末期，商品经济、地方势力、西方因素等一些新变化，使得此一时期的城市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并且，现在的许多城市都是在这一时期城市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的。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sup>②</sup>、《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sup>③</sup>对明清时期的城市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本书由多位作者合作完成，对于城市形态、内部结构、社会空间、城乡关系、社会流动、城市分区研究等研究手段，尤其是运用“核心——边缘”理论对于城市的研究，被此后的学者广泛应用于城市研究中，至今仍是国内城市研究的一种主流方法。史红帅《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历史地理研究》<sup>④</sup>对“后都城时代”的西安城市地理进行了研究，正是作者对于“后都城时代”这一概念的阐述，才使得笔者开始思考明清时期的洛阳城。作者对明清时期西安城的空间布局、水利设施、文教空间、商贸区的研究，没有仅仅局限在城墙内，而是将西安城与其周边地区结合进行考察，更加说明了西安城的各项布局形成的原因和特点，此外强调了政治作用——明代秦王府和清代满城的修建对于西安城市的影响，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sup>⑤</sup>对整个黄土高原地区的从省城到市镇的空间布局、等级规模结构、城镇职能、交通线路分布、商业地理等情况做了系统的分析梳理，其中涉及到了位于黄土高原边缘地区的洛阳城。其另一著作《城镇文化与景观——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文化的地理学考察》<sup>⑥</sup>运用地理学的方法对清代黄土高原地区的书院时空分布情况和选址原则、先贤祭祀、工商业、岁时节日文化等景观的时空特征做了全面的考察，有别于以往城市地理研究中只注重物质形态的时空特征，突出了城市的社会文化空间特征，此书对于洛阳城的书院历史发展脉络和时空分布，清代洛阳城的商业情况的论述，具有借鉴意义。成一农《清代的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sup>⑦</sup>通过对清代不同等级城市的城墙周长的统计，发现城墙周长与城市规模之间的相关性较弱，城市规模受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作者的这一研究和斯波义信先生的研究相结合，使

<sup>①</sup> 刘凤先：《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sup>②</sup> (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sup>③</sup> (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sup>④</sup> 史红帅：《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sup>⑤</sup> 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sup>⑥</sup> 刘景纯：《城镇文化与景观——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文化的地理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sup>⑦</sup> 成一农：《清代的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



得笔者意识到除物质形态之外，要重视城墙所代表的深层的社会意义，并进行一定的对比研究以更好的说明问题。城市，作为不同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一些相关学科的成果，能提供宝贵的思路。李炎《南阳古城演变与清“梅花城”研究》<sup>①</sup>从区域的视角对南阳的古城选址、明清之前城市发展历程和原因、空间形态，以及清代出于防御需要的“梅花城”的组成体系、空间结构和城市建筑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从城市营建史的角度对南阳进行研究，对于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为与南阳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洛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此外，以个案研究形式的城市历史地理的学位论文，也有不少，这些成果都为有关洛阳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如吴鹏飞《韩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sup>②</sup>、周会娟《明清时期桂林城若干历史地理问题研究》<sup>③</sup>、张伟龙《明清东莞城镇地理初步研究》<sup>④</sup>、叶丽芳《明清安康城市地理研究》<sup>⑤</sup>均选取不同区域条件下具有不同特色的地方城市，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 3. 有关清代洛阳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

李振刚、郑贞富编著的《洛阳通史》<sup>⑥</sup>是第一部分关于洛阳的城市史，书中关于明清时期分封到洛阳的藩王、发生在洛阳地区的重要战争、洛阳地区的经济状况、庙会、学术文化、教育、世家和方志修纂情况有比较全面的叙述。《河洛文化研究》<sup>⑦</sup>从河洛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不仅对河洛文化研究上存在的一些理论和基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对河洛文化进行了梳理，其中对明清时期河洛地区的社会各方面状况有比较清晰的论述。

黄以柱《河洛地区历史经济地理简论》<sup>⑧</sup>对相当于明清时期河南府和陕州管辖范围地区历史时期的各种资源开发、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其中关于明清时期该地区的经济情况的论述对于认识明清洛阳的腹地状况有重要的意义。陈铮《清代前期河南农业生产述略》<sup>⑨</sup>从耕地面积、农作物品种和耕作技术三个方面论证了清代前期河南农业的发展情况，同时也指出了生产技术落后等问题。马雪芹《明清河南农业地理》<sup>⑩</sup>对明清时期河南地区农业发展状况进行了整体性的

<sup>①</sup> 李炎：《南阳古城演变与清“梅花城”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

<sup>②</sup> 吴鹏飞：《韩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sup>③</sup> 周会娟：《明清时期桂林城若干历史地理问题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sup>④</sup> 张伟龙：《明清东莞城镇地理初步研究》，暨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sup>⑤</sup> 叶丽芳：《明清安康城市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sup>⑥</sup> 李振刚、郑贞富：《洛阳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sup>⑦</sup> 薛瑞泽、许智银：《河洛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sup>⑧</sup> 黄以柱：《河洛地区历史经济地理简论》，《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

<sup>⑨</sup> 陈铮：《清代前期河南农业生产述略》，《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sup>⑩</sup> 马雪芹：《明清河南农业地理》，台湾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



分析。王兴亚《清代河南集市贸易及其作用》<sup>①</sup>，邓玉娜《清代河南集市的发展特征》<sup>②</sup>等文章对清代河南地区的乡村集市的分布特征、交易商品种类、发展阶段，影响因素及作用，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其中不少关于豫西地区的论述，有助于把握清代洛阳腹地的乡镇贸易体系。宋仑、李刚《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sup>③</sup>通过对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论述了其在河南建设会馆的基本情况，其中也对洛阳所处的交通区位和市场状况有所说明，有助于认识明清时期洛阳地区的商贸情况。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sup>④</sup>利用现存于洛阳民俗博物馆的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中关于商户和捐款数额的记载，推断出清代中叶洛阳的商业发展情况。碑刻中出现的大量店铺名称，对于研究当时洛阳城内的商贸空间分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本文也对清代洛阳与周边地区的贸易状况有比较全面的说明。黄以柱《河南城镇历史地理初探》<sup>⑤</sup>探讨了今河南省范围内城镇发生、发展的条件和特点，以及城镇历史地理演变的大致过程。田冰《试论明清时期河南城镇发展的特点》<sup>⑥</sup>对明清时期河南城镇的发展情况做了论述，指出由于战乱、自然灾害及自身等因素使得河南城镇的发展落后于江南地区。张民服、张鹏伟《清代中原商路与城镇的发展》<sup>⑦</sup>将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根据各地不同的交通组合状况，分为水路、陆路、水陆兼备情况，分类论述了不同类型城镇的发展特征及其对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带动作用。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洛阳风俗琐录》<sup>⑧</sup>对民国初年洛阳城市风貌、礼俗、庙会、岁时节日等进行了整体性的描述。王兴亚、马怀云《明清河南庙会研究》<sup>⑨</sup>对明清时期河南地区的庙会分布、会期、组织管理、商品贸易、文化娱乐和作用等进行论述，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河南庙会情况。《庙会与中国文化》<sup>⑩</sup>对中国庙会的形成原因、发展状况、种类特征、不同地区的庙会分布以及各地区的特色庙会都有全面的论述，其中对洛阳庙会群做了介绍，并着重对关林、白马寺和龙门等洛阳三大庙会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户华为《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明清洛阳地区社会变迁与

<sup>①</sup> 王兴亚：《清代河南集市贸易及其作用》，《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sup>②</sup> 邓玉娜：《清代河南集市的发展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sup>③</sup> 宋仑、李刚：《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sup>④</sup> 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sup>⑤</sup> 黄以柱：《河南城镇历史地理初探》，《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

<sup>⑥</sup> 田冰：《试论明清时期河南城镇发展的特点》，《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

<sup>⑦</sup> 张民服、张鹏伟：《清代中原商路与城镇的发展》，《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sup>⑧</sup>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sup>⑨</sup> 王兴亚、马怀云：《明清河南庙会研究》，《天中学刊》，1995年第1、2期。

<sup>⑩</sup> 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士绅的应对》<sup>①</sup>以区域社会史的视角，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明初洛阳的恢复与移民社会格局、士绅与明中后期地方文化建构及明清之际社会危机的应对、清代洛阳社会变迁与权力格局等几个方面对明清时期的洛阳地方社会进行探讨，文中关于此时期洛阳社会状况的整体研究，尤其是士绅采取的参与公共建设、地方教育以及结社等活动的论述，对于明清洛阳城市地理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洛阳关林志》<sup>②</sup>等书对关林庙的历史沿革、历代修建、庙会形成的原因、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以及庙内的建筑、碑刻等内容都有比较全面的介绍。户华为《关林之祀与明清洛阳社会的变迁——以关林碑刻为中心的考察》<sup>③</sup>、韩维鹏《明清时期洛阳关林庙会研究》<sup>④</sup>主要利用现存于洛阳关林庙内的碑刻材料，研究对洛阳地区影响最大的，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社会教化、商业贸易等功能为一体的关林庙会，揭示推动关林庙会形成、管理关庙会和参与其中的不同群体，来反映明清时期洛阳地区的社会变化状况。《白马寺》<sup>⑤</sup>从白马寺的兴建与历史沿革、高僧与庙会文化、寺院建筑工艺文化等几个方面对千年古刹白马寺做了系统的介绍，其中关于白马寺庙会的种类、会期、内容和特色有详细的说明。

曹树基明清人口史研究论著中“城市人口”部分为计算清代洛阳城市人口提供了很好的指导。胡云生《洛阳瀍河区的回回民族》<sup>⑥</sup>对洛阳地区回族的来源分布、经济、宗教和文化教育等状况做了论述。吉素丽《论基督教在近代洛阳的传播》<sup>⑦</sup>对基督教不同教派在洛阳地区的传教活动、教堂建设、社会慈善事业等进行了考察。这些关于中原地区城镇的论述，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洛阳地区的内容，而且为洛阳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社会经济背景。

#### 4. 有关清代洛阳城市的研究

李健人的《洛阳古今谈》<sup>⑧</sup>为民国年间私人编修的洛阳地方志，对明清时期的许多情况多有记载，但也有不少错讹。倪锡英《洛阳》<sup>⑨</sup>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都市地理小丛书”之一，对洛阳当时的形势、古迹名胜、城乡生活等做了比较清晰的描述。《古都洛阳》<sup>⑩</sup>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结合考古研究成果，对洛阳的自然环境、

<sup>①</sup> 户华为：《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明清洛阳地区社会变迁与士绅的应对》，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sup>②</sup> 郭挺彩：《洛阳关林志》，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sup>③</sup> 户华为：《关林之祀与明清洛阳社会的变迁——以关林碑刻为中心的考察》，《中州学刊》，2008年第6期。

<sup>④</sup> 韩维鹏：《明清时期洛阳关林庙会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sup>⑤</sup> 栾舒莉：《白马寺》，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sup>⑥</sup> 胡云生：《洛阳瀍河区的回回民族》，《回族研究》，1994年第2期。

<sup>⑦</sup> 吉素丽：《论基督教在近代洛阳的传播》，《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sup>⑧</sup> 李健人：《洛阳古今谈》，洛阳史学研究所1936年。

<sup>⑨</sup>（民）倪锡英：《洛阳》，南京出版社2012年版。

<sup>⑩</sup> 吴迪：《古都洛阳》，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



历史发展和名胜古迹等,做了全面详实的介绍。陈代光《洛阳历史地理研究》<sup>①</sup>对自周代至近代的洛阳城市发展状况做了梳理,并分析了不同时期洛阳城市发展的特点和原因,指出未来洛阳城市发展的方向。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sup>②</sup>对洛阳所处的伊洛河盆地及周边的山川形势进行分析,并根据考古发现的历代洛阳都城城址,指出洛阳城由东向西,从伊洛河交汇处低地逐渐向西部相对高亢的地区迁移,是为了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并强调要考虑影响城市选址的诸多因素。王巨《谷水与洛阳诸城址关系初探》<sup>③</sup>利用考古发现,确定了谷水的位置和走向,并指出其与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和金明洛阳城诸城址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谷水与明代洛阳城北墙位置关系的判断,有助于理解明清时期洛阳城的城墙走向、城市形态和水系等问题。赵方方《明清洛阳城市空间结构研究》<sup>④</sup>利用清代洛阳方志,对洛阳城的政治、宗教文化、经济和街道等做了大致的梳理,但关于具体城市空间形成的过程、原因,与具体城市所处区域环境的关系等缺乏深入分析。丁一平《空间的变奏:洛阳城市空间的社会转型》<sup>⑤</sup>以城市史为线索,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对建国初期洛阳工业建设造成的城市空间与社会生活变化做了系统论述,并将老城与新兴工业区进行对比研究,以说明不同生产方式形成的不同城市面貌。《洛阳历代城池建设》<sup>⑥</sup>对历代洛阳城的建设历史、规模和城市形态做了全面的介绍,并且附有珍贵的城池图。《洛阳市地理志》<sup>⑦</sup>对洛阳地区的行政建置沿革、城池要地,尤其是地名部分关于老城街道长宽、名称由来及演变有系统的整理,对复原清代洛阳城的街道结构和规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洛阳市交通志》<sup>⑧</sup>对洛阳地区自古以来的交通道路、桥梁和运输工具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对明清时期的水路交通,以及洛阳城南关地区的交通、商贸情况有所介绍。《洛阳建筑志》<sup>⑨</sup>介绍了历史时期洛阳地区的主要建筑,对明清时期的城池、街道、军事、民居等各种建筑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保存了大量有关明清时期洛阳城的材料。

<sup>①</sup> 陈代光:《洛阳历史地理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1988年第1期。

<sup>②</sup> 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

<sup>③</sup> 王巨:《谷水与洛阳诸城址关系初探》,《考古》,2011年第10期。

<sup>④</sup> 赵方方:《明清洛阳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国名城》,2013年第1期。

<sup>⑤</sup> 丁一平:《空间的变奏:洛阳城市空间的社会转型》,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

<sup>⑥</sup> 崔静一、冷文:《洛阳历代城池建设》,洛阳市地方志编委1985年版。

<sup>⑦</sup> 洛阳市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地理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sup>⑧</sup> 洛阳市交通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交通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sup>⑨</sup> 洛阳市建筑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建筑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 (四) 资料来源、研究方法和目标

### 1. 资料来源

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涉及城市的诸多方面，内容颇为繁杂，而历史文献记载内容侧重不同，因此需要综合各种材料，方能进行相关分析。本文主要采用以下材料：

#### (1) 方志

研究明清时期城市，方志是最主要的材料之一。清代洛阳有时间序列较为完整的方志记载，方志中沿革、建置志、文艺志、五行志、古迹志等部分保存有大量的相关记载。现存诸志中，乾隆《洛阳县志》质量最高，以后各志多沿袭此志，仅随时间变化，在内容上有所增补。

建国以后，洛阳新编的各类方志繁多，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材料和非常有价值的统计材料，尤《洛阳地名志》、《洛阳文物志》、《洛阳市地理志》最为重要。

#### (2) 地图

地图是对相关地理事物最直接与形象的反映，清代《河南府志》、《洛阳县志》中有关城池、寺观等的地图具有极大的价值。民国时期经过实测的洛阳城市平面图有利于精确和全面反映洛阳城空间格局状况。

#### (3) 文史资料

洛阳市、老城区两级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涉及到清代洛阳城的街道变迁、社会习俗、城墙建设等内容，对反映清代以来洛阳城市面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2. 研究方法

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涉及到历史学、地理学、城市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并且需要利用区域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丰富多样。

本文主要利用下列几种方法：(1) 历史文献方法，明清时期洛阳地区的方志保存的比较完整，其中有关于洛阳城市的丰富资料，近年洛阳市出版的新地方志也收集了一部分明清时期的材料，为本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2) 实地调查方法，清代洛阳城的部分街道和一些建筑保存至今，通过实地调查能够补充文字材料的不足；

(3) 利用民国年间的实测洛阳城图，将各项地理要素呈现于图上，以进一步分析和展现相关成果。

### 3. 研究目标

(1) 清代洛阳城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分区；(2) 微观地貌与洛阳城市空间格局的关系；(3) 历史传统因素和腹地环境状况对清代洛阳城空间格局的影响。



## 一、清代洛阳城发展的地理基础

城市,作为一种物质实体存在,其选址和布局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制约。洛阳处于“天下之中”,建城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在传统社会前中期,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的洛阳城虽退去了种种光环,但城市所处自然环境大势没有太大的变化,且交通区位优势依旧明显,城市发展仍具有比较好的地理环境基础。

### (一) 自然地理基础

#### 1. 地形地貌

洛阳所处的豫西地区位于我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地表起伏大,地势西高东低,西部以山地为主,是秦岭山系的东延部分,主要有崤山、熊耳山、外方山和伏牛山,呈爪状分布。豫西地区为黄土高原东南边缘地带,黄土地貌发育完好,处于西南部山地与北部黄河之间,为由西向东延伸,长达近400千米的黄土丘陵。因本地区开发历史悠久,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严重,流水侵蚀剧烈,南北走向向谷发育完整,黄土丘陵地带呈沟梁相间形态。爪状山脉之间是河流侵蚀形成的山谷,每条较大河流又都与一些山涧盆地相通,如洛宁盆地、宜阳盆地、洛阳盆地等,其中以洛阳盆地面积最大。<sup>①</sup>洛阳盆地北依邙岭,南望伊阙,西接秦岭,中部和东部为伊洛河冲积平原,构成一个三面丘陵环抱西高东低的簸箕状开口盆地地形。洛阳位于伊洛河冲积平原的北缘部分,四周皆有山体环绕,“河南郡背负北邙,前对伊阙,阙外为三塗,阙东连嵩岳,阙西连宜阳山,而郡城西又有周山,凡河南郡山皆与五山相连”<sup>②</sup>。

洛阳城区位于伊洛河河谷中部沉降堆积平原的二级阶地,地势西高东低,整体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较为平坦。城区整体高程在海拔130—170米之间,城区南部靠近洛河的前缘部分高出一级阶地3—20米,且与一级阶地接触线的区分并不明显。一级阶地在洛河沿岸地带不连续分布,与河漫滩高差甚小,河漫滩一般高出枯水位1—3米。<sup>③</sup>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有利于城市的建设和取水,并在一定程度上起

<sup>①</sup> 李永文等:《河南地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8、209页。

<sup>②</sup> (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七,《山川志一》,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③</sup> 郭建民、郑金亮:《伊洛河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到减轻水患的作用；但是随着伊洛河上游山区开发的加剧，下游河段河床淤积严重，水位不断抬升，夏秋季节，洪水水位往往超过一级阶地的高程，越过南关地区，延及城墙附近，使得城市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

## 2.河流<sup>①</sup>

洛阳城周边以洛河为主干，伊、瀍、涧三河为分支，从南、东、西三面围绕洛阳城，构成洛阳城城区的基本范围，四条河流间的差异较为显著。洛河为本区最大河流，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东西向横贯其间，先后经卢氏、洛宁、宜阳，至马赵营入洛阳辖境，南迳城南二里，再经白马寺至偃师县之杨树村，与伊河相会，后经巩义神堤入黄河。全长约 440 公里，流域面积近 1.2 万平方公里。洛阳境内的洛河河床纵坡降大于千分之一，东北流向，河道宽 500—800 米。河床由卵石和砂构成，渗水性好，且水浅多沙洲。上游山区河道河床纵坡陡，水流急，泥沙基本上不淤积，中游河床呈宽浅型，由于比降加大，多是含沙量多过其挟沙能力，故造成河床淤积，沙滩众多，叉道密布；下游段径流量大，比降小，因此输沙量、淤积量都大。清代，上游地区山地开发不断加剧，位于洛河上游的洛宁县“山高口云，林木苍翠，每遇阴雨，云雾旋覆……峭山坡地皆口口不可耕。康熙初邑人首垦，有薄收。陕人旋亦报垦，屡成讼案争占……”<sup>②</sup>，上游地区对植被的过度破坏，使得下游河流泥沙含量大，再加之落差较大，洛阳河段河床不断淤高，成为地上河，河身摆动频繁，夏秋季节水患易发。

伊河为洛河最大支流，至偃师与洛河相交后称伊洛河，发源于熊耳山南麓，经栾川、嵩县、伊川，经龙门入洛阳。伊河穿过龙门以后，两岸开阔，河道宽展，一般水面在海拔 60—150 米之间。整个下段河床落差减小，愈往下游泥沙淤积愈甚，而且河道向东北流去，弯度近 1.21%。伊、洛河交汇的夹河地带，地势低平，两河携带与泛滥的泥沙在此淤积，土壤肥沃，农业发达。

涧河发源于新安县南白石山，东北经函谷东八特阪向东流，后折南至洛阳城西七里，西南流入洛河。涧河多流经黄土台地，流量较小，含沙量大，河床为亚粘土质，河道比降为 4.2%，弯曲度为 1.44%，总落差为 440 米。夏秋季节，涧河洪水汇入洛河，直接增加了南关地区的防洪压力。

瀍河发源于城北谷城山，由孟津县西南入洛阳，经城东，东南入洛河。全长 35 公里，流域面积 185 平方公里，流程短，汇水面积小，流量有限，为典型的季节性

<sup>①</sup> 本节主要参考郭建民、郑金亮：《伊洛河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年，第 63—71 页。

<sup>②</sup> (民)贾毓鹏：《洛宁县志》卷一《山川》，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河流，非汛期即干枯断流。洛阳河段，河床为粘土或亚粘土，泥沙含量大，夏秋时节，易发洪水，对于东关地区的影响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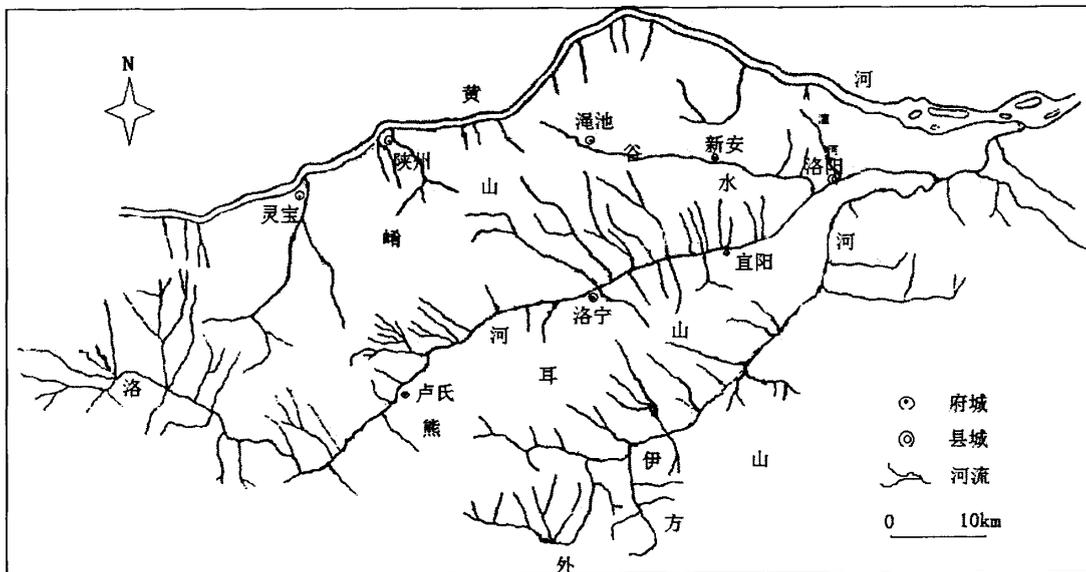


图 1.1 伊洛河水系图<sup>①</sup>

伊、洛、瀍、涧四条河流共同塑造了洛阳城附近的微观地貌，为城市及周边地区提供了水源、运输和防卫的便利，同时频发的洪涝灾害也对城市形态和居民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 3. 气候

洛阳地区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受季风环流影响明显，四季分明。本区以伏牛山为界，以南以嵩县白河乡为中心的地区属亚热带气候，以北属暖温带气候，全区大多数区域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气候带。洛阳地处秦岭东延的余脉山区，复杂地形明显的表现出大陆性、季风性、多样性等气候特征。从风向上看冬季盛行偏北风，寒冷干燥；夏季盛行偏南风，炎热多雨，季风气候明显。四季分明，春暖、夏热、秋凉、冬冷。降水集中在 7、8、9 三个月，明显表现出冬春干燥少雨，夏秋雨水集中，总体表现为春干、夏丰、秋润、冬少，夏秋两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近 80%。春、秋短，夏、冬长，春季从 3 月下旬—5 月中旬，约 60 天，夏季从 5 月下

<sup>①</sup> 据西北大学地理系 1957 年生产实习队：《伊洛河中下游河谷地貌》，《西北大学学报》，1958 年第 4 期改绘。



旬—9月上旬,约110天,秋季从9月中旬—11月上旬,约55天,冬季从11月中旬—3月中旬,约140天。<sup>①</sup>

明清时期,约五百年的时间,我国处于一个最漫长的寒冷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左右且更为干燥。与此一致,“洛阳从15世纪下期开始,气候变得寒冷,尤其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末的150余年,气候湿润寒冷。到是18世纪气候又逐渐转向温暖,这个时期旱涝交替出现,19世纪又转入较冷期”<sup>②</sup>。

民国初年,任教于河南第四师范学校的苏从武,经过调查,对洛阳气候的描述为“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冬季严寒”、“夏多东北风,冬多西及西北风,春秋二季风向无定,每当风起时,则黄尘蔽天行人难以启目”、“夏季雨量多而七八月之间尤多淫雨,冬春二季雨少”<sup>③</sup>,与现今气候状况颇为相似。由此可知,洛阳地区清代气候较现在为干冷。由于,从清代至今,季风气候形成机理并无太大变化,因此清代洛阳地区的气候特点与现在差别并不太大。降水因每年季风的强弱、进退时间的迟早和雨带停留时间的长短而不同,降水的年际变化和季节变化都很大。夏冬两季时间长,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充足的热量和蛰伏时间。气温和降水的季节变化一致,高温期与多雨期吻合的特点对农业生产比较有利。同样也因季风的不稳定性,旱涝等气象灾害频发。

#### 4.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显著,尤其在灾害抵御能力较低的传统社会更是如此,从而制约一定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对城市的发展产生影响。清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灾害多发期,河南地区是这一时期灾害多发区之一。清代洛阳地区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干旱、洪涝、虫灾、地震、雨雹、瘟疫等几种类型。这些灾害或单独发生,或连续同时出现造成了巨大损失,并以干旱、虫灾、地震和洪涝最为严重。

干旱是清代洛阳地区最主要的灾害,且破坏力也是最大的。笔者通过翻检史料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统计有清一代洛阳地区干旱灾害共发生近20次,频率接近十年一次,且持续时间长,以冬春连旱最为严重,“(康熙)十一年(1672)旱,蝗,无禾。民饥,食草根树皮”<sup>④</sup>,“(雍正)八年(1730)七月洛阳、孟津、新安旱,秋无禾,停征,赈济”、“(乾隆)四十三年(1778)自去秋不雨,至六月,河南无

<sup>①</sup> 洛阳市气象局网站 气象概况 <http://www.lyqxj.cn/sxgk.asp?cateid=154>

<sup>②</sup>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地理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120页。

<sup>③</sup> (民)苏从武:《洛阳县小志》第六章《气候》,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sup>④</sup> (清)张圣业:《河南府志》卷二十六《灾异》,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



麦，现将四十二年二月奉恩诏普免钱粮，轮应在四十五年者移于本年免征。又分别借给籽种口粮”<sup>①</sup>。

洛阳地区因位于伊洛河水系下游地区，地势低平，加之降雨集中，洪涝灾害颇为严重，“顺治十五年（1658）洛阳西北境涧水溢，水高二丈，漂没近水庐舍、人口、畜产及将实禾稼”<sup>②</sup>，“二十六年（1687）七月洛阳等县淫雨夹旬，伊洛诸水泛滥，冲塌坛庙城郭官署村庄田禾殆尽，按成灾分数加赈有差，钱粮分别黜免，余缓作三年带征”<sup>③</sup>。

虫灾往往与干旱相伴生，且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尤大，“（康熙）十四年（1675）黑虫食谷”<sup>④</sup>。蝗灾是虫灾的主要种类，蝗虫遮天蔽日，所经之处颗粒无存，“是年（1669）洛阳旱蝗无禾”<sup>⑤</sup>，“三十年（1691）洛阳大旱，飞蝗蔽天，秋无禾，民饥逃亡，饥死与饥疫者枕籍道路”<sup>⑥</sup>。

雨雹、霜灾乃强对流天气状况，主要发生于夏秋季节，对农作物和建筑损坏亦为严重，清代洛阳地区雨雹灾害颇为频繁，“（顺治）十六年（1659），洛阳、孟津雨雹，小者如鸡卵，大者如升，人多伤，树木禽鸟皆死”<sup>⑦</sup>，“（康熙）八年（1669）五月初三日雨雹大如拳”、“（雍正）七年（1729）四月，洛阳陨霜损麦”<sup>⑧</sup>。

洛阳位于许淮地震带西段，区内主要分布有北东、北西、东西向三组构造，中强地震多发生在断裂带上及断裂交会处。洛阳地区具有发生中强度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整体而言，洛阳地区地震活动强度弱，频度低，清代仅有“（康熙）三年（1664）八月，洛阳北地震”、“三十四年（1695）四月初六日河南北地震”<sup>⑨</sup>等几次文献记载的地震发生。由于城区房屋密度大，建筑质量参差不齐，临近地区的地震对洛阳城市的建筑设施造成一定的破坏。相邻地区发生的地震，如1820年许昌6级地震、1835年凤台6.25级地震和1695年山西临汾8级地震，对洛阳地区造成一定的影响。

<sup>①</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一百十六《祥异志》，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②</sup>（清）顾沂：《河南通志》卷四《祥异》，康熙九年（1670）刻本。

<sup>③</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一百十六《祥异志》，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④</sup>（清）张圣业：《河南府志》卷二十六《灾异》，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

<sup>⑤</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一百十六《祥异志》，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⑥</sup>（清）张圣业：《河南府志》卷二十六《灾异》，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

<sup>⑦</sup>（清）顾开：《河南通志》卷四《灾异》，康熙九年（1670）刻本。

<sup>⑧</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一百十六《祥异志》，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⑨</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一百十六《祥异志》，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 (二) 人文地理环境

城市是区域内人类活动的中心，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交通条件及不同时期因不同形势而导致的城址迁移状况，对城市的发展均产生重要的影响。

### 1. 政区沿革

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大多数是集经济与政治职能于一身的，这种组合方式有利于将一定区域内的各项资源集中起来，在城市环境的可承受范围之内，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密切治所城市与区域内其他地区的联系，加强了城市的凝聚作用和控制能力。中央集权国家在一定的行政区划范围内，通过军事驻防、赋税制度等手段，实现对地方的控制。幅员范围是行政区划的核心之一，治所城市影响力范围的大小，依赖于其统辖政区的规模，进而制约其可支配资源的能力。隋唐时期，府设置在政治地位较高地区，至宋代已成为一般府级政区的通例。洛阳在宋为西京河南府，金代为“河南府兼置德昌军，兴定初，号中京，改为金昌府”<sup>①</sup>。元代为河南府路，属河南江北行省。明代改为河南府，领州一县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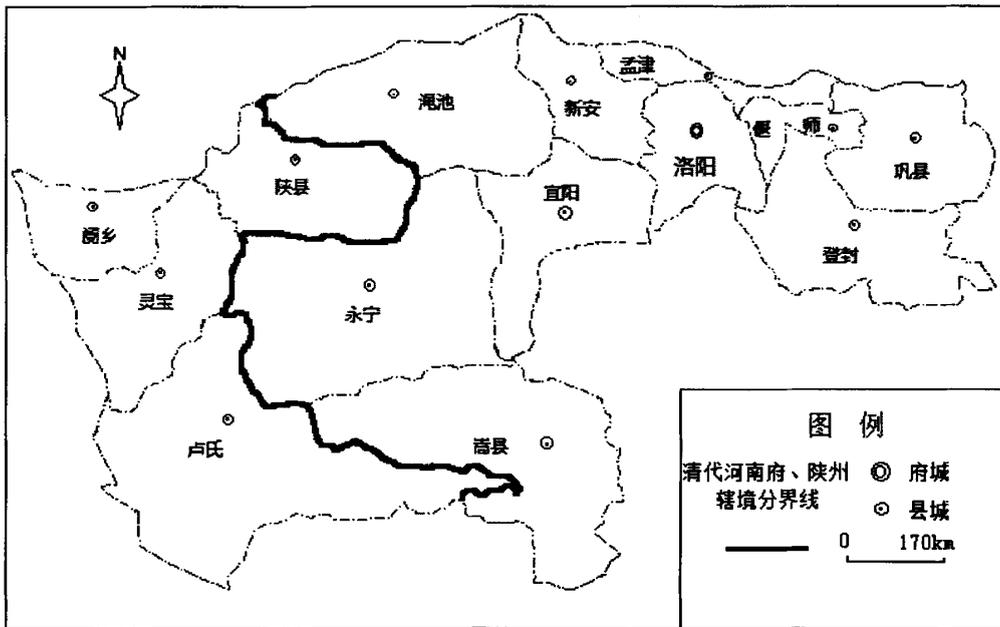


图 1.2 清代河南府政区图<sup>②</sup>

<sup>①</sup> (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一《沿革表》，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②</sup> 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GHCIS 系统 1936 年数据改绘。



清初承袭明制，至雍正二年（1724），因“虑府大者，文书多往来稽滞，分设直隶知州，使得专达，而大府无鞭长不及之虞”<sup>①</sup>，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行政区划的调整，主要以设立直隶州的举措为主。河南地区原属于开封、河南等府的郑州、许州、陕州、汝州、光州、邓州等升为直隶州，由原来不辖县的散州变为领县的府级政区。据施坚雅以中心地理论对清代中后期城市等级的研究，直隶州往往设置于区域的边缘地带，地理位置重要，交通或军事意义突出的地区，且属县数量较少，以便控制。<sup>②</sup>河南府属的陕州为直隶州后，以灵宝、阌乡二县属之。雍正十二年（1734）又以卢氏县改属陕州。此后，河南府只领洛阳、巩、偃师、登封、孟津、新安、渑池、宜阳、永宁和嵩十县。尽管失去“秦豫之咽喉”的陕州地区，但府城处于政区较为居中的位置，与各县距离较为适中，至最远之永宁县为二百里，较至卢氏县的三百四十里路程缩短了近一半，在交通运输效率低下的当时，更有助于对区域内的行政管辖，进而使得区域内部共性得到加强。

道在明清时期作为省级衙门的派出机构，“道之官始设于明，为布政、按察两司之贰。盖仿前代监郡监州之遗志而权稍杀焉。辖有方，驻亦有地”，便于对一定地区的控制。清初道制更替较为频繁，“国初设分守、分巡二道，康熙六年（1667）俱奉裁，康熙九年（1670）复设守道兼巡道事”<sup>③</sup>。明代设河南守、巡二道，分守道驻河南府，分巡道驻汝州，“国朝（清）因之，康熙六年（1667）缺，俱奉裁。雍正十三年（1735）复设，驻陕州。分巡河陕汝道，雍正十三年（1735）设”<sup>④</sup>。从道的设置而言，河南府的地位似较明代有所下降，分守道移驻陕州，但从清代，尤其是雍正年间有关政治改革的意图，特别是政区调整的情况看，此一状况适应了直隶州设置的初衷，加强对于边缘地区的控制，而河南府处于陕、汝两州之间，更加强了这一作用。

## 2.人口和民族状况

明清时期因政治环境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和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人口增长迅速，尤其是康熙年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期推行的“摊丁入亩”等赋税政策的改革，极大地刺激了人口的生长。在农业社会，人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力，数量的多寡对于小农家庭而言至关重要，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下，人们的生育需求得到了一定释放。清代颇为频繁的危害，使得人口在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有所波

<sup>①</sup>（清）田文镜：《河南通志》卷三十五《职官六》，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sup>②</sup>（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57—368页。

<sup>③</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十七《职官志一》，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④</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十七《职官志一》，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动,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共损失人口一千余万<sup>①</sup>, 作为旱灾中心地之一的洛阳, 情况可想而知。有关清代洛阳地区人口数量的资料, 较为缺乏, 且据何炳棣先生的研究, 可知清代前期的人口数据较为可信, 乾隆以后则往往流于形式, 以“丁”为单位进行统计, 缺乏实际意义。曹树基以乾隆《河南府志》中人口数据与 1953 年人口普查数据做对比, 计算出此间洛阳地区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 5.2%<sup>②</sup>。清代 268 年的时间, 只用两个数据对比来说明一地区人口增长状况, 难以说明人口的具体变化状况。笔者通过翻检史料获得几组数据, 以期能说明清代洛阳地区人口变化情况。乾隆之前, 河南府的人口数字有“顺治十六年(1659)份, 见在活丁七万六千九百八十三丁半”<sup>③</sup>, “康熙九年(1670)见在人丁八万六千四百七十四丁”<sup>④</sup>, 因“丁”作为纳税服役单位而失去意义。“乾隆十年(1736)编审, 洛阳县编户四万七千七百五十三户, 男妇大小二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八丁口”<sup>⑤</sup>, 嘉庆《一统志》“今滋生男妇大小共一百七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五丁口”<sup>⑥</sup>, 依据当时洛阳县里数在河南府所有里数中所占的比例约为 32.6%, 粗略估计洛阳县人口为五十五万余口, 而民国九年(1920 年)《洛阳县小志》“据警察厅调查约五万两千余户, 四十七万七百余口。其中男子约二十二万九千余(口), 女子约二十五万余口, 女多于男, 故纳妾之风甚盛”<sup>⑦</sup>。从嘉庆到民国初期洛阳地区人口的减少, 与期间频繁出现的干旱等灾害造成的人口损失密切相关, 以新安、孟津等周边县的死亡率来看当为不少。

河南为回民主要分布区, 全省“除光山一县外, 各县无不有之”<sup>⑧</sup>。洛阳地区居民中, 汉族占绝大多数, 少数民族以回族为主, 是河南地区四大回族聚居区之一, 此外, 还间有蒙古族、满族等。隋唐时期, 就有大量阿拉伯人到洛阳经商居住, 元朝时回族形成并开始大量进入洛阳地区。“从马、孙、金、海、李、买、沈、米、洪、梁等较大姓氏的族谱中分析, 回族定居瀋河区应始于元朝”<sup>⑨</sup>。清代洛阳城西北隅即有“回回营”的存在。至民国初年, “大部为汉民族, 惟东门有回族百余户”<sup>⑩</sup>, 且洛阳地区回民数量已经相当可观, 达到一万余口。

<sup>①</sup> 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98 页。

<sup>②</sup>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355 页。

<sup>③</sup> (清)贾汉复:《河南通志》卷十一《户口·河南府》, 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

<sup>④</sup> (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二十五《户口志》, 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⑤</sup> (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二十五《户口志》, 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⑥</sup> (清)穆彰阿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〇五《河南府一》, 四库存刊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sup>⑦</sup> (民)苏从武:《洛阳县小志》第十二章《人口》, 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sup>⑧</sup> (民)刘景向:《河南新志》卷三《礼俗·宗教信仰》,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74 页。

<sup>⑨</sup> 胡云生、张玮:《洛阳市瀋河回族区的回回民族》,《回族研究》, 1994 年第 2 期。

<sup>⑩</sup> (民)苏从武:《洛阳县小志》第十二章《人口》, 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 3. 交通条件

交通条件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城市与所在区域内的物资交换、信息交流需要交通；城市之间的联系，更需一定的交通条件。交通条件乃维系城市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洛阳地区的交通方式分为陆路和水路两种，以陆路交通为主，占支配性地位。

#### (1) 陆路交通

洛阳地区以丘陵、山地为主，山地之间分布有面积狭小的盆地、冲积平原，地形起伏较大。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基本上呈东西走向，对区域内南北交通起到巨大的阻隔作用。本区黄土地貌分布广泛，因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地貌较为破碎。夏季降水集中，致使道路泥泞，加之交通工具以畜力、人力车为主，运输效率低下。交通线路多沿河流两岸延伸，或经过山口。道路类型主要有驿道、县际道路和乡村道路，形成以东西向为主，南北向为辅的道路交通格局。东西向道路即豫陕大道，从开封出发，经郑州、荥阳、偃师、洛阳、新安、渑池、灵宝、华阴至西安的官道。这条官道以洛阳为节点，往西南方向的两条道路，分别是沿洛河谷地，经宜阳、永宁至卢氏，此路在永宁县经崤山可与豫陕大道相连，另一条路线沿伊河谷地，经龙门，嵩县，至潭头镇（今栾川县城）。1908年汴洛铁路开通，后又分别向东西两侧延伸，至连云港和西安，成为沟通东西交通的大动脉。

南北向大道为，从洛阳往北，在孟津渡黄河，经怀庆府，穿太行山至山西；由洛阳南下可分为两支：一支经龙门、伊阳、汝州、鲁山，渡鸭河，过南召，至南阳，往南可经襄阳至汉口，即古“三鸦路”；另一支为东南走向，由洛阳出发，过偃师，东南至登封，可分南北两脉，北上到开封，南下至南阳，即古“轩辕道”。熊耳山两侧的交通路线，多从山口穿过，嵩县鸣皋镇与宜阳白杨镇邻，商贸往来频繁，市场繁荣；德亨镇的粮食“由穆册关贩及宜、永”，大章镇因“为西南山孔道，市厘较盛”<sup>①</sup>。

#### (2) 水路交通

洛阳地区水路交通很不发达。境内四条主要河流，“伊、洛水深河宽，有船往来。灋、涧则不及伊、洛，河道狭窄，非在发水时，直同涧流，故难以行舟”<sup>②</sup>，仅有洛河和伊河部分河段适宜航运，且多集中在夏秋多雨季节。洛河水运主要分为两段，中游永宁至洛阳段，丰水期时帆船能够航行，且卢氏、永宁等地山区砍伐的木材也在此时顺水而下至洛阳、偃师、巩县等地出售；洛阳至偃师、巩县段因伊河

<sup>①</sup>（清）龚文明：《嵩县志》卷十二《市镇》，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第285页。

<sup>②</sup>（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地理类·伊洛灋涧河》，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1页。



汇入，流量增大，适航时间较长，运量也较大，巩县之煤炭运至洛阳，并购回手工产品。伊河流量较洛河稳定，上游潭头镇“木客之浮伊河由鸾安而来者，皆泊潭头，缚筏东下”，下游地区则河面宽阔，流速平缓，航运价值较大，龙门河段更因水路要冲而价值颇大。汝河发源于嵩县伏牛山地区，可通木筏至汝州等地，东村、汝河镇等地“山木缚筏，浮汝而下，直达汝州”<sup>①</sup>。

#### 4.经济状况

洛阳盆地，开发历史悠久，是较为重要的传统农业生产区域。经历明末清初的动乱和破坏以后，清初洛阳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迅速。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以小麦为主的粮食作物产量大幅增加，嵩县“楸坡、鸦石、壅峪、雁坎村落较大，其民朴质，务耕织，鲜诵读，丰稔之岁，米粮积滞，贩运洛绛”<sup>②</sup>，玉米、大麦也有一定的种植，水稻主要分布在伊洛河平原，灌溉便利的地区，其中“出龙门南者，尤佳”。大量水利设施得到兴建，洛阳盆地、永宁、宜阳沿洛河两岸地区和嵩县伊河两岸阶地都在前代基础上增修许多水利工程，仅嘉庆年间洛阳县就新修渠道十一条，并设渠长管理。

清代洛阳地区，随着全国性商品市场的形成，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尤其以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的产量为巨。因土壤、气候等适宜条件，清代河南地区棉花得到广泛种植，洛阳地区乃一重要产棉地区，“今河南高燥，地率种棉”<sup>③</sup>，“万安之阴种者尤多”<sup>④</sup>。孟津“棉花，山地多种之，河滩之高燥者，亦宜”，并且作为当地重要的收入来源，“津邑不产货财，居民往往有食而无用，而土山一二里即洛阳境。凡可种面者皆□□□民率质其地以种棉。□棉者宜有秋则食用皆□矣”<sup>⑤</sup>。偃师县“以种棉花为急务。收花之利与五谷等。操其赢者，牵车牛贩诸四方”，“妇女相助，朝夕织绩，务婚嫁丧葬之资。衽车之声，溢于里巷”<sup>⑥</sup>。

尽管洛阳地区棉花产量可观，但由于本地没有相应的棉纺织企业，故所产棉花皆以外销为目的，洛阳城的棉花交易量相当可观，据李希霍芬 1870 年在洛阳地区所做的调查：“河南府的主要贸易品为棉花，此间各种输入品主要是由出售棉花支付的。据说棉花的买卖终年不断，城内的交易额每天平均约为一万两。主要是输往

<sup>①</sup>（清）龚文明：《嵩县志》卷十二《市镇》，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第 285—286 页。

<sup>②</sup>（清）龚文明：《嵩县志》卷十二《市镇》，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第 287 页。

<sup>③</sup>（清）魏襄：《洛阳县志》卷二十五《物产记》，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④</sup>（清）魏襄：《洛阳县志》卷二十五《物产记》，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⑤</sup>（清）赵卓彤：《孟津县志》卷一《物产·货之属》，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

<sup>⑥</sup>（清）汤卓：《偃师县志》卷五《风土志·风俗》，乾隆五十四年（1780）刻本。



陕西和甘肃，输往山西及湖北的量较小”<sup>①</sup>。棉花交易的终年进行和交易额的巨大以及对外贸易对棉花收入的依赖，说明至清后期，棉花种植业已经成为洛阳地区的支柱产业。同时，由于山地分布较广泛，适宜耕种的地区有限，进而为增加收益，人们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正值棉花播种期，除冲积地以外，绝大多数土地都准备种棉。沿洛河的冲积低地，每年都遭水淹，为种植小麦、果树及鸦片的良好园地”<sup>②</sup>，棉花种植的广泛逐渐改变了原来以小麦为主的种植结构。

清代洛阳地区棉花生产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除棉花外，其他具有特色的经济作物也广泛种植，如“香油，土产甚广，邻省资之”，“红蓝，俗名红花，他方种者，染色俱逊洛产”，“豆粉，利同香油，业者甚广”<sup>③</sup>。至民国初年，此种情形更甚，棉花依然为主要经济作物，“本县土地膏腴，出产丰盈……棉花为大宗，伊河岸之稻与离区、运庄之蓝靛，每年之产额，不下千袋万斤”<sup>④</sup>。清代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人们对燃料的需求与开采力度加大，洛阳周边地区的煤炭得到开发，巩县、新安等县煤炭资源在明代基础上继续开发，宜阳县“有有烟、无烟之别，城南山中采”，人们往往以此来作为生存之道，“近城采煤出售，亦可谓自食其力云”<sup>⑤</sup>。永宁、嵩县等地的金、银、铅、锡等矿产，在明代已经得到开采，至清代更多人涌入山区，砍伐林木就地冶炼，运送至南阳、山西、陕西等地出售。畜牧业多为农耕附庸，依赖牲畜进行耕种。回民养羊颇多，由民国时期洛阳东关回民饲养的状况可见一斑。

## 5. 城址迁移<sup>⑥</sup>

目前的考古发现证实石器时代，今洛阳地区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就有大量的原始聚落存在，而此一地区城市的源头则始于夏商时期的偃师二里头和商城遗址。从夏商至清，洛阳城址经历了几次迁移，尽管城市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因洛阳盆地两侧山地的限制而未曾有大的偏离。通过对历代洛阳城址变迁及其原因的梳理、分析，不仅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洛阳城市的发展脉络，加深对当前城市环境和发展的理解；而且由于洛阳城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对于掌握我国古代城市营建技术和解决与洛阳城相关的历史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sup>①</sup>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料》，《李希霍芬书信集》第三篇《关于河南及陕西的报告》，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24页。

<sup>②</sup>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料》，《李希霍芬书信集》第三篇《关于河南及陕西的报告》，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24页。

<sup>③</sup> （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之二《地理·风俗》，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④</sup> （民）苏从武：《洛阳县小志》第十一章《产业》，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sup>⑤</sup> （清）申明伦：《宜阳县志》卷六《风俗·土产》，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

<sup>⑥</sup> 本节主要参考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



城市选址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技术水平和对其周边环境的认知程度，而城址的变迁则反应了不同时代人们技术水平和认识水平的发展。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商城遗址位于洛河北岸呈东西向带状的平坦高地上，靠近伊、洛河交汇处，高度在海拔 120 米左右，与洛河河面基本持平，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对于人口较少的城池而言，有取水之便，但水患威胁严重。由于伊洛河交汇地区，北侧山地逼近河岸，南侧为河流冲积平原，地势低洼，缺乏城市扩展的空间，故东周时期的成周城和汉魏洛阳城西移至今洛阳市区东约 15 公里处。汉魏洛阳城北临邙山，城区南北两端地势较高，中间部分较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水患威胁，至北魏时期，由于城区扩展至地势相对低平的洛河南岸，水患有所增加。西周王城与隋唐洛阳城即今洛阳城区东部，相对于汉魏洛阳城而言又偏向西侧，靠近伊洛河平原西北边缘部分，城区地势略有增高，城区规模较之前更为宏大，洛河横贯其中，但已通过筑堤等手段较好的解决了洛河水患问题。唐代之后，洛阳城市地位下降且频遭战火毁坏，城区规模狭小，局限于洛河北岸，建国初期，出于工业建设的考虑，洛阳城区向西发展，直至上世纪末才重新开始洛南地区的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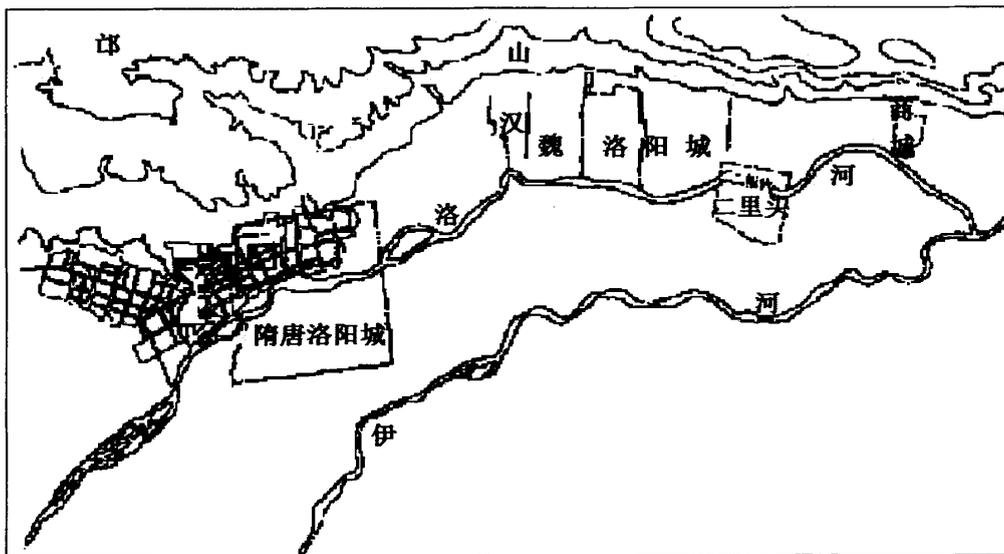


图 1.3 洛阳城址迁移图<sup>①</sup>

洛阳城经历了自西向东的迁移过程，而且这一迁移路径是沿洛河展开的，充分说明了在山地面积广大，而平原狭小和河流较少的豫西地区，流量最大的洛河对于

<sup>①</sup> 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 年第 4 期。



城市布局的限制作用。从夏商至隋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受制于洛阳盆地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地势，城市向西迁移成为必然选择，随着城市营建技术的发展，城区不同的地形条件得到恰当的利用，从而又丰富了城市的空间形态。同样，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由于豫西山区的开发，伊洛河下游地区水患频发，更加反衬出城址西移的必要性，而从洛阳盆地整体的环境状况而言，洛阳城又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充分说明了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对于城市选址的限制作用。清代洛阳城，从规模而言，无法与汉魏、隋唐洛阳城相比，但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却是相当优越的。

## 小 结

洛阳地区山地纵列分布，东西延伸，盆地、平原夹杂其间，地形起伏大，处于二、三阶梯过渡地带，是较为典型的黄土地貌分布区。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季风特征明显，受地形影响，区域内气候颇为复杂，整体以温带季风气候为主。降水集中且强度大，季节和年际变化较大，加之本地区开发历史悠久，环境破坏较为严重，军事战略地位重要，频遭战火摧残，人民困苦，防灾减灾能力弱，以旱灾为主的水旱灾害影响范围和破坏力巨大。自西向东贯穿这一地区的洛河、伊河，上游山区植被破坏严重，河流含沙量大，下游地区颇受洪涝之苦。丰水期时洛河航运价值较大，永宁、卢氏等地的木材顺流而下至下游地区出售，巩县煤炭也能运至洛阳，洛阳的手工产品亦可运至永宁、偃师等地。伊河、汝河上游地区也可通竹筏，运输粮食、山货等至洛阳、汝州等地。陆路交通乃本地区主导性的运输方式，东西向的秦豫大道，北渡黄河可到山西，南经龙门至南阳，东南经登封至汝州、许州等地的陆路交通将棉花、山货等运送到各地出售，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尽管清代的洛阳城已日暮黄昏，都城时代的历次城址迁移所最终选择的地形地貌条件，乃是最为优越，但在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仍有人力无法弥补的不足。清代洛阳城在这样的区域环境下发展，其空间格局与社会状况无不是历史传统与区域现实综合作用的结果。



## 二、清代洛阳的政治空间与城防结构

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农耕文明，筑城历史悠久，以至于“城是中国特殊文化的产物，很突出的标志，构成了汉文化圈人文地理的独特景观”<sup>①</sup>。城池作为物理实体存在，不仅是维护统治的重要凭借，同时其空间格局与形态更是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sup>②</sup>明清时期几乎所有治所城市皆筑有城墙，而军事防御与治安控制成为其主要功能。洛阳因地处交通要冲，军事战略地位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末农民战争中，城池几乎被为夷为平地。清代，尽管洛阳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战乱，但周边地区局势恶化和土匪山贼的威胁，使得洛阳城的修筑维护依然得到重视。城南濒临洛河，而每年夏秋季节洛河洪水对城市威胁严重，使得城池的防洪功能尤为重要。军事防御与防洪体系，共同组成清代洛阳的城市防御体系。

### （一）清代洛阳城政治空间格局及其演变

清代洛阳县为河南府附郭县，河南府衙及其相关僚属机构亦分布于城中，且对其下属（洛阳县）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因而处于政治中心地位。府、县衙及其相关僚属衙门共同构成了清代洛阳城的政治空间格局。

#### 1. 府级行政机构的分布与变迁

北宋之后，洛阳成为地方城市，“金初仍宋制。正大初，以河南为中京，改河南为金昌府……先于正隆初迁府治，自水南入城宣仁门里”<sup>③</sup>。元河南府路总管府治沿用金旧址，“在城内大街”<sup>④</sup>。明代仍沿袭金元，洪武元年（1368）建，天顺元年（1457）修。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军队攻陷洛阳，洛阳全城“兵燹后俱废”，因此，清初府署“于城西南隅寄治民舍”，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才由时任知府汪辑“移驻东北隅，旧提督府衙门”<sup>⑤</sup>。河南府署（路治）位置经历了从金元明三朝的西北隅、清初的西南隅和康熙二十八年（1689）之后的东北隅。明代之前，多沿用旧址，无甚变化。清初因战争破坏，经济凋敝，无力营缮府署，即便城墙亦利用福藩废府砖石才勉强完工，可见清初府署“寄治民舍”完全因经济

<sup>①</sup>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9页。

<sup>②</sup> 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

<sup>③</sup> （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7页。

<sup>④</sup> （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之六《建置志二》，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⑤</sup> （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之六《建置志二》，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困顿、百废待兴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三年（1664），河南提督衙门设于洛阳，后迁开封（详见下文）。河南提督衙门在洛期间，利用福藩废府修建，康熙二十八年（1689）后，河南府署便迁于此，同样利用了旧有设施，减小建设成本。由此可见，影响行政机构迁移的因素，除去国家礼制与传统的宇宙论之外，亦考虑地方社会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经济承受能力。

府衙作为处理一方事务的行政机构，涉及事务庞杂，其僚属种类繁多，各类衙门数量亦多，知府以下主要有“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无定员。其属：经历司经历正八品。照磨所照磨，从九品。司狱司司狱，从九品。各一人”，其执掌各有不同，以同知、通判为紧要，“分掌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夷诸要事”，而其他职位则因各地实际而定，“自同知以下，事简者不备”。<sup>①</sup>其他僚属，尚有主管驿传迎送的驿丞，主管库藏的丰济仓大使和税务的税课司大使等。清代各类官职裁设不定，同知于顺治十三年（1656）裁，因其设置时间短暂，且清初城池、衙署皆处于草创之际，故其位置未详。通判于“乾隆九年（1744）奉文移驻嵩县孙家店镇”<sup>②</sup>，而照磨、税课司大使、丰济仓大使、司狱则在清初先后裁撤<sup>③</sup>。作为知府僚佐，上述诸多衙门多分布于东北隅府署周边，教授署与训导署因其“掌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sup>④</sup>的职责，而位于东南隅河南府学，通判署与推官署曾分布于西北隅，或调离或裁撤，最终形成了围绕府署的府级行政中心。

## 2. 县级行政机构分布与变迁

知县作为基层行政长官“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sup>⑤</sup>，掌管全县范围内各项事务，因此亦处于全县行政序列之核心位置，县署作为其办公场所，则为行政运作之中心，瞿同祖先生形象的描绘了县衙所承担的职能与事务：

衙门每天的日程是以敲击一种竹筒和一个小铁棒的声音来发布和限定的。黎明前，在内衙敲“云板”七遍，外衙敲“梆”一遍，衙门大门打开。此时，书吏、衙役、长随都必须到岗。清晨，敲云板五遍，竹梆两遍，案牍分给书吏，衙门职员均开始办公。接着，州县官主持“早堂”，接受并分

<sup>①</sup>（民）赵尔巽：《清史稿》卷一一六《职官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三三五六页。。

<sup>②</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府署》，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③</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十八《职官志二》，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④</sup>（民）赵尔巽：《清史稿》卷一一六《职官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三三五七页。

<sup>⑤</sup>（民）赵尔巽：《清史稿》卷一一六《职官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三三五七页。



派案牘，接受衙門職員所呈的書面或口頭報告，訊驗被捕系的罪嫌或將要解送到別的衙門的囚犯，接受任何訴訟。然後，州縣官回到他們的辦公室，在那里接受或簽批文書，包括當日將要庭審案件的相关書狀。通常，下午的時間專門用於聽理訴訟。<sup>①</sup>

縣衙在地方政治事務中的中心地位，其分布、變遷是城區政治空間格局變遷的另一核心。按乾隆《洛陽縣志》載：“舊在成周。漢魏晉後魏悉因之。隋大業初，徙治灑水西道光坊，唐宋金至明因之”<sup>②</sup>。按清洛陽城為隋唐洛陽城一隅，依照霍宏偉<sup>③</sup>以隋唐宣仁門為坐標對老城十字街與隋唐街道關係的研究，則隋道光坊位置大致為清代洛陽城西北隅位置，則金至明洛陽縣衙位於城之西北隅。因福王之國，萬曆四十二年（1614）修建福府，縣衙乃“移建城東北隅，迎恩巷之北”<sup>④</sup>，時任河南知府張經世“執法不阿……福藩之國，規劃基址，力與內監爭之”<sup>⑤</sup>，儘管並無直接陳述有關洛陽縣衙遷移之事的爭執，但從其牽涉洛陽縣學等的遷移來看，福王府的營建使得明中期洛陽城空間結構有一定程度的調整。洛陽縣衙“明末毀於兵，國朝順治七年（1650）知縣武攀龍就舊基□建”<sup>⑥</sup>，期間幾年，當與河南府署一樣，寄治於民居，由後任知縣相繼修葺。

縣作為基層政區，其主要功能為理民與征收賦稅，因而其幅員與治所長期穩定。因職能不同，縣級政府的組織結構主要為“在知州（散州）和知縣即‘正印官’或‘正堂’之下；還有三種屬官：助理知事（‘佐貳’），書吏首領（‘首領官’）和雜務官（‘雜職’）”<sup>⑦</sup>。知縣之下最主要的僚屬為縣丞、主簿，“分掌糧馬、徵稅、戶籍、緝捕諸職”，此外，“典史掌稽檢獄囚”<sup>⑧</sup>，還有訓導、教諭等官，清代洛陽縣未設主簿。按其分布情況看，僚佐衙門多圍繞府城分布，“縣丞署，舊在縣署東，今在城東北隅，府署西”，“典史署，舊在縣署西，今在城東北隅清涼寺西”，不同於河南府教授與訓導署在河南府學，洛陽縣教諭與訓導署皆在府署周邊，“教諭署在城東北隅，府署東”，“訓導署在城東北隅，府署西”<sup>⑨</sup>。縣衙及其附屬機構圍繞府衙分布，更加強化了府署的中心地位。

<sup>①</sup> 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譯：《清代地方政府》（修訂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頁。

<sup>②</sup>（清）龔松林：《洛陽縣志》卷二《地理》，民國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③</sup> 詳見霍宏偉：《洛陽老城十字街與隋唐城街道遺迹》，《考古》，2012年第8期。

<sup>④</sup>（清）魏襄：《洛陽縣志》卷三十九《衙署志》，嘉慶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⑤</sup>（清）魏襄：《洛陽縣志》卷四十四《循吏傳》，嘉慶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⑥</sup>（清）魏襄：《洛陽縣志》卷三十九《衙署志》，嘉慶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⑦</sup> 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譯：《清代地方政府》（修訂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頁。

<sup>⑧</sup>（民）趙爾巽：《清史稿》卷一一六《職官三》，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三三五七頁。

<sup>⑨</sup>（清）魏襄：《洛陽縣志》卷三十九《衙署志》，嘉慶十八年（1813）刻本。



### 3.府、县署位置关系及其意义

明清两代，河南府署经历了西北隅，到清初的西南隅至东北隅演变过程，洛阳县署则由明前期的西北隅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之后的东北隅的转变，总体而言，两者大多数时间内位置相统一。两者相分离的原因分别为福藩之国导致洛阳县衙迁移和清初由于战争破坏，河南府衙“寄治民舍”，皆为非常规状态。中国古代城市“内部的区划，主要是王朝国家利用权力对城市空间进行‘切割’、‘划分’的结果，是国家权力从外部对城市功能作出的强制分划”<sup>①</sup>，治所城市的政治空间的形成，乃是出于礼制、等级等诸多因素考虑的结果，府署作为国家在地方城市中的代表，其地位无疑是崇高的，既体现在各类行政机构围绕其分布，亦体现在其自身建置所展示的城市中心地位。从明代开始，河南府署即建筑于高台之上，以显示其权威，天顺元年（1457）重修时，“居中大门启建高台三丈许”<sup>②</sup>，康熙二十八年（1689）迁至利用福藩废府修建的旧提督衙门，而福王府则修高台以显示尊贵。洛阳县署因知县受知府节制，“知府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三岁察属吏贤否，职事修废，刺举上达”<sup>③</sup>，则县衙同其僚属衙门皆以府署为中心分布，等级分明，体现了政治统治对于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

## （二）清代洛阳城的军事防御体系

明末洛阳城毁于战火，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兴建洛阳城，仍如明代旧制，有所损益，突出军事防御功能，由城墙、敌楼、关城、周边堡垒及驻防军队，共同组成清代洛阳城的军事防御体系。

### 1.清中前期城墙修建与规模

洛阳在宋代作为西京，为文化中心之所在，但于隋唐相比，没落许多，城池更不能与之相比，“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王曾判府改筑，方之周都缩五之四，占隋唐一隅耳”，且“金元仍旧制，历代土垣”<sup>④</sup>，“金初仍宋制，正大初以河南为中京，改河南为金昌府，筑城东据灋水，南接东城之南郭，西亦因东城之西郭，北缩于旧仅一里”<sup>⑤</sup>，形成“边长约 1400 米的正方形，城区面积约 2 平方公里”<sup>⑥</sup>的规模，一直延续至清代。

<sup>①</sup> 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

<sup>②</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六《建置志二》，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③</sup>（民）赵尔巽：《清史稿》卷一一六《职官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三三五六页。

<sup>④</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一《城池》，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⑤</sup>（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宋城阙古迹》，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7页。

<sup>⑥</sup> 崔静一等：《洛阳历代城池建设》，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版，第48页。



明代开始，洛阳城开始为砖包城墙，在冷兵器时代防御能力得到极大增强。“洪武初，置河南卫，六年卫使陆龄砌以砖石。高四丈，广如之，环城凿壕，计城四围八里三百四十五步，壕深五丈，阔三丈，减门为四，东建春，西丽景，南长夏，北安喜。上建城楼，外架月城，又构角楼四，敌台三十有九”<sup>①</sup>。尽管城池规模减小许多，但军事防卫意义却更加突出。城墙高阔，壕沟深广，月城、角楼、敌台防卫设施健全，而且犹有深意地将城门减为四个，军事意图明显。如此的规模也奠定了清代洛阳城的规制。

表 2.1 清代河南府、州城池规制情况表<sup>②</sup>

城市	周 长	城 墙		城 门	城 壕		敌 台
		高	宽		深	宽	
开封府	二十一里一百九十步	三丈五尺	二丈一尺	五	—	五丈	八十四
归德府	七里三百一十步	二丈	一丈	四	二丈	五丈二尺	十六
彰德府	九里一百一十三步	二丈五尺	二丈	四	二丈	十丈	四十
卫辉府	六里一百三十步	三丈五尺	如之	三	一丈二尺	三丈	十
怀庆府	九里一百四十八步	三丈五尺	二丈	四	二丈五尺	五丈	六
河南府	八里三百四十五步	四丈	如之	四	五丈	三丈	三十
南阳府	六里二十七步	二丈二尺	如之	四	一丈七尺	二丈	三十
汝宁府	九里三十步	二丈八尺	如之	四	一丈二尺	二丈	四十八
陈州府	七里三十步	三丈	半之	四	一丈五尺	二丈奇	—
汝 州	九里有奇	四丈	二丈五尺	四	二丈	三丈	二十四
许 州	九里一百三十九步	三丈二尺	一丈一尺	四	一丈二尺	一丈三尺	—
禹 州	九里有奇	三丈二尺	二丈	四	一丈	五尺	—
郑 州	九里三十步	三丈	半之	五	二丈	四丈	—
陕 州	九里一百三十步	三丈八尺	三丈二尺	四	二丈五尺	若之	—
光 州	九里	一丈	—	十三	七尺	—	—

明清两代“洛阳城是在隋唐洛阳城的宫城和东城等的基础上，改造部分地段而成，因而其北墙依旧是利用了谷水河道，将其作为天然的防御屏障和城市的主要水源”<sup>③</sup>，北墙走向与谷水河道（北护城河）一致，由乾隆《洛阳县志》的城关图可知东城墙几乎与瀍河平行，南城墙平直，与洛河间有关城相连，仅西城墙无河流作

<sup>①</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一《城池》，民国十三年（1924）刻本。

<sup>②</sup>数据采自田文镜：《河南通志》卷九《城池》，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本。

<sup>③</sup>王炬：《谷水与洛阳诸城址的关系初探》，《考古》，2011年第10期。



屏障，却为卫所领地，军事力量较强，至清代依然为守城军队重要驻防地区，可见洛阳城池尽可能地利用自然条件以增强其防卫能力。

此外，从明代洛阳城池的修筑情况可看出，军事防御的需要是城池修葺的直接和最主要原因：

成化、弘治年间，指挥使张杰、王臣相继葺治。

正德六年（1511），群盗猖獗，中州戒严，知府刘猷督役睿壕，深如旧，阔倍之，又引灋、涧而水入壕，筑堰以资防御。七年（1512）三月寇至，为壕阻，引去。

万历初，守道杨俊民委县卫重葺，改四门额，东长春，西瑞光，南慕风，北拱辰，日久倾圯。

崇祯四年（1631），知县杨四重谋于绅士捐三千金，委痒生张秉厚董役，历二年余，共竣，而流寇先窥城者四，迄不克。<sup>①</sup>

清朝中前期对各地城池维修十分重视，顺治、康熙、雍正皇帝多次发布谕旨，要求地方督抚官员及时修补倒坏城垣，并将城垣维修纳入官员考核奖惩体系之中，而各省督抚于每年年底奏报本省坍塌、维修状况也渐成定例<sup>②</sup>。在清朝建立初期，洛阳城墙的修筑就已开始，这与当时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清顺治二年（1645），守道赵文蔚草创修筑，仅完西面，六年（1649）知府金本重捐俸倡修，鞏明福藩废府砖瓦秋砌佐之，三面俱完，四门四维，建八楼，坚耸立视昔有加”<sup>③</sup>。从整个清代洛阳城池修建的时间分布上亦可说明这点，“康熙四十四年（1705）知府赵于京，知县吴征重修南门月城，建楼于上。又改东门额曰‘迎恩’。四十六年（1707）署府赵光荣修东门，建城楼。六十一年（1722）知府刘天爵，知县曾汝为修西门，建城楼，额曰‘万安’。修北门，建城楼，额曰‘长庆’。雍正六年（1728）知府张汉，知县王箴舆修南门，额曰‘望塗’”<sup>④</sup>，“乾隆二十七年（1762）知府傅尔瑚纳、知县王宇修”<sup>⑤</sup>。方志记载的清代洛阳城池修建几乎都是止于乾隆年间，这固然与资料的保存情况有关，更是清代中后期社会动荡，洛阳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地方社会经济凋敝的结果。相对于明代和清初，对洛阳城池大规模的修筑，清中期主要侧重

<sup>①</sup>（清）魏襄：《洛阳县志》卷八《土地记下》，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②</sup>史红帅：《清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西安城墙维修工程考——基于奏折档案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1辑。

<sup>③</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五《建置志》，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④</sup>（清）魏襄：《洛阳县志》卷八《土地记下》，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⑤</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五《建置志》，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于月城和城楼的维修，也反映出城门作为整个城池防御体系中最为薄弱的一环而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城楼则由于其木质结构，受风雨侵袭而易腐朽。同时，洛阳城门额名称在明清两代的变化，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不同时代的社会取向，却又都与洛阳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地理景物密切相关。从表 2.1 可知，尽管洛阳城规模在清代河南地区不算突出，但其“高五丈，宽五丈”的城墙规格在河南地区的府、州城中首屈一指。从城池图中，亦可以看出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建有马面，由于城墙延伸过长并显单薄，修筑马面不仅可以增强城墙的坚固性，同时也增添更多据点以杀伤敌人。

## 2. 关城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建筑更为密集，出现了“厢坊制”的布局形式。这些“关厢”地区，开始形成时无城垣，以后因为不断扩大，又加筑了城垣加以防护和便于管理。这些关厢相当普遍，因为是后来所筑，形状多不规则<sup>①</sup>。崇祯年间，因流寇侵扰，“（知县）刘宏绪于壕边增筑拦马土墙一匝，高一丈，周一千五百六十八丈五尺，睿疏闸口，复引灋水入壕。知府王印长以寇屡薄城，关厢罹害，与宏绪议于郭外筑土城一座，延袤三十三里，居民赖之，闯寇陷洛屠民，平城，土城一时并毁”<sup>②</sup>。说明尽管明代中后期洛阳城市经济已经有所发展，“城下街区”规模不断扩大，但直到明末因战乱威胁，“寇屡薄城，关厢罹害”，地方官员才开始修筑关城，规制却甚为粗糙，仅为“土城”，防护能力可想而知。有关关城的作用与范围，吕维祺在其所作《洛阳修东关外城记》中“夫东关外城何为而作也？盖内以巩固大城，外以防御流寇也。”将关城之功用表露无遗。而有关关城范围、形制，吕氏则叙述更为详细：

于是谋之长吏，经营附郭，筑外城三十余里，雉堞连云，隍池通水，岂然金汤之固矣。惟是东关外城越广济桥以东，号为砖城。南起于石堰之圃，东折于窈妃之崖，北临邙山之麓，西迄于灋水之滨，周回六里有奇。<sup>③</sup>

相较于最初于壕边所筑的仅有一千五百余丈的拦马土墙而言，三十三里的土城规模不可谓不大，且当时的洛阳城周长不过八里余，也反映了明末洛阳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关厢地区的规模。“雉堞连云，隍池通水”利用周边涧、灋、洛等河流，构

<sup>①</sup> 董鉴泓：《中国古代城市二十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4 页。

<sup>②</sup> （清）魏襄：《洛阳县志》卷八《土地记下》，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③</sup> （明）吕维祺：《洛阳修东关外城记》，乾隆《河南府志》卷八十五《艺文志九·记三》，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筑防御体系。而东关地区因交通便利，在四关中规模也最大，从清代的里数分布上亦可说明此点，对于整个洛阳城防而言，意义犹大。故为砖城，但从“号为”可知，此砖城建造因时间仓促，质量定不能与内城相比。东关城越广济桥以东，即横跨灋河两岸，便因无护城河可资依赖，也成为外城中唯一的砖城。东关城“南起于石堰之圃，东折于宓妃之崖，北临邙山之麓，西迄于灋水之滨，周回六里有奇”的规模，几乎与内城相当，充分说明了东关在洛阳城防中的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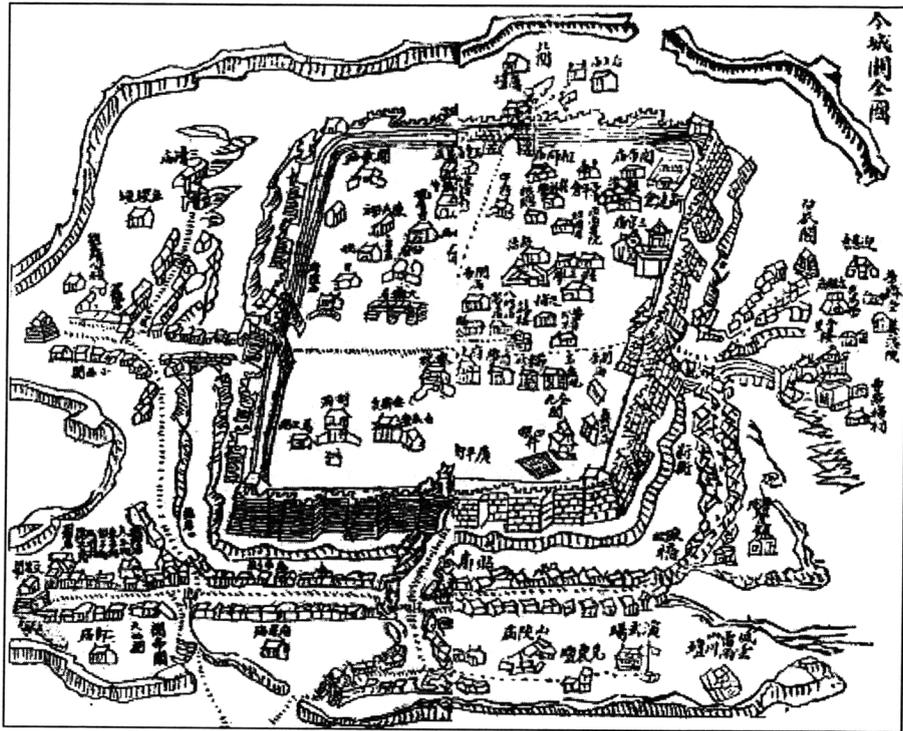


图 2.1 清代洛阳城关全图<sup>①</sup>

清代洛阳城的修筑，除早期顺治、康熙年间的主体恢复外，康熙后期开始主要是城门与月城的修建，关城规模与形制可从嘉庆《洛阳县志》中《今城关全图》知其大概。环城一道关墙，与砖城比较可知，此道关墙，当为土墙，且墙体低矮、单薄。四关中，惟有东关部分没有关墙，北段止于迎恩寺以北，南段则无，当因东关地区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繁盛，规模过大，一方面建筑成本太大，另一方面也与关城阻碍交通往来有关。此或许亦可说明吕维祺认为东关于洛阳城防尤大的原

<sup>①</sup>采自乾隆《洛阳县志》卷二《舆图》，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因。北关地区将几座庙宇包裹进来，又因逼近邙山，北关城墙当抵邙山南麓地带。西关城墙跨过护城河，仅将附近地区祠庙皆包裹进去，关门位于小西关以西地区。南关地区，关墙走向颇为曲折，且多断续。南关墙将山陕会馆、演武场等包裹在内，根据相对位置，可以判定关墙当贴近洛河北岸，开口颇多，关门并无专门建筑，仅为缺口而已。这种情况与南关地区商业发达，濒临洛河，受洪涝灾害威胁严重有关。而编修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河南府志》和嘉庆十八年（1813）的《洛阳县志》的城池图中却无关城部分，可知此关城当在乾隆四十四年（1799）之前已经消失，与其本身质量较差，经历风雨自然坍塌有关，或与此时期社会变动有关。

### 3. 军事设置

明代在洛阳城设河南卫，“明洪武初设，领千户所七，军三千名，有仪卫司、中护卫、军器局及军屯三十三处”，因先后护卫伊王、福王，军队数量可观。至“顺治十六年（1659），并卫入县，故地俱废”<sup>①</sup>。清初逐渐确定兵制，“顺治三年（1646），定河南官兵经制……十八年（1661），设河南提督，标兵分中、左、右三营，设将领分统。设河北、南阳、开归三镇总兵官，标兵各分左右营，将领兵数如抚标制，河南、卫辉、汝宁、归德各营各参将等，兵各一千”<sup>②</sup>，起初河南提督衙门设于河南府城，“顺治十八年（1661），置提督，驻河南府。康熙三年（1664），迁开封府”<sup>③</sup>，其原因为“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江西总督已经裁并，省城要地不可无重兵弹压”，因此“此五省提督驻口地方，应请更定”<sup>④</sup>，方从洛阳迁至省城开封。三藩之乱时，因洛阳交通位置重要，为“四达之地，距潼关、郟、襄皆近”，朝廷议将八旗兵调往洛阳，以期能“所在有警，俱可策应”<sup>⑤</sup>。

因河南提督衙门位于洛阳城内之缘故，顺治十八年（1661）裁去河南城守营参将，而改设都司一职，品级有所降低。此一状况至雍正三年（1725）得以改变，此年，“以河南府地广兵单，巡抚田文镜提准裁去都司，复设参将、守备一员，经制千总二员……经制把总三员，驻防本城一员。经制兵丁六百四十八名，内马兵一百三十四名，步兵五百一十四名。经制官马二十二匹，兵马一百三十四匹。岁共支俸饷米折马干等项银一万两千一百七两”<sup>⑥</sup>。同样，本年即陕州升为直隶州后的第二年，“以陕州面山负河，地属扼要，准巡抚田文镜题增设陕州营”<sup>⑦</sup>。自此至清末，

<sup>①</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②</sup>（民）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一《兵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三八九四页。

<sup>③</sup>（民）赵尔巽：《清史稿》卷九二《职官志四》，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三三六二页。

<sup>④</sup>《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九，康熙十一年九月丙寅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

<sup>⑤</sup>《清圣祖实录》卷四五〇，康熙二十八年十月戊戌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

<sup>⑥</sup>（清）田文镜：《河南通志》卷十一《兵制》，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sup>⑦</sup>（清）田文镜：《河南通志》卷十一《兵制》，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军队驻防稳定。洛阳城内分布有诸多军政机关，“河南卫，在府治西”、“军器局，在安喜门内街西，演武场在府城南一里”<sup>①</sup>，“参将署，在城西南隅，即旧分守道署，后为都司署。守备署，在城东北隅，府署西。把总署，在守备署东。谯楼，重楼三间，在县大街十字口，万历间，建福府，移东门内大街……演武场，在南门外，关厢东南。阔长丈数，有口记之。台基高五尺，上建前堂三间，后堂三间。旧为河南卫指挥使练军之所，今学政试武生童。城守营操演兵卒，俱隶焉”，“营仓，乾隆二年（1737）八月，河南营于河北镇标领，生息银六百八十三两一钱，买贮谷石，春借以济兵食，俟麦后，陆续扣银粟谷还仓，以备永远接济”<sup>②</sup>。这些军政机构多分布在人口较少的开阔地带或重要的行政机构附近，增强了城区的防卫能力，保证了重要衙署的安全。

除城区驻防外，清代在交通沿线设有墩台等设施，以资防卫，“墩台，口防冲路要道，营房马棚悉备，内防汛兵丁，马兵有一名二名不等，步兵有三名四名不等”，其中“河南府共三十八座，内三县无。洛阳县十座”<sup>③</sup>，分别为“洛阳县正东路，白马寺墩台营房一座。正西路七里河、谷水镇各一座。东北路十里铺、鹳店镇、三十里铺共三座。每处营房十一间，大门一间，周围墙垣三十四丈。墩台高一丈七尺，基阔一丈五尺，顶宽一丈一尺，上建望楼台，旁告示房一间，烟墩五座，木坊一座……正南路龙门镇墩台营房一座，彭婆镇、白沙镇各一座。东南路寨镇一座。每处营房八间，烟墩三座，大门、墩台、望楼、告示房、木坊同上”<sup>④</sup>。墩台相对完备的设置对于维护地方治安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洛阳周边多有村寨的分布，“洛阳城五里有墩，十里有铺，十里之外，每五里设墩台。乡村之烟户稠密者公同筑围，形势若城，亦有门有楼，特较城稍小”<sup>⑤</sup>，由此观之村寨数量当不少，且与上述墩台等军事设施共同构成洛阳城外围较为严密的防御体系。

### （三）清代洛阳城的防洪体系

中国古代城市的城墙除了军事防御、文化象征功能之外，对于临河建城的城市来说，防洪功能甚为重要。尽管洛阳城址沿洛河自东向西，一再变化，却未曾超出伊洛河冲积平原。从建城之初，防洪对于洛阳城来说至关重要。清代洛阳城在延续

<sup>①</sup>（清）田文镜：《河南通志》卷十一《兵制》，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sup>②</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③</sup>（清）田文镜：《河南通志》卷十一《兵制》，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sup>④</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六《建置志二》，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⑤</sup>（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地理类·洛阳之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页。



前代城址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城市的障水、排水体系，并且城内的坑塘等地形和道路系统也实际上承担了蓄水和排水的功能。

### 1.地势与城墙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sup>①</sup>，春秋战国时代，先民就对城址选择原则进行了总结：背山临水，既有交通运输的便利，又能依靠河流进行防御；城址地势合适，既有取水之便，又可以资防洪。由上文可知，周公营洛时即已注意到利用河流的重要性，后世各代皆充分发挥洛河对城市景观构建和航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修筑城墙、堤防来防御洪水。为说明清代洛阳城址对于防洪的作用，兹将清代洛阳周边水患进行统计：

表 2.2 清代洛阳地区伊洛河水患表<sup>②</sup>

年 份	水灾级别			灾 情 概 况
	特大	大	一般	
顺治九年（1652）	√			秋大水。
顺治十年（1653）		√		春淫雨。
顺治十一年（1654）		√		秋大水。
顺治十五年（1658）		√		七月洛阳西北境涧水溢，水高二丈，漂没近水庐舍、人口、畜产及将实禾稼。是年，伊洛溢，无禾。
顺治十六年（1659）		√		七月雨雹。 河南府水，免本年灾田租。
康熙元年（1662）		√		壬寅秋伊洛水涨。
康熙十八年（1679）			√	夏旱秋大水，稼禾将尽。
康熙四十八年 （1709）		√		夏大水，伊洛水溢，伤禾。
雍正三年（1725）		√		秋伊洛河暴涨。
清雍正七年（1729）			√	八月伊、洛、灃、涧同时暴涨。

<sup>①</sup>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乘马》（上），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83 页。

<sup>②</sup> 参考洛阳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地理志》附录《洛阳市历代水旱灾害资料统计表》，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雍正十二年 (1734)		√		秋大水, 伊洛河暴涨。 六月二十八日, 伊洛水涨与堤齐。 七月二十一日, 伊水泛滥, 夹河一带平地水深八尺, 村内行舟, 民房倒塌大半。
乾隆二十六年 (1761)	√			七月十六日, 洛、涧水涨, 南至望城岗, 北至华藏寺, 庙前水深丈余, 将木桥一并冲去, 水至十八日方落。
乾隆四十三年 (1778)			√	闰六月, 洛河涨发。
嘉庆二十一年 (1816)		√		洛水大发, 冲塌房屋, 淹坏庄稼, 弟兄八个九分家。
道光十一年 (1831)			√	洛阳等五县水灾, 地亩禾稼受淹, 收成较歉。
道光十二年 (1832)		√		八月大雨倾盆三日夜。 八月四十日, 洛水暴涨。
同治九年 (1870)		√		六月暴雨数日, 二十三日伊河暴涨。
光绪十三年 (1887)			√	八月大雨, 洛河涨。
光绪十九年 (1893)		√		先旱后淹, 秋收薄歉。
光绪二十四年 (1898)		√		自洛阳至洛汭, 两岸百余里, 庐舍、秋禾俱没。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		洛河暴涨。
民国四年 (1915)			√	六月二十四日, 水涨入东门。
民国七年 (1918)		√		六月二十七日, 洛水暴涨, 田庐破淹甚多。
民国八年 (1919)		√		七月间, 连日大雨, 山洪暴发, 洛阳首当其冲, 秋禾歉收, 嗷鸿遍野。
民国十年 (1921)		√		六月, 伊、洛河均暴涨。
民国十二年 (1923)			√	六月二十四日, 洛水暴涨, 冲塌天津桥, 近数年均未见之水也, 夹河地区塌房最多。
民国十三年 (1924)		√		七月灋水、洛水涨, 洛水冲坏新建天津桥。
民国十五年 (1926)			√	七月十三日, 洛北一带大雨倾盆, 山洪暴发, 灋水陡涨, 水深三丈余, 倾贯于城门洞之下, 水已灭顶。东南关附近, 居民淹没数千家, 房屋冲塌殆尽, 淹死男女无数。
民国十九年 (1930)		√		庚午六月十四日, 洛水暴涨。



民国二十年（1931）	√			六月二十九日，大雨如注，约一昼夜，伊洛两河同时暴发。洛河则高出堤岸一丈五尺，波涛汹涌，淹没南关，伊河溢出河岸一丈余。
-------------	---	--	--	--

从上表可以看出洛阳地区的伊洛河水系在二百余年的时间里，共发生大小水灾三十余次，平均九年一次。从时间分布上看，清代前期水灾间隔时间较长，清代中后期间隔时间逐渐缩短，民国初年更甚于清代，且水灾的破坏程度不断增大。此变化情况说明明清以来随着山区开发强度的增大，洛河流域水灾发生频率和破坏强度不断加剧，与民国初年社会动荡，无暇顾及河防工程具有一定的关系。从分布地区看，以伊洛河交汇地带发生频率为高，这与伊洛河水系的分布密切相关，洛河与伊河在洛阳东部交汇，主要支流涧河和瀍河在洛阳城两侧注入洛河，加之伊洛两河两侧山谷水的注入，呈扇形汇入洛阳盆地，而洛阳城正位于扇形中心地区。大量来水同时汇入，盆地中心地势低洼，极易造成洪涝灾害，严重者，夹河地带一片汪洋。

洛阳位于洛河中游偏下河段，洛河发源于秦岭东脉，全长 440 千米，落差 500 米。干流在山区河段较长，宜阳以下才进入平原滩地，下游河段泥沙含量大，河床松软，为典型的游荡性河流。南关地区为洛河凹岸，较南岸而言，受洛河水患危害更为严重。洛阳城位于邙山南麓台地，与河面有一定的高差，即可利用洛阳的航运、水利资源，又可抵御一定的洪水，保证城市安全。当然，河洛地区农业发展悠久，至明清时期，随着人口膨胀，大量山区被开发，造成伊洛河上游地区植被破坏严重，北部邙山地区一直为墓葬聚居地，明清时期也被开发殆尽，黄土台地，加之降水集中，极易暴发山洪。洛阳城三面环水，北靠邙山，洛阳城占据洛河北岸高地，城池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河水不易倒灌入城，即使被淹，洪水也能迅速退去。

城墙除军事防御功能之外，防洪功能亦十分重要。明代开始砖包城墙相对于之前夯土城墙更经得起洪水浸泡，月城将城门包裹在内，形成两道屏障，对于较为薄弱的城门而言，防护作用突出。城墙外之沟壕对于洪水侵袭具有一定的阻拦与宣泄作用。

## 2.沿河堤坝

尽管城址选择在有利的地势，砖包城墙、月城、壕沟等对于洪水具有重要的防御功能，而堤坝作为抵御洪水最为有效的工程，在汉魏和隋唐洛阳城防洪中多有应用，清代洛河水系洪灾的频发使得地方政府与社会对堤坝修筑颇为重视。洛阳城临瀍、洛、涧三河，其中涧河因与城区相距七里，对洛阳城的威胁较小，因而仅在桥旁边修筑石坝，以保护桥梁为主，“嘉靖三十四年（1555），伊王妃增修桥旁石坝”



①；灋河虽“夏秋有水，冬春干枯”，却因汇集邙山山洪，流程短，落差大，濒临城门、东关地区而危害大。对洛阳城危害最大的当属洛河。洛阳城南关地区，正当洛河弯曲处，水势湍急，对两岸房屋和土地造成巨大威胁。因此，主要以岩石和土坝构成了洛阳沿河地区的堤坝体系。时人从洛河水系的特点出发，对于河患频发的原因有所阐发：

洛出商州冢岭山，冬夏人可涉。至卢氏，东涧南入；犹小也。至永宁，元扈西入北入穀谷东入，乃漫大矣。至宜阳，昌谷南入，其西宜入，又其西汪洋入，又其东力辕入，又其东大宋川入，乃滋大也矣。至洛阳，灋、谷城水也，涧白石水也，皆以次入。于是，洛始大。虽不能北比洪河，凡豫州水皆莫能及也。若附以雷雨霖潦，而凤翼、鱼脊、焦绕、广阳、铁岭诸山水皆下流于洛。洛于是弥漫北浸。②

从此论述中不难发现，当时人们对洛河水系内不同河段水位的季节变化的了解已相当全面、深刻，且已注意到暴雨导致的山洪是洛河洪水的重要来源。而对于洛河洪水的危害与筑堤之目的，则有更为明确的阐述：

洛于是弥漫北浸，河南城于是没及风雨坛于是没及演武场于是没，及城外民垣屋。前守者皆莫之省也。今太守吴君廷罐曰：“罐方欲利我河南，乃且害不能祛，何居，且夫庙坛，神所也。场，武地也。神不能治，奚其治人？武不能扬，奚其振文？吾父母河南者何居？”于是选辑属县而告之曰：“某石于山，某木于川，某土于丘，某仓于竹，某铁于炉。”既乃辑吏而高之曰：“某作永宁役，某作宜阳役，某作巩役，某作浉池诸邑役。”乃作于洛杀之时，辛巳之冬，壬午之春也。乃先凿渠于洛阴，以移洛，乃筑北延防垣五里，防成而洛由地中行。③

地方官员治水的主要目的实乃洪水对城外之坛庙、民舍形成威胁，破坏严重，而之前历任主官对于此事不甚注意。坛庙、演武场作为神灵于凡间的处所和国之“大事”，故时任知府方有“神不能治，奚其治人？武不能扬，奚其振文？吾父母河南

①（清）魏襄：《洛阳县志》卷八《土地记下》，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②（明）吕柟：《河南太守吴君防洛记》，乾隆《河南府志》卷八十五《艺文志九·记三》，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③（明）吕柟：《河南太守吴君防洛记》，乾隆《河南府志》卷八十五《艺文志九·记三》，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者何居？”的认识。同时修筑府城防护工程是府境范围内的一件大事，需下属各县协助，洛河堤坝的材料石、竹、木、铁等便取自于各县。工程于冬春洛河水枯干之时开始，先将洛河改道南流，然后筑堤，堤坝长度为五里，且使得“洛由地中行”，说明当时洛河下游地区因泥沙淤积河床抬高，已成“地上河”，单纯依靠筑堤防御，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水患问题，随着上游山区开发的加剧，洛河下游地区的河患更加严重，洛阳段的堤防修筑难度与日俱增。

限于材料，难以对清代洛阳河段洛河堤防的修筑情况进行全面的梳理，但从光绪年间河南巡抚裕宽所上《河南巡抚奴才裕宽跪奏为核明修筑河南府洛河堤坝工程用过工料银数》<sup>①</sup>奏折中，即可看出洛河水患对洛阳城的威胁加剧和沿河堤坝修筑之难：“河南府有洛河一道，距城南数里，历年山水涨发，南滩淤高，溜向北滚，逼近城垣。前经该府县等劝捐筑堤一道，屡筑溃旋”。由于土坝对于洛河洪水来说防护意义不大，故“据该处绅民稟请发拟筹筑石坝”，至此洛河堤防从明代以土为主兼以石块的材料结构已被人们弃用。为稳妥起见，裕宽又偕属僚亲自察看“经奴才于查阅营伍之便亲诣于河干督同署河陕汝道陆襄越及该府县等周历勘度，并檄调孟县办公委员候补同知李庆抗会同该府县确切勘估”，才确定了堤防规模和所需经费数额与来源，“议自三柳树起至天津桥以西止，筑土堤一道，外用石坝二十道，石土乃二十座，估需银两万八千余两。于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汇入孟县等处工程案内。奏请动用粮道库帮丁月粮银两以作工需”。并且对督工人员做了较为具体的安排“该府冯光元丁忧卸事，接署知府马永修督饬洛阳知县于光明暨委员候补靳介熙等购运石方，相机兴筑”。因洛河河道的来回摆动，造成滩地施工难度极大，“该署府查马念新筑堤工，土性松浮，不足抵御。于原估工银内竭力撙节，将堤外石坝、乃间有空隙之处，相砌石岸，以期巩固”。最终“于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十八日据报工竣”，并通过验收“行司檄委候补知府张承纶验明，委系工坚料实，并无草率偷减情弊。”工程的最终规模为“记筑土堤一道，石坝二十道，石乃二十座，石岸三百九十七丈三尺五寸”，实际使用“银两万八千二百六十二两七钱四分六厘七毫，除尾零二百六十二两七钱四分六厘七毫由该府捐廉不记外，实请销银两万八千两，据藩司廖寿丰将用过工料银考开报详呈前来。”从工程最初申报时“当蒙恩准。嗣该府县动工修筑”，到最后竣工“奴才复核无异，除饬照例分析开单造册绘图取结详送题销外，相应开具清单，恭呈御览。所有核明修筑河南府洛河堤坝工程用过工料银数丝由谨会同河东河道总督臣许振翼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与

<sup>①</sup>（清）裕宽：《河南巡抚奴才裕宽跪奏为核明修筑河南府洛河堤坝工程用过工料银数》，《申报》1893年12月11日第12版，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京报全录。



中央批复“谨奏奉朱批该部议奏单并发”，证明尽管当时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依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有效的运行。与明代相比，清代的洛河堤防工程更多的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介入进行的，与明代由地方官员在辖区内独自运筹相比，清代的洛河河堤修筑则需要有中央政府的统一调度，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洛河水患的加剧和治理难度的增大。

### 3.坑塘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我国城市就已开始了相关拦蓄洪水设施的修建，尤其是降水集中时，城区范围的蓄水系统对于减缓城市洪涝压力，尽快排出积水有重要作用。汉魏时期，人们已经注意利用渠道来排涝。清代洛阳城依据地势特点，充分发挥道路网覆盖面积大的优势，加速城区积水的宣泄。

表 2.3 洛阳城坑塘概况表<sup>①</sup>

分布	名称	具体位置	储水量
东北隅	治安北街水坑	治安北街，30 平方米	60
东 南 隅	煤渣坑	位于西和巷子西端路北胡同内 50 米处，因附近居民倾倒煤渣而得名。周长 70 米，深 3 米，为不规则长圆形	918
	水孟坑	位于柳林街，为一片洼地，面积 1.36 万平方米，今为洛阳市第二十二中学	不详
	无名坑	四眼井街东头，南北长 18.5 米，东西宽 16 米，深 2.5 米	740
	莲花坑	位于柳林街，面积 2200 平方米	不详
	无名坑	文峰塔北，面积约五亩，深数尺	不详
西北隅	老鳖坑	在老城西北隅神州街西侧吴家街小学与老城煤场之间，坑边有老鳖驮碑而得名。此坑深十余丈，是老城最大的土坑，夏秋雨水汇集	不详
南关	校场大水坑	位于南关校场街南面，南至洛河，西至纸坊街，南关大街雨水自然流向该坑，	不详
西关	黄梅路水坑	2016 平方米	6048

旧时洛阳城区分布有自然或人工坑塘，是道路排水的汇集处。居民生活废水主要倾倒入路面，“在洛阳城里，街道都比人家的房屋要低下几尺。因此一遇到雨天，

<sup>①</sup> 数据采自洛阳市老城区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老城区志》附录三《旧时老城坑塘辑要》，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61 页。



人家屋檐上的雨水尽向街道上趟，无处宣泄，便把街道变成一条小河，泥泞满街，行道不易”<sup>①</sup>。街道积水较少时，主要是自然蒸发或下渗地下，雨量大、积水多时则沿街道汇入附近坑塘中，溢出则顺街道涌往护城河中，最终汇入瀍河和洛河。东北隅的闸口和东南隅的水道口为主要的出水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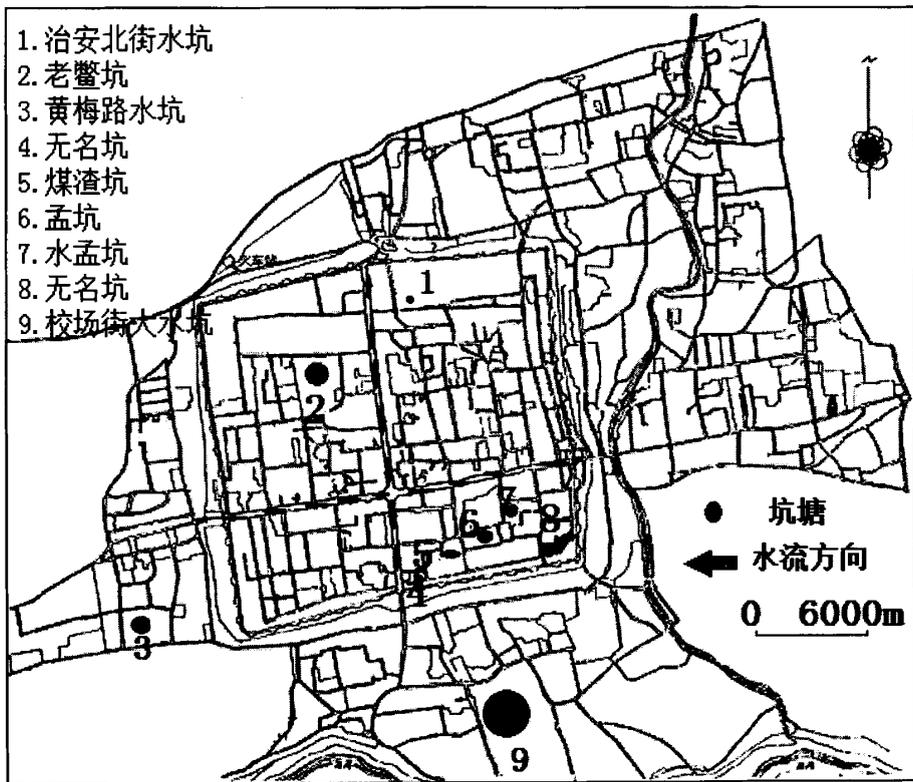


图 2.2 清代洛阳城坑塘与水流分布图<sup>②</sup>

从坑塘分布可知，洛阳城的坑塘主要分布于城内东北和东南隅，与城区地势一致，位于城区主要街道周边，接纳该区域内的来水。老鳖坑位于城区西北隅南侧，本区内来水顺地势汇入其中，因其坑深十余丈，储量颇大，故常年积水，蚊蝇丛生，环境恶劣。水孟坑为柳林街附近一片洼地，莲花坑、无名坑等分布于其周边共同组成南城部分的主要储水区，通过水道口街而穿城墙，流入南关与洛河相连的校场大水坑。坑塘汇集城区雨水而有一定面积的水面亦能改善城内局部地区的景观环境，

<sup>①</sup> (民)倪锡英：《洛阳》，南京出版社 2012 年版，154 页。

<sup>②</sup> 据高元池等：《洛阳建筑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 页，《公元 1933—1945 年洛阳县城地图》改绘。



文峰塔为洛城东南隅名胜，“登之可见全城，其北有潭约五亩，水深数尺，水面密布水草，可以佐文峰之胜”<sup>①</sup>。

城内坑道与街道系统联系密切，如南关大街雨水自然流入校场大水坑。当时街道两侧并无水沟等泄水设施，雨水主要依靠自然地形流走。而且街道较两侧较低的状况也加大了街道的汇集雨水的面积，“在洛阳城里，街道都比人家的房屋要低下几尺。因此一遇到雨天，人家屋檐上的雨水尽向街道上淌，无处宣泄，便把街道变成了一条小河，泥泞满街，行道不易”<sup>②</sup>。南北东西主干道承担街巷等分支道路的来水，北高南低的地势和较为平直的道路格局，使得积水能较为便利的汇集于城内低处之坑塘，当坑塘饱和后，街道又作为坑塘与城外护城河的沟通渠道，将城内积水通过东北隅和东南隅的闸口泄入瀍河和洛河。水道口街口的城墙下的水洞口，三米宽一米高的半圆形青砖拱券，为城内雨水向外流出之地。

依据民国初年所修排水干沟流向，可知洛阳城区水流的具体路径：南大街自十字街向南，流入南城壕；北大街以吴家街为分水岭，北段流入北城壕，南端向南经十字街接入东大街干沟向东于大石桥附近入瀍河；西大街以仙果市街为分水岭，西段向西流入西城壕，南段向东接入东大街干沟<sup>③</sup>。

## 小 结

清代洛阳城更多的是在金、明城池基础上的修补，延续周王城与隋唐洛阳城的选址原则，充分利用地形地势等有利条件，城池防御特色突出。洛阳城与同时期河南布政使司所辖的府级治所城市相比，规模并不突出，甚至不如有些县城的占地面积。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的战略价值，使得城池的各项指标都高于他处，凭借其濒临的涧、瀍、洛等河与邙山构筑其防御体系。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区人口规模的增加，关厢地区不断扩大，自明末修筑关城以防御寇盗。清代则因局势稳定，仅修筑土墙以便管理。瀍、洛等河既为城市提供用水之便和藩护，也因汛期水量过大而威胁城市安全，加之邙山植被破坏严重，多雨时节山洪暴发，使得城市防洪压力增大。除了城墙、壕沟和堤坝外，城内外分布的坑塘洼地蓄积大量雨水，北高南低的地势与以南北东西干道为骨架的街巷网络实际上承担着储蓄与宣泄城区积水的功能。

<sup>①</sup> (民) 苏从武：《洛阳县小志》第十八章《名胜古迹》，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sup>②</sup> (民) 倪锡英：《洛阳》，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sup>③</sup> 洛阳市老城区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老城区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 三、清代洛阳城街巷格局与商贸空间

道路作为城市空间的骨架，将城市空间切割成不同的街区，进而构成城市空间的基本格局形态。平原地区城市道路格局往往为方格形，且城墙城市中“由于城门决定着城内外的交通，因此城门的数目与布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内的街道网络和渠系”。城厢地区的街道因“城门沟通城市与腹地扇形区域间来来往往的全部交通”，故经济发达，街道发展多自发性，缺少城墙内诸多礼制的规范制约。交通便利地带，各方物资交流和人员往来频繁，尤其是“靠近城门外的地区是乡村居民服务的集市和商业最有利的地方”，逐渐形成城市的主要商贸空间。<sup>①</sup>

#### （一）清代洛阳城内街巷分布格局

洛阳城建城历史悠久，虽然城址几经变化，但传统礼制对于城市规划的影响依然深刻。程朱理学渊源于此，明清时期洛阳地区依然是理学渊藪之地，“天地之中”的空间观念，使得清代洛阳城的街道布局规范性较强。此外，具体的营建布局并不完全按照礼制要求执行，而是基于现实需要和实际状况做出选择。

##### 1. 街巷结构与微观地貌

清代洛阳城近乎正方形，东西、南北城门对开，中间形成垂直相交的十字街。因古代不同方位的城门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如东、南、西、北四门可分别与春夏秋冬四季相联系，南门象征暖和生，北门象征着冷和死<sup>②</sup>。因此多以南门为最重要，北门则多封闭，乃至没有，明清北京城北门几为废弃便为明证。洛阳城北门依然开启的原因，当因位于邙山南麓，山南为阳且有山地阻挡，寒冷空气难以进入，同样，因逼近邙山，北关地区面积狭小，人烟稀少，因而北门在四门中不为重要。

十字大街将全城分为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个部分，其余街巷在此区域内布局。南北城门位于城墙中间位置，东西城门则位于城墙偏南的部分。因此，造成东北隅与西北隅面积比西南和东南隅面积大一倍左右。南北大街因居城中央而成为中轴线。从整体而言，各区域内的街道仍以南北东西交叉为主，却没有形成对称结构。说明城内街道的形成除主干道有意为之之外，更多的并未遵守沿中轴线对称分布的惯例，而是依据开发程度而自发形成的。单纯计算道路分布密度已无法说明区

<sup>①</sup>（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4—108页。

<sup>②</sup>（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8页。



域的开发程度与各自特点，而具体分析各自区域的功能组成情况，则似更能说明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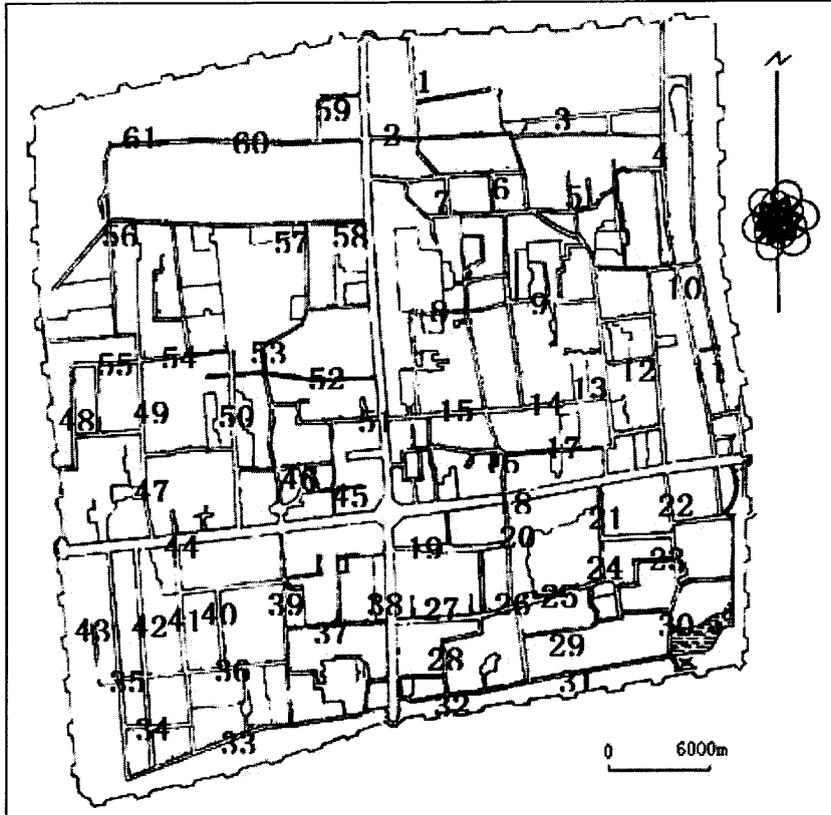


图 3.1 清代洛阳城区街道格局图<sup>①</sup>

注：1. 三交街 2. 保安街 3. 仓库外 4. 府东街 5. 县后街 6. 莲花街 7. 榕树街 8. 府西道 9. 府东道 10. 三官庙街 11. 高升街 12. 人和巷 13. 清凉寺街 14. 东华街 15. 西华街 16. 正阳门 17. 捕厅街 18. 东大街 19. 解元街 20. 御路街 21. 奎楼街 22. 当铺街 23. 草场街 24. 斜街 25. 府学门前街 26. 簾子街 27. 三府街 28. 广平街 29. 孟家坑 30. 柳林街 31. 仁和巷 32. 水道口 33. 大坊街 34. 齐家街 35. 城隍庙街 36. 无量殿街 37. 察院街 38. 南大街 39. 府下坡 40. 马胡同 41. 魏家街 42. 井胡同 43. 马王庙街 44. 西大街 45. 鸡市街 46. 老集 47. 仓口街 48. 府城隍街 49. 大牌坊 50. 乡范街 51. 萧家街 52. 吴家街 53. 水陆堂街 54. 旧卫口 55. 后花地 56. 石牌坊 57. 吴家街 58. 丁家街 59. 俭王街 60. 同王街 61. 马道街

东北城区主要大街东西向的有粮厅街—捕厅街、西华—东华街、县后街—莲花寺街—榆树园街、新建仓街—俭王街，将该区域自南向北分为四个区域，县后街—

<sup>①</sup> 据高元池等：《洛阳建筑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 页，《公元 1933—1945 年洛阳县城地图》改绘。



府后街—猪市街（老集）以南与粮厅街—捕厅街以北地区，在明代为福王府所在地，清初河南府署“于城西南隅，寄治民舍。康熙二十八年（1689），知府汪辑移驻东北隅，旧提督府。在明福藩废府内”<sup>①</sup>，洛阳县署“万历四十二年（1614）修建福府，移城东北隅，迎恩巷之北”<sup>②</sup>。此外，府县所属僚佐衙门，如经历署、县丞署、教谕署等皆位于其周边，占据旧福王府地块。因此，南北向的县西街、县东街、府西街、西马道等皆为衙署区外侧辅助街道。粮厅街—捕厅街与东大街之间主要为董宣祠等祠庙分布。新建仓街、俭王街以北地区多为荒地，直至清末民初才逐渐开发，街道增多。榆树园街附近因有大坑，也颇为荒凉。南北向的高升街、县东街、迎恩巷（县下坡）、正阳门、西马道与东西向街道相连。还有油坊胡同、清凉寺街、三官庙街等小型街巷。

西北城区被东西向的吴家街、神州街、水陆堂街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地区因地势低洼，主要以荒地为主，至清末民国时，桑园街、建安街、万安街才逐渐形成。北城门附近有马道街、玉皇庙街和东西向的同王街、三义街，南部地区南北向的仓口街、大关帝庙街、香坊胡同、乡宦胡同、鸡市胡同将该区域分割开。城隍庙位于最西，附近有城隍庙前、后街，大关帝庙与乡宦胡同之间为旧河南府。老集、卫口街以西，萧家街以南为集市和居民区。此区域因清初一系列机构裁撤而趋荒凉，“后察院，在城西北隅，三皇庙西，今废”，“通判署，在城西北隅。旧府署西。乾隆九年奉文移驻嵩县伏牛山孙家店镇”，“推官署，在城西北隅，三皇庙西，康熙六年裁缺，署废”<sup>③</sup>，“府常平仓，在城西北隅，今并贮新建仓”<sup>④</sup>。

西南城区，南北向大街有城隍庙街、井胡同、齐家街、魏家街、旧府下坡、敦子街、察院街、亨通街，自西向东分布；东西向主要有马王庙东、西街、营坊胡同、察院后街、里仁巷等。此区域多为参将府及其附属机构，街道名称和格局亦受其影响。此外，还有同姓聚居而形成的街道，如温家街、姚家园。此区域街道在四城区中最为稀少，既与军事机构较多有关，也受狭小面积的制约，居民数量有限，且商业不甚发达。

东南城区道路较为弯曲凌乱，没有形成同西南城区般比较整齐的道路格局，当与此区域军事、行政机关分布较少有关。东西向道路有解元街、三府街、水道口街、人和巷、府学门前街、孟家坑、草场街；南北向街道有簾子胡同、二簾胡同、广平街、御路街、中和巷、遵道街、四眼井街、柳林街等，此外还有位于大型建筑鼓楼

<sup>①</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署廨》，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②</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署廨》，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③</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署廨》，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④</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仓庾》，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附近的古楼街、奎楼街，因靠近南关，水路交通便利，商业颇为发达，居民亦较多，形成些专业性质的街道，如豆腐街、裱褙胡同等。

## 2.街巷规模和名称

清代洛阳城的街道以土路为主，且路面普遍低于两侧房屋。街巷的重要性通过其长短、宽度、功能，甚至名称体现出来。一般而言，官署、寺庙等建筑多临街布局，道路较为笔直，通达性好。居民区尤其是平民聚居区，道路狭窄弯曲，往往为胡同结构。商业聚居区本身便要求通达性，以满足其流通需求，而店铺的占道经营又占据一定的路面，限制了道路的通行能力。

### (1) 街巷规模

街道规模因受两侧建筑限制，较为稳定，因此近现代的道路数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代的情况：

表 3.1 清代洛阳城主要道路概况表<sup>①</sup>

街名	长度 m	宽度 m	走向	方位
东大街	568	7	东西	兴华街至东门口（新街）
南大街	535	10.5	南北	兴华街至南门口
西大街	676	6	东西	西门口至兴华街
北大街	1192	7.4	南北	北门口至中州东路
柴市街	119	6	南北	南起马路街，北至西关花坛
荆笆街	328	5	东西	东起柴市街，西至黄梅路
水坑沿街	380	6	东西	东起西环巷，西至黄梅路
五贤街	340	6	东西	东起豫通路，西至定鼎南路
大西关	550	7	东西	东起盐店口街，西至五贤街
锁市湾	320	3	南北	南起盐店口街，北至新建街
盐店口街	250	5.5	东西	东起马市街，西至豫通街
马道街	400	4	L	东起北门口，西折至同化街
玉皇庙街	300	4	T	东起北大街，后而折至同化街
三义街	200	5	东西	西接育才街，东通北大街
同王街	230	5	东西	西接育才街，东通北大街
吴家街	150	4.6	东西	东起北大街，西至广川街
丁家街	160	5	东西	东起北大街，西至神州街
萧家街	300	4	东西	东起北大街，西至集市街

<sup>①</sup> 道路数据主要采自洛阳市地名办公室：《洛阳市地名志》，1992年油印本；洛阳市老城区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老城区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水陆堂街	280	4	东西	东起神州街，西至义勇前街
大关帝庙街	415	5	南北	南起西大街，北至义勇北街
府城隍庙后街	120	4	南北	南起府城隍庙，北至义勇西街
乡宦胡同	340	4.5	南北	南起西大街，北至义勇东街
老集街	285	6.6	南北	南起西大街，北至义勇东街
西华门（街）	150	4	东西	西起北大街，东至东华门
东华门（街）	145	4	东西	西起西大街，东至西华门
俭王街	127	5	东西	东起治安街，西至北大街
莲花寺街	411	5	南北	南起北平街，北至治安南街
新建仓街	320	7	东西	东起人民街，西至治安南街
县东街	530	11.3	南北	南起民主街，北至小北门
县后街	300	4	东西	东起人民街，西至莲花寺街
府后街	315	4	东西	东起人民街，西至莲花寺街
猪市	250	5	东西	东起北平街，西至北大街
北营门	282	5	南北	南起中州东路，北至右安街
碑坊里	145	4	东西	西起图书馆街，东不通
府西道	180	4.8	南北	南起中州东路，北至西平街
西马道	180	7.3	南北	南起中州东路，北至东平街
经厅街	396	4—6	东西	东起太平街，西至左安街
油坊胡同	80	3.5	东西	东起太平街，西段不通
人和巷	120	4	东西	东起民主街，西至太平街
粮厅门	220	4	东西	南起东大街，北至中州东路
正阳门	160	3	东西	东起正义街，西至老城商场
捕厅街	310	5	东西	东起文化街，西至正义街
清凉寺街	180	6	南北	东起民主街，后北拐同中州东路
县西街	115	4.8	东西	东起民主街，西至太平街
三官庙街	70	4	东西	东起康乐巷，西至人民街
县下坡	411	7	南北	南起东大街，北至民主西街
高升街	350	4	南北	南起东大街，北至民主东街
马王庙东街	467	4	南北	南起马市街，北至公园巷
马王庙西街	320	4	南北	东起公园巷，北折至西大街
城隍庙胡同	240	4	南北	南起安乐南街，北至西大街
井胡同	387	4	南北	南起连生街，北至西大街
齐家街	225	4	东西	东起志仁里，西至公园巷
魏家街	410	5	南北	南起顺城西街，北至西大街



里仁巷	221	4	东西	东起仙果市街，西至魏家街，中交马胡同
马家胡同	150	3	南北	南起营林街，北至里仁巷
营林街	221	4	东西	东起敦志巷，西至魏家街
炮坊街	200	4	东西	南起顺城东街，北拐营林街，西通志仁里
旧府下坡	185	5	南北	南起敦志街，北至西大街
敦子街	150	5	南北	南起顺城东街，北至仙果市街
仁义胡同	221	2.6	南东	南起农校街，东拐同南大街
察院街	223	4	东西	东起南大街，西至仙果市街
亨通街	150	4	东南	东起南大街，南折通顺城东街
顺城西街	248	4	东西	东起顺城东路，西至安乐南街
顺城东街	250	4	东西	东起南大街，西至顺城西街
解元街	240	5.5	东西	东起豫路街，西至南大街
簾子胡同	110	2.5	南北	南起三复街，北达鼎新街
御路街	180	5	南北	南起三复街，北至东大街
草场街	156	4.2	东西	东起明新街，西至道尊街
当铺街	320	5	东西	东起成功街，西至操场街
府学街	211	5	东西	东起道尊街，西至三复街
水道口巷	67	4	东西	东起西和巷，西至南大街
广平街	214	2.5	南北	南起水道口街，北至三复街
二仙巷	—	—	南北	南起南门口，北至水道口
人和巷	737	4	东西	东起文峰塔，西至水道口街
孟家坑	270	3.5	东西	东起四眼井，西至中和巷
四眼井街	276	5	北东	北起文明街，东折通柳林街
柳林街	411	4	南北	南起东和巷，北至操场街
南门口街	105	10	南北	南起马市街，北至南大街
凤凰街	253	6	南北	南起菜市街，北至马市街
马市街	750	6	东西	东起南门口街，西至盐店口街
贴锅巷	301	6	东西	东起吕氏街，西至南门口街
骡市街	375	6	东西	东起小石桥前街，西至校场街
小石桥街	140	6	东西	东起小石桥，西接吕氏街
饮马街	160	4	南北	南起农田，北至马市街
抽丝胡同	110	3	东西	东不通，西至凤化街
华章街	175	4	东西	东起菜市西街，西至菜田
雷家口街	130	5	南北	南起城城街，北至菜市西街
土城岭街	114	3.5	南北	南起洛河堤，北至雷家口



纸房街	105	3.5	南北	南起南关菜地，西拐接菜市东街
校场街	766	5	南北	南起纸坊街，北至贴廓巷
新街	480	6	南北	南起小石桥，北至东门口
大铜驼巷	630	4	南北	南起东关大街，北至民族路
小铜驼巷	650	4	南北	南起东关大街，北至大铜驼巷

洛阳老城有“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之说，解放前共有街道 148 条<sup>①</sup>，上表中 93 条街道，主要结合清代地方志和地名志等资料整理出来，因尚有五十余条街道为民国年间新辟而未收入，尽管上表不能囊括清代洛阳城区的所有街道，但也可以反映清代洛阳城道路的大致状况。其中以北大街最长，为 1192 米，因东西大街位置偏南造成；较短的街道如水道口街仅 67 米，许多半截胡同更为短小，以至时间久远而不存在，绝大多数街道长度都在 500 米左右；最宽为南大街 10.6 米，与南关地区水路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有关；最窄广平街仅 2.5 米，大多数街道宽度在 4—7 米之间。至于街道的整体面貌则是“城关衢街较为整齐，但不甚宽敞，亦不方正。而各商家扫地之土及一切秽水，人往往随意倾注，臭气难闻。而小街狭巷之弯曲处，往往粪尿聚集，过者掩鼻。又天气燥时，灰气喧腾，雨时则泥泞不堪”<sup>②</sup>。

## （2）街巷名称

街巷名称，作为地名的一种类型，具有典型的区域性和一定的延续性，反映城市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状况。通过对清代洛阳城街巷名称的分析，以探讨清代洛阳城的城市空间特点。清代洛阳城街巷的命名特征可分为以下几类：

### 甲、以地理环境和典型景观命名

清代洛阳城区内地形较为多样，且政府出于文化统治需要修建的一系列高大的礼仪性建筑，都成为人们分辨方位的重要标识。如此便有与之密切相关的街巷名称出现，如水坑沿、孟家坑、坑沿街因周边分布有坑塘而得名；榆树园街则因附近坑塘积水，榆树茂密；还有井胡同、县下坡、旧府下坡等。

### 乙、以行业命名

清代洛阳因交通便利，成为商品集散地和中转站，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发达，许多店铺、作坊聚集分布，同一街巷往往为同一行业所占据，出现了许多以行业命名的街巷，如荆笆街、锁市湾、盐店口、马市街、鸡市胡同、豆腐巷、贴廓（铁锅）巷、骡市街、柴市街等。

### 丙、以庙宇寺庙命名

<sup>①</sup> 洛阳市老城区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老城区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7 页。

<sup>②</sup> （民）苏从武：《洛阳县小志》第十七章《交通》，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清代洛阳城寺庙颇多，以至有“十字路口都有庙”<sup>①</sup>的说法，寺庙成为附近街区的活动中心，尤其庙会时更为全城所瞩目，如华藏寺街、玉皇庙街、莲花寺街、圆觉寺街、三官庙街、马王庙街、水陆堂街、无量殿街、二仙巷、清凉寺街、大关帝庙街、府城隍庙街等。

#### 丁、以官署等职能建筑命名

在清代，城内官署衙门等机构较城墙更能显示统治权威，府、县衙门占地颇广，因而围绕其附近形成一系列街道，如县东、西街、县后街、府西街、经厅街、捕厅街、察院街、三府街、御路街、草场街、马道街、旧府街等。

#### 戊、以吉祥含义命名

地名往往能表达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景，在传统社会重视教化，同时也体现了城市文化习俗和人们的居住心理，故这样的街名在城市中颇为常见，如仁和巷、迎恩巷、高升街、人和巷、广平街等。

#### 己、以住户姓氏、社会地位等命名

清代洛阳作为一个消费城市，居民区占城区面积的比重很大，街巷名称在一定程度上是住户的姓氏、社会地位、职业状况的反映，如吴家街、丁家街、萧家街、魏家街、解元街、吕氏街、雷家口等。这些街名还可以反映出街区的居民迁移情况。

#### 庚、以“门”命名

“门”在古代城市中象征着通达性和权力，因其显著性而成为一些街道的名字。清代洛阳城以门命名的街道，如西华门街、东华门街、正阳门街因是明福王府门前街道而得名，府学门街位于府学正门前而得名，此外还有南门口街等。

以上几种命名方式占清代洛阳城街巷名称的绝大多数，同样，此类命名方式在同时期的相同类型城市中也颇为常见。但不可否认，因街名的延续性，具体的街道名称对反映城市变迁、地方环境、风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二）清代洛阳城外街巷分布格局

城市化以道路扩展为先导，据鲁西奇等人的研究，唐宋时期许多地方城市即有城下街区的存在，至明清时期关厢地区已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②</sup>。因此，对清代洛阳城城关地区道路格局进行研究，可以了解清代洛阳城关的具体范围，亦可窥察影响自发方式道路扩展的因素。

<sup>①</sup> 寇北辰：《洛阳天爷庙》，王文英主编：《洛阳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2007年。

<sup>②</sup> 详见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第149—274页。



### 1.四关街道结构

清代洛阳城东、西、南、北四个城关，因各自具体区位条件的差异，在清代的发展差距颇大。北关地区直到清末汴洛铁路开通才逐渐兴盛，东关、南关地区因水路交通便利，一直为清代洛阳的繁盛之区，西关地区尽管也有陆路交通的便利，环境优越，但更多的成为祠庙聚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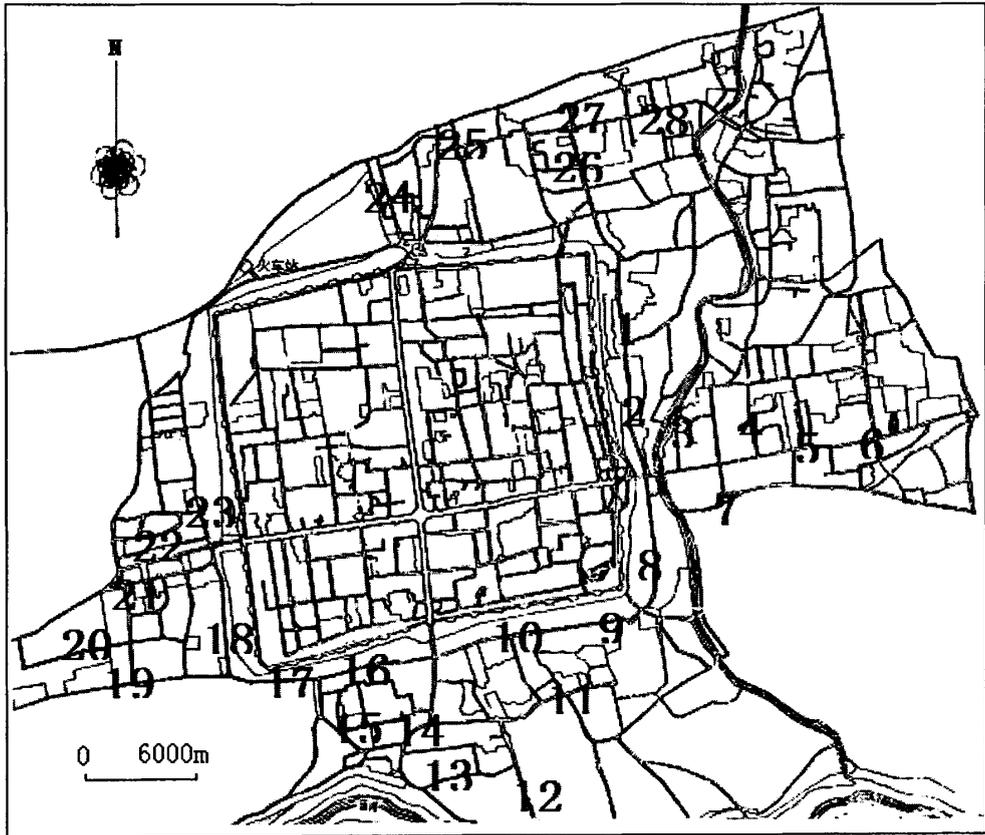


图 3.2 清代洛阳城四关街道格局图<sup>①</sup>

注：1.兴隆街 2.闸口街 3.大、小铜驼巷 4.夹马营 5.东关大街 6.双龙巷 7.下园 8.新街 9.骡市街 10.贴郭巷 11.校场街 12.纸坊街 13.菜市街 14.凤化街 15.饮马胡同 16.马市街 17.盐店口 18.锁市湾 19.大西关 20.五贤街 21.22.柴氏街 23.荆笆街 24.解市街 25.邙麓街 26.南新安街 27.西新安街 28.东新安街

东关地区于清代洛阳城四关中规模最大，以东门与内城区分，瀍河以西地区以东关大街为界，北侧为闸口街，南侧为新街，两街皆为南北走向，新街以南为东西

<sup>①</sup> 据高元池等：《洛阳建筑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 页，《公元 1933—1945 年洛阳县城地图》改绘。



向的小石桥街，西与南关吕氏街相连接，共同构成东南侧的环城通道。东关大街经大石桥（广济桥）往东延伸，为西通陕、蜀，东接开封要道，商旅、使节往来频繁。大、小铜驼巷呈环状分布于大街北侧，其东为火烧街（双龙巷）、夹马营，八空窑街为夹马营西侧胡同。大街之南为南北向的石堰头街，此区域内主要分布有太祖庙、贾太傅祠等庙宇。下园街在清末逐渐形成，为东西走向，与石堰街相连。另据塔湾清真寺记载，此地区在清代为回民主要聚居区，至民国年间，居民数量已相当可观。回民主要从事经商贸易等活动。东关地区道路结构以东关大街为轴线，南北对称，整体呈带状分布。北侧街区规模较南为大，主要因为南侧为灋、洛交汇处，洪灾较为严重。

南关地区以南门口街为轴线，西侧与自西向东的东西向街道盐店口、马市街相连；东侧依次为东西向的贴廓巷、骡市街（吕氏街）。由马市街引出的南北向的饮马胡同，直抵达洛河。南关大街往南延伸与大致呈南北向的雷家口、土城岭街相连。“演武场，在南门外，关厢东南”<sup>①</sup>，因而在贴廓巷、骡市街以南有“L”形的校场街，西与南北向的纸坊街相连，南抵洛河。此外南关地区聚居人口较多，还有袁胡同、花园街、苏家胡同、尚家庄等街巷。因南关地区位于洛河北侧凹岸，水流冲击严重，洪灾频发。主干街道多为东西走向，且位于北部地区，南部为小规模简易道路，与洛河相连，以便取水与转运洛河上下游之货物。

西关地区因涧河距城较远，因而地域规模颇大，又因“此地半系军地，为卫出租”<sup>②</sup>，相对于东关和南关而言，居民数量稀少，尽管少去了洪水危害（就清代洪灾发生频次来看），却因此地多为军地，且无洛河水运的便利，较为荒凉。不过相对于北关，豫通街（大西关）作为豫陕通道，陆路交通优势明显，西门口街往东，依次为东西向相连的荆笆街、周公庙街，周公庙南侧为与豫通街相连的五贤街。南北向的柴市街、锁市湾与豫通街、盐店口相接。如此形成围绕内城西、南、东三面的环城道路，柴市街—锁市湾—盐店口—马市街—贴廓巷—骡市街（吕氏街）—小石桥—新街—闸口街，作为外城交通要道，但其路面状况令人堪忧，“洛阳为入陕冲途，故自古行人、客商往来极多，道路多陷深沟，土渲尘多，雨后泥泞难行”<sup>③</sup>。

北关地区因“北郭紧贴邙山，故地甚狭”<sup>④</sup>，街道也甚少，南北向的北门口街为此处主要街道，其余三空桥街、黄家疙瘩街、西沟街等，道路皆不规整，沿邙山南麓，随地形而变化。1908年汴洛铁路开通，车站设于此处，开始发展，逐渐形成了“十”形的新安街等街道，至民国年间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商业区。

<sup>①</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②</sup>（清）魏襄：《洛阳县志》卷一《地理·里保》，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③</sup>（民）苏从武：《洛阳县志》第十七章《交通》，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sup>④</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 2. 桥梁

清代洛阳城三面临河，四面皆有城壕，桥梁成为城内外沟通的重要交通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洛阳城道路交通的咽喉。洛、瀍、涧三条河流径流量季节变化大，夏秋季节水势凶猛，对桥梁安全造成巨大威胁，清代洛阳城主要有广济桥、仁惠桥、东城壕桥、三空桥、史公桥、七里桥、洛河岔桥、铁器街桥等。

洛阳城壕四门皆建有桥，位于城门处，据乾隆《洛阳县志》“今城关全图”看，西城门和南城外城壕上皆有桥。西城壕桥“原为3孔，年久淤塞，尔后又在桥上建桥，故称‘桥上桥’。此桥为明洪武六年（1373）河南卫使陆龄凿城壕时所建。后屡经修葺，至洛阳解放时尚能通行汽车”<sup>①</sup>。南城壕桥为两孔，因南关地区商业发达，店铺侵街现象严重，桥南北两侧房屋相连，人们无法看到水和桥，故称之为“走桥不见桥”。东城壕桥“康熙五十六年（1717），吏员黄裳建”，北城壕桥亦名史公桥，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监生史迁捐建”，此后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仁惠桥“在县东南濠外，明嘉靖中守道狄公重修，亦曰狄公桥，俗名小石桥”<sup>②</sup>，由上文可知，小石桥正位于南关与东关道路的连接部位，对于沟通环城道路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南关、东关商贸往来频繁的情况下，修筑此桥意义颇大。

瀍河因临近东门，交通与防洪意义重大。瀍河桥，又名广济桥、大石桥，“西通陕、蜀、云、贵，东达汴，北抵京师，实当要冲”<sup>③</sup>，然而由于“府城地势北高南下，每当夏秋雨集，则潦水大至，虽江涛之怒不是过宜，其桥之难成而易坏也”<sup>④</sup>，并且瀍河河道变化频繁，“瀍水所经，岁久成巨沟，其深五六丈，广加三之一”，导致“历年既久，桥之作废，不知其几”。成化年间已有石桥，陈宣“尝询诸故老，成化间有断石”认为工期短，颇为得意，“功仅一月而桥成，平坦壮固，通诸夏，视皆不杀焉”<sup>⑤</sup>。这也为“旧为木桥”说提供了依据。至嘉靖年间，虽“率以石为脚，架木其上，岁屡坏于潦水而为费尚少”，但知府刘本“因其坏，易之以石，积数年乃成，更名曰中州瀍桥，其下为石空三，而其上附以石栏饰之行者。虽改观而其费不贲矣”，但本地居民对此却不以为然，“乡人既病其为空太密，不能当潦水之怒，曾未逾年果复为潦水所坏”<sup>⑥</sup>。后“值府境大饥，兴作之事不敢言，而桥当南北通衢，亦不敢久废，俟民稍苏，乃会同知王公用宾、通判郝公祜、徐公景通、推官冯公伦与谋曰：‘桥成而易坏，策作之者来得其道耳。’试以其意作之，遂令匠氏石其两岸

<sup>①</sup> 洛阳市老城区志编纂委员会：《洛阳老城区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sup>②</sup> （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③</sup> （明）陈宣：《瀍桥铭》，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三《艺文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④</sup> （明）刘健：《河南府重修瀍河桥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三《艺文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⑤</sup> （明）陈宣：《瀍桥铭》，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三《艺文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⑥</sup> （明）刘健：《河南府重修瀍河桥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三《艺文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及府于其中，以木太作一空属之，以铁麟比若完木然，广视其沟而深过之，其上镗砖三重，然后平之，以土石。自成化乙巳（1485）冬至明年夏仅三时而成，视其前石作者，费不及十一，而深广坠朴足以容怒涛而垂永久”<sup>①</sup>，充分利用了旧有物资，“石取废桥，砖取废浮图，木取之市而归其值”<sup>②</sup>，后“嘉靖中，邑司礼监黄锦重修至今”<sup>③</sup>，时至今日，广济桥仍在在使用。

涧河桥与灋河桥东西遥相呼应，共同扼守洛阳东西大道，涧河也因“其源无常，惟冬及春悠悠晶晶汲落势缩。入夏以秋则众涉皆集□□宏汨其汲□洋其势，汹涌风风四间其声”，最初无桥，故“往来之人不免僵裂覆与走阻行之愁叹者”，遂建木桥，却“水涸而建，水涨则倾，飭旧增新，殆无虚岁……徒艰民力而人之愁叹，病涉自若也”。明正统十年（1445），知府袁定修石桥，“筑其址以石，而鳞其砌为三洞，高四寻，长四十丈，广四丈”<sup>④</sup>。后来“嘉靖三十四年（1556），伊王妃方氏增修桥旁石坝。万历二十三年（1595），邑人许栋、道人杨一安重修”<sup>⑤</sup>，沿用至民国时期。

北关地区因沟壕颇多，而修有三空桥，“明嘉靖二十四年（1546），邑人潘仁建。本朝雍正十年（1732），邑人寇献策募修”<sup>⑥</sup>。由于北关地区面积狭小，居民稀少，且无山洪河患，桥梁受损较小，地位也不甚重要，故在清代的修葺较少，相关记载也不多见。

洛河因河面宽度在丰水期与枯水期相差巨大，水势较灋、涧二河也为凶猛，当时造桥难度颇大，故采取冬桥夏舟的办法，因而有洛水正南渡口岔河桥，先后经“乾隆七年（1742），监生高鼎辅、沈如铜、董冕、吏员马泽如同修。八年以后，高沈董又捐修”。县东南五里铁器街岔河桥，“乾隆八年（1743）监生李恩智捐修”。至民国时期，这一惯例依然沿用，“城南洛河桥例以阴历十月初一日建筑，之次年清明后拆毁……夏秋水盛则有摆渡以渡行人，不取值”<sup>⑦</sup>。南关地区的浮桥主要有“上浮桥，在府城西南。中浮桥，在府城南三里。下浮桥，在府城东南”<sup>⑧</sup>。此三桥以中浮桥最为重要，处于风华街南，为交通要冲。

<sup>①</sup>（明）李贤：《河南府□建涧河桥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三《艺文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②</sup>（明）刘健：《河南府重修灋河桥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三《艺文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③</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桥梁》，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④</sup>（明）李贤：《河南府□建涧河桥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三《艺文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⑤</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桥梁》，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⑥</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桥梁》，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⑦</sup>（民）苏从武：《洛阳县志》，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sup>⑧</sup>（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卷四百三十《河南府部下》，二六一二页，中华书局 1988 年。



### 3.渡口

洛河自西向东，横穿洛阳盆地，伊河由西南向东北，至偃师县境内汇于洛河，两河之间形成平坦、肥沃的夹河地带，也是洛阳地区农业最为发达、人口最为集聚的地区。在伊、洛河上架桥难度颇大，即便至民国初年的天津桥，运用西方建桥技术与材料，依然难以经受洛河洪水冲击。清代，伊、洛河上主要采取“夏舟冬桥”的策略，上文提及的铁器街岔河桥、正南渡口岔河桥就是冬季所建之桥。此外，洛河上主要渡口还有桃园渡口、白庙渡口、枣园渡口、龙虎滩渡口、三山渡口和负庄渡口。洛水津当即正南渡口岔河桥位置，为洛阳城与南部地区来往之主要渡口，与龙明津（阙塞）一道为南北交通要道，故“设水夫二名”<sup>①</sup>。其他渡口皆位于重要村镇，如负庄为处于洛阳、宜阳两县交界位置，人员往来频繁。且多为地方有力之人捐修，“辛店濒河，行旅苦之，登修桥船，终老不辍”<sup>②</sup>。

### （三）清代洛阳城的商贸空间

商业活动是城市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城市地位的直观体现，清代商品经济和城市化发展无不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洛阳“自三代、汉晋以来，旧为国都，官府所萃止，商贾所占集，有不同于他州县者。今河南布政使司虽治开封，而洛阳尤当车马之冲，为河南一大都会”<sup>③</sup>。城关范围内的集市与商贸街区，具有典型时空分布特点的庙市和外地客商基于种种考虑兴建的会馆，以及区域城镇体系共同构成了清代洛阳城的商贸空间，分析各类商贸空间的形成原因、分布组合状况，对于了解清代洛阳城和豫西地区的经济结构及地理格局具有一定意义。

#### 1.集与商贸街区

##### （1）集

山根幸夫教授在《明及清初华北的市集与绅士豪民》<sup>④</sup>一文中，通过对明清华北地区方志材料的分析，指出华北地区的市集在明代中期大量出现，后经明末清初动乱，至清代前期再度兴盛，并强调府县官与地方士绅在集市设立中的作用。其中，还利用国内罕见的弘治《河南郡志》中记载的明代河南府辖县的商税情况，对洛阳

<sup>①</sup>（清）魏襄：《洛阳县志》卷八《土地记》，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②</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四十六《人物志九·孝义》，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③</sup>（清）魏襄：《洛阳县志·序》，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④</sup>（日）山根幸夫：《明及清初华北的市集与绅士豪民》，刘俊文主编，栾成显、南炳文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明清》，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41—370页。



地区的商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洛阳城内集市的形成即如山根幸夫教授所论，在明代中叶形成，并由政府官员设立。

据现有文献，有关洛阳城内集市的记载有乾隆《河南府志》中：“李骥，洪熙中知河南府……立集于城市，以便交易”<sup>①</sup>，此条内容多引自《明史·循吏传》。而笔者对比《明史·循吏传》中有关李骥的记载，未有其知河南府时创立集市的内容，却可知其有重商之思想，“时关市讥商旅，发及囊篋，骥奏止之”<sup>②</sup>。由此可知，李骥主政河南府时，在洛阳城内设置集市当有可能，因之，洛阳城内集市之设始于李骥任内，又“其年（1430）十一月，择廷臣二十五人为郡守，奉敕以行”“莅郡六年卒”，可知为宣德五年至十一年间（1429—1434）。此时期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洛阳地区经济逐渐恢复，设立集市也反映了交易活动开始逐渐频繁。关于此时期设立集市的具体位置，并无明确记载，不过从地名与方志中“旧有集”的记载，可大致确定。据嘉庆《洛阳县志》载：“旧学有集”，“旧府下坡有集”，“旧俭王街、迎恩巷前有集”，“旧同王街、大关帝庙前有集”，“东关新街、火烧街等处旧各有集”，“旧大、小西关俱有集”，“旧南门口、贴廓巷有集”<sup>③</sup>，这些集，均匀分布区除北关以外的城区，皆为各城区交通较为便利之地，其服务范围亦以本城区内居民为主，主要交易商品为日常生活用品。这些“集”的作用有限，因此至嘉庆年间已经被称为“旧集”了，说明沿街店铺的发展已经取代了“集”的地位，而沿街叫卖的小贩却依然存在，从刑部案例中可见一斑：

河南洛阳县王节的十五岁儿子王小戍每日进城卖馍。他通常是带百来文铜钱，先向北关的高姓蒸馍铺买馍，每隔两个半钱，再以三个钱卖出。除了自己吃掉的馍外，每日可赚的二三十文钱。有时候天晚了，就在舅父家住下，并请人捎个信儿回家，第二天继续卖馍。<sup>④</sup>

此案例可以看出，当时洛阳城内，从事食品等日常消费品的经营的店铺、小贩数量可观，十五岁少年即可以此为业，城乡之间人员往来比较频繁，才能“请人捎个信儿回家”。但这种沿街小贩，仍只是蒸馍铺之类店铺的补充。

<sup>①</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二十三《职官志七·名宦》，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②</sup>（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一《循吏》，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七二〇二页。

<sup>③</sup>（清）魏襄：《洛阳县志》卷八《土地记下》，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④</sup>《明清史料》049323，引自刘铮云《城乡的过客——档案中所见的清代商贩》，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75页。



## (2) 商贸街区

按照商品交换的发育程度,城区集市经历了不定期到定期进而形成一定商业街区的过程。清代北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洛阳城处于西连陕、陇、云、贵,东至开封,北达山西、北京,南经南阳至荆湘的“十省通衢”位置,各方商旅、货物杂处,西北皮毛,本地棉花与山货,南方茶、米、丝等经此至西北,为洛阳城的商业贸易提供了坚实基础。有关清代洛阳城市场状况的资料较少,主要利用地名和近年发现之碑刻材料,对洛阳城的市场分布和商品结构进行探讨。

清代洛阳城的商业街区主要集中在城南部分和东关地区,与水陆交通便利密切相关。西至永宁,东达巩县的货物多集中于南关地区,洛河航运较为便利,“巩以河洛交流,故船户特多……有清季年,全县商船约七八百艘,帆樯林立往来如织。洛水上游极浅,逆流仅抵洛阳,黄河上溯陕西,下浮济南,时或远达海口”<sup>①</sup>。依赖河洛航运,巩县出现了富甲一方的康氏家族。西北城区的主要商业街为香坊胡同、集市街和鸡市胡同,形成粮食交易和香油制作市场。东北城区的新建仓街附近为小商小贩聚集地区,油坊胡同也有香油作坊分布。西关地区的柴市街、荆笆街为一个以柴草、木炭、编织出售荆笆为主的交易市场。西南城区的旧府下坡(仙果市街)为经营鲜果的交易市场。

清代乾隆年间,洛阳城有当铺十四座,主要分布于今明新街地区,故此街当时称作当铺街。南关地区的盐店口街多设盐店。清代从西安经洛阳到开封之官道从南关经过,不走城内,此街为西来洛阳的门户,地理位置优越,在此开设盐店,既便于接受西来的潞盐,又便于销散到府属各县<sup>②</sup>。马市街、骡市街与盐店口相连,亦能理解,长途运输畜力以骡、马为主,洛阳地区家养牲畜亦以此两种为主。因牲畜交易量之大,延伸出到洛河饮水之用的饮马胡同。因洛河滩地多为菜园分布,因而又形成了菜市街。还有造纸作坊分布的纸坊街。民国初年,“西、南二关南有猪行,四乡之猪皆驱至而买卖焉”<sup>③</sup>。东关西街、闸口街地区因回民聚居较多,牛、羊、皮毛交易也相当繁盛。据民国初年《河南通志·商业志》记载,洛阳地区的主要商品有杂货、煤油、棉布、潞盐、牛羊杂皮、棉花、小麦、小米。在清代洛阳城的商业活动中,“绸缎、布匹、杂货是洛阳市场中最重要行业。洛阳不仅是河南一府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陕甘地区与中原及南方各省商品流通的重要通道”<sup>④</sup>。

<sup>①</sup> (民)杨保东等:《巩县志》卷下《民政·交通》,民国二十六年(1937)刻本。

<sup>②</sup> 王怀远、王梦书:《洛阳市商业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sup>③</sup> (民)苏从武:《洛阳县小志》第十一章《产业》,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sup>④</sup> 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清代，河南是山陕商人的重要活动区域，洛阳作为交通孔道且与山、陕两省靠近，风俗相通，为山陕资本的重要聚集地之一。据许檀教授的研究，乾隆年间仅潞泽商人在洛阳的年营业额就有 240 万两白银。山陕商人在洛阳所经营的主要行业为丝绸业、盐业、棉布与杂货业，其店铺主要分布在南关与东关交通便利的地方。清末，汴洛铁路开通，至民国时期，陇海铁路全线贯通，北关地区因其交通优势逐渐发展起来，“因为龙海路的东站是设在北关外面，所以洛阳的商贾运输都以北关为中心，北关外面的街道，比较是很宽广的。商业不十分繁荣，可是旅馆和运输公司却很多”<sup>①</sup>。

## 2. 庙会

清代洛阳城祠庙众多，各类祭祀活动频仍，庙会期间大量民众参与其中，商家亦趁此机会招揽生意，两者皆以吸引人众为要义，最初商贸活动往往仅为参与庙会之人提供餐饮等服务，随着规模扩大，商贸活动取代祭祀而成为庙会的主旨，二者相互促进，使得庙会影响力和涵盖面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最典型者，莫过于因关林庙会而形成了关林镇，成为豫西地区著名的商镇。

论者常以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南》引《洛阳风俗琐谈录》“城内及附郭庙宇不下数十处，每处在春夏季各演戏三天，三日之中，一日名曰大会”<sup>②</sup>，来说明洛阳城庙会之盛，但有关具体的庙宇与会期则并未指明，好在庙会会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有些一直持续至今，为考察清代洛阳庙会状况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表 3.2 洛阳城主要庙会时间表<sup>③</sup>

庙 宇	会 期	庙 宇	会 期
吕祖庵庙	正月初四	县城隍庙	三月十六
龙 门	正月十二	东关泰山庙	三月二十五
大石桥财神庙	正月二十九	玉皇阁	三月二十八
煤土坑财神庙	二月初二	东南隅奶奶庙	四月初一
四关白衣阁庙	二月初九	北关奶奶庙	四月初八
西关坛角火神庙	二月十五	药王庙	四月二十八
校场街火神庙	二月十九	南关倒座关爷庙	五月十三
北关先王庙	二月二十五	四龙庙	六月为十四
府城隍庙	三月初四	地藏庵	七月十五
寿春寺	三月初九	南关大王庙	九月十七
关林庙	正月十三	五月十三	九月十三

<sup>①</sup>（民）倪锡英：《洛阳》，南京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1 页。

<sup>②</sup>（民）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3 页。

<sup>③</sup> 耿彤：《洛阳历史上的庙宇、殿堂、祠堂、庵的概况》；张钦长：《老城庙会史话》，《老城文史资料》第五辑，1984 年。



此外，还有迎恩寺、三贤祠、云溪观、白马寺、洛神庙、周公庙、东大寺、龙门等庙会。这些庙会多集中在春季，与人们对于节气的认识，以及春季较为清闲有关，“庙会甚多，善男信女十百成群，扛旗敲锣者，皆进香求福者也”<sup>①</sup>。

庙会内各项活动频繁，以商业和演戏最为繁盛，“作买卖农器、家具、牲口、花木之市场，并有装扮高跷、抬阁之类沿街演唱，至庙前必为止，以为敬神。虽庙屋塌，塑像已毁，而修理不难，戏必欲演也”<sup>②</sup>。各类商业和游玩活动充斥庙会，演戏为洛阳富有区域特色的活动之一，即便庙宇坍塌、神像毁坏，也必有之，说明了庙会的宗教信仰性质淡化不少。庙会主办者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财神庙庙会由商人出资举办，其目的，除了祈求生意兴隆外，更为现实的考虑则是通过组织各类活动以吸引顾客。城隍庙会除了普遍的城隍出巡外，最具地方特色的便是喝“迷魂汤”，是将宗教信仰与社会赈济相结合的一种形式。赵世瑜有关华北地区庙会的研究所揭示的“民众狂欢精神”，在洛阳城同样以演戏的形式展现出来，戏台类型多样，民众参与程度甚高，且性别与阶层之间的区分较为明显。庙会演出的戏曲以河南地方戏为主，只有煤土坑财神庙会唱京剧。众多庙会中演戏规模最大且最为热闹的是大石桥财神庙会，一天三台戏，连会三天。大石桥庙会兴盛的原因在于其连接城区与东关的重要交通地位，周边商业的发达和可观的人流为其奠定了基础。庙会更为实际的功能体现在物资交流上，由于主要的庙会都集中于春季，人们为置办一年的农具等物而多参与其中，主要物资为杈耙扫帚之类的农具和铁制工具，还有桌椅凳等家具及服鼓鞋帽等小百货之类的生活用品和地方小吃。庙会也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由庙会衍生出来的踏青活动在煤土坑财神庙会十分流行，由于当时庙会会址位于邙山脚下，具有踏青的便利条件。此外，庙会也成为青年男女相互认识、缔结婚姻的重要场所，以至有“大石桥相媳妇，煤土坑去还蛊。城隍庙拜天地，奶奶庙插香盼儿女”之说<sup>③</sup>。

洛阳诸庙会中以关林庙会最为兴盛，并最终形成专业市镇。关林又名关冢，为曹操安放关羽灵首处。随着关公信仰的繁盛，随着皇帝对关羽的逐步加封以及全国关公庙的兴建，朝廷制关庙祭祀之礼，进行定期祭祀活动，关羽后裔亦作为“世袭五经博士”，专司守墓。百姓出于对关公的信仰、神灵的崇拜，前来焚祝请愿，关林庙会因此而产生、发展起来<sup>④</sup>。万历二十年（1592），关林已形成数万人的“关王冢会”，现存万历二十四年（1596）《义社施茶造铃叙》“当今重封义烈真君，敕修金井，未得完讫，香烟荡荡，人缘浩大，广进香火，乃五、九、十三所会之期，近

<sup>①</sup>（民）苏从武：《洛阳县小志》，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sup>②</sup>（民）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

<sup>③</sup>张钦长：《老城庙会史话》，《老城文史资料》第五辑，1984年。

<sup>④</sup>郭挺彰：《洛阳关林志》，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村且远，进香人役，俱被暑渴，亦无人施茶水。舍友忽见，于二十二年（1594）六月初二日，速齐一社施茶”<sup>①</sup>，至乾隆十五年（1750）巡幸关林，关林之祀更为隆重，每年正月十三日春祭，五月十三诞祭，九月十三秋祭，俱由地方官主祭，附近“关帝神社”助兴，声势浩大。

白马寺现今的规模，主要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太监黄锦负责监修奠定的，清代又对其做了很多的补建修葺工作。白马寺庙会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佛门弟子的佛事活动，二是民间百姓求子、还愿等把佛作为神灵崇拜的活动。另外，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销售活动成为庙会的一部分。佛事活动，除了相传的正月十五大会外，每月逢“三”日都有物资交流大会，另外，佛教的节日活动诸如四月初八“浴佛节”、七月十五“盂兰盆会”等，此类佛事活动中，僧人们朝夕诵经、做功课<sup>②</sup>。众多的信众在各类佛事活动举办之时聚居于白马寺，饮食等需求刺激了相关商业活动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白马寺庙会。

### 3.会馆

晋商与徽商是明清时期最有实力的两大地域商人集团，洛阳临近山陕两省，交通便利，是山陕商旅西上东下的必经之处，且河南作为粮产区，与山陕两省经济上有极大的互补性，“康熙四十四年（1705）奉文截留归、彰、怀、河、汝七府州四十三年漕谷四十六万石，河南府贮一半，建廩房八十一座，计贮二十三万伍仟六百八十一石。康熙六十年（1721）将谷碾米运陕西”<sup>③</sup>。清代河南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广大，又因“无厚资，居羸且惮远游”，故“盐、当各商皆为晋人”<sup>④</sup>，河南成为山陕商人的主要集中地之一，洛阳在河南各府中靠近两省，区位优势明显。有清一代，洛阳城仅有山陕、路泽两座会馆，并无其他商人集团建设会馆，此亦可说明山陕商人在洛阳城商业中占据有统治地位，“山西东会馆在东郭，山西西会馆在南郭，并祀关帝，制称宏丽，甲于诸庙云”<sup>⑤</sup>。

潞、泽二州的地理形势，使得其与河南地区交流密切，由于其与晋中等地在风俗、经商活动上有所不同，故另建会馆以示区别，路泽会馆即“山西东会馆在东郭”，在东关南街南端东侧，坐北向南，东临灋河，西靠南街，又称东山庙。据现存《建修关帝庙路泽众商布施碑记》，其始建于乾隆九年（1744），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竣工，历时15年，由山西潞州、泽州同乡商人捐资修建，规模宏大，“洛阳城外东

<sup>①</sup> 万历二十四年《义社施茶造铃叙》，郭挺彰：《洛阳关林志》，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2页。

<sup>②</sup> 栾莉舒：《白马寺》，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1—42页。

<sup>③</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志·仓庾》，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④</sup>（清）赵卓彤：《孟津县志》卷四《风俗·四民》，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第162页。

<sup>⑤</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五《学校》，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南隅之关帝庙，建自路泽商人崔万珍等，规模宏远，状貌巍峨，极口飞鸟芽之奇观，穷丹楹刻木角之伟望，捐金输粟，取次成功”<sup>①</sup>。山陕会馆，即“山西西会馆在南郭”<sup>②</sup>，位于南关菜市东街东端，为山西、陕西两省商人所共建，道光十五年（1835）《东都山陕西会馆碑记》“城南郭外有山陕西会馆一区，创自康熙、雍正间。计什一之盈余，积锱累铢，殆经始十有余载而后成功……嘉庆中，雨风剥蚀，颇有倾颓，两省之人惧其湮没，重葺而新之，经营又二十余年……”，“木之朽者易之以坚，材垣之缺者究之以致石，计资凡两万五千有奇”<sup>③</sup>。从其捐款商号名称而言，涉及盐、当、布、丝绸等多个行业，正是山陕商人最有优势的领域。同时因信奉关公能保财御灾，从道光十一年至十八年，两省众商又积金一千余两，在会馆内建立关帝圣社，每年四月初旬，举行盛大祭祀活动。山陕商人以地缘优势，几近垄断清代洛阳地区的商业活动，由于其多从事区域贸易，所涉商品也规模较大，对交通要求较高，会馆作为商人议事、货物贮藏及转运之地，其选址多以交通便利为考量。同时，山陕、路泽会馆的宏大规模既显示了当时山陕商人的雄厚财力，也是当时洛阳城及其周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有力证明。

#### 4. 市镇

清代，河南地区棉花、烟叶等经济作物大范围种植，依托不同的资源条件和水路交通位置，作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城市贸易补充的城镇大量出现。豫西地区山区面积广阔，各类矿产、山货等丰富，交通位置优越，洛阳周边地区诸多城镇得以发展。洛阳作为区域内水陆交通体系的结合点，承担着城镇之间以及与更大市场交往的枢纽作用。

据乾隆《洛阳县志》载，洛阳县内共有集市 32 处，关陵（林）因频繁的庙会活动与香客而形成集市，并最终成为镇，“白水泉至井庄地为伊洛之冲，并有集市”<sup>④</sup>，其中涉及有谷水镇、龙门镇、彭婆镇、白沙镇、翟镇、延秋镇 6 个镇。“翟家庄，洛中诸镇，此为第一”、“白沙镇为东南巨镇”<sup>⑤</sup>，龙门镇历来为水陆咽喉地区，明后期已“摩肩接踵，为楚、豫大道，西北历关陕”<sup>⑥</sup>。由“四郊村落，稽之户籍有

<sup>①</sup> 乾隆二十一年《关帝庙新建碑文》，端木赐香：《洛水瀍河映王城》，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3—184 页。

<sup>②</sup>（清）魏襄：《洛阳县志》卷十七《庙坛记》，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③</sup> 道光十五年《东都山陕西会馆碑记》，端木赐香：《洛水瀍河映王城》，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7—188 页。

<sup>④</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里保》，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⑤</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四《疆域志附里保》，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本。

<sup>⑥</sup>（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29 页。



七百余所，今仅载通衢要津，余不琐志”<sup>①</sup>，可知，清代乾隆时期，洛阳县境内，集、镇的密度大致为 4.6%，即平均每个集镇的覆盖范围为二十个村子左右。按施坚雅的研究“典型的标准市镇为拥有 15 至 30 个村庄的腹地服务，满足农户每周对集市的需求”来看，洛阳县因其地形平坦，各地之间交通效率较为均衡，市镇的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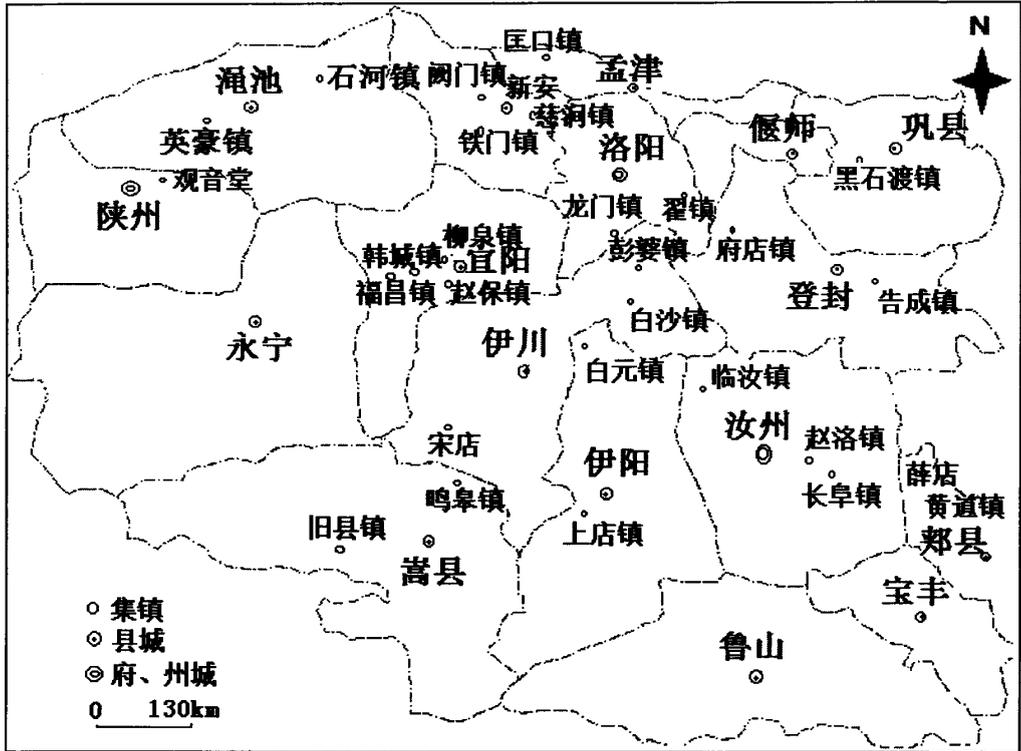


图 3.3 清代洛阳地区城镇分布图<sup>②</sup>

洛阳盆地周边区域，作为洛阳城的腹地，在清代，市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为洛阳城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嵩县大部分地区处于熊耳山与伏牛山之间，矿产资源丰富，如铁、锡、铅等，清代山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因而形成诸多城镇，“旧志市凡十一，待后惟存城厢、鸣皋、莘店三市。今百余年来，生聚日繁，临境郡邑之人踵至垦艺。环境千有余里，采山汲谷，村落弥望，市远妨农增至三十有二”，并通过伊河至龙门转旱路达洛阳，进而与其他区域进行商贸往来。田湖镇“保民集期担负入市者，稻望于道”，大章镇“为西南山孔道，市廛多甚”<sup>③</sup>。《偃师县风土志略》

<sup>①</sup> (清) 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里保》，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②</sup> 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GHCIS 系统 1936 年数据改绘。

<sup>③</sup> (清) 康基渊：《嵩县志》卷十二《市镇》，乾隆三十二年（1767）刻本，第 283、284、286 页。



载,石桥镇“四周皆棉田,又近义井铺车站,故棉业盛”,顾县镇“清初设市,有碑,商业八九家,此镇半滩半坡,故菜、棉市盛”,高龙镇“此镇素产香油著名”<sup>①</sup>。宜阳县“韩城乃商贩辐辏之所,虽无异产奇珍,市集较甲一邑”<sup>②</sup>。新安县“慈涧当铁路未筑以前,旅店亦颇盛…粮之输出可达洛阳”、“狂口居黄河南岸,就为河路码头,生意颇盛,以船运出口及经过,为商贾辐辏地”、“北冶居狂口之南,为瓷器生产地,旧与狂口比赛市场,有山西会馆在焉,其生意可知”、“石井当晋豫边陲,皖豫小商赴晋或出雁门口者,以此为往来捷径,故生意坡畅”、“铁门为新安西境驿站,旅店数十家,车马辐辏,商业颇繁,零售以外兼能批发”<sup>③</sup>。洛阳周边区域,西部多山,东部为伊洛河冲积平原,山脉、河流成为市镇贸易区域的自然分界线,山间孔道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市镇的影响范围。从市镇分布的地形来看,西部山区市镇多在山间盆地或河流上游谷地,东部地区则为陆路枢纽或水陆交汇等交通便利地区。从城镇分布的距离而言,龙门镇距洛阳城最近,为四十里,其他如谷水镇四十四里,彭婆镇五十一里,延秋镇五十二里,白沙镇九十二里。市镇之间距离最近者为龙门、彭婆二镇,为十一里。

清代中后期,洛阳周边城镇因局势动荡,逐渐修筑起寨墙进行防卫,“同治元年(1862),捻匪来扰,焚劫村庄,谋坚壁自保,(堡寨)修筑始多”<sup>④</sup>。因市镇规模较大,且山区市镇多分布于地势较为平坦之处,所筑堡寨位于其附近地区,一有动乱进去躲避,如崇义寨在“五头镇西,清同治元年(1862)段建童创建”,偃师县浮阳镇“此镇东无寨门,南接董村,西接堰村”<sup>⑤</sup>,平乐镇“四周是一个极大的土围子,周围有四五里,分设着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在洛阳乡间比较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这一种设备”<sup>⑥</sup>。寨墙内道路同洛阳城相似,多为十字街分割,呈棋盘状,内部有祠庙、学校等机构设置,如龙门镇有白文公祠、俞信祠,翟镇神州庙“康熙五十年邑人刘渊修”,荡魔观在延秋镇,而“九龙圣母庙,在县西南四十里延秋镇北”<sup>⑦</sup>,姬磨镇有元都观等。

此外,市镇因其较强的凝聚性和在人们生活中的中心性,也承担了经济之外的一些职能,如教化、慈善等,如“讲约,月之朔望日于公所。正东路金村镇,正西路谷水镇,正那路关帝墓,正北路张杨村,俱委县属官”<sup>⑧</sup>。

<sup>①</sup> (民) 乔荣筠:《偃师县风土志略》,民国二十三年(1934)偃师树德图书馆石印本,第74页。

<sup>②</sup> (民) 张浩源:《宜阳县志》卷三《风俗·市廛》,民国七年(1918)铅印本。

<sup>③</sup> (民) 张筠:《新安县志》,民国十五年(1926)稿本,第512—515页。

<sup>④</sup> (民) 张筠:《新安县志》,民国十五年(1926)稿本,第384页。

<sup>⑤</sup> (民) 乔荣筠:《偃师县风土志略》,民国二十三年(1934)偃师树德图书馆石印本,第75页。

<sup>⑥</sup> (民) 倪锡英:《洛阳》,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sup>⑦</sup> (清) 魏襄:《洛阳县志》卷二十二《伽蓝记道观附》,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⑧</sup> (清) 龚松林:《洛阳县志》卷六《礼乐》,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

## 小 结

洛阳城所处的区域地形条件与气候特征，以及传统因素的影响，使得洛阳城为正方形，城内街道以十字街为主干，划分为四个城区。各个区域因本区内的地形条件和发展状况，呈现了不同的道路结构特征，北部城区因多有官署衙门分布，故街道多、地块范围较大，道路平直且以围绕衙门为主，名称因方位而定。南部城区，尤其是东南城区，更多的体现了自发形成的特征，颇为弯曲，短窄，名称除了一部分因衙署原因外，更多以居民姓氏与职业特点进行命名。四关地区，除北关外，经济颇为繁盛，尤其是南关和东关，以濒临洛河，水路交通便利，而成为洛阳城的经济中心。清代洛阳城作为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市场对于维持城市生活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意义，城内自明中期即出现政府主导的集市，至清代中期，专业型的商业街区已经形成，而沿街小贩依然是城市商业的重要补充。山陕商人实力强大，在洛阳建设会馆，从捐资商铺与会馆的建筑规模可以窥探到清代洛阳地区山陕商人的经济实力与经营产业。城市是区域经济状况的映射，市镇作为经济发展情况的标志，在清代洛阳地区亦可体现出来。因区域地形等自然状况的制约，洛阳地区市镇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地域差别，但从整体的发展程度而言，略低于同时期河南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究其原因，当为多山区所导致。



## 四、清代洛阳城的居住与文化空间

城市因人而存在，城市的地位、规模，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城市居民的数量。作为最典型的人类聚居地，城市承担着多种职能。因人口聚居程度、民族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造成居民区的不同分布特点，进而在住宅等建筑上，构造城市的景观。除了必要的经济成分外，教育、信仰、宗族，在传统社会既是政府用以维持统治的必要手段，也是人们生存的精神支柱，因不同的文化需求形成的教育、信仰空间成为展示城市生活的舞台，共同建构起了城市的社会空间，而这一切皆以人的存在与活动为前提。

### （一）清代洛阳城居住区分布格局

清代洛阳城，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民族构成，都无法与都城时代相比。建筑风格尽管因时而异，却也折射出繁华与落寞。本节在探讨清代洛阳城人口规模和管理体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少数民族的居住与生活状况，城关范围内居民区的分布和住宅结构特点，以展示清代洛阳城居民的生活状况。

#### 1. 里坊格局

治所城市作为区域的行政中心，为统治者所重视。从秦汉时期的闾里制到隋唐的里坊制，利用围墙将城区划分成若干空间，进行管理。唐代中后期作为物理实体的里坊建筑逐渐崩溃，而制度层面的里坊制一直延续，更多的以街道作为管理空间，名称也有所改变，至明代以街坊为主，也可称为里坊。清代洛阳城为河南府府治，同时作为附郭县，也是洛阳县县城所在。因城市规模狭小和政治地位下降，没有了都城时代洛阳、河南两县分而治之的状况。洛阳城的事务由洛阳县具体管理。清代洛阳延续明代的城市管理体制，实行街坊或里保制，据乾隆《洛阳县志·里保》的记载，“东南隅三里，每里十甲；西南隅二里；东北隅三里；西北隅三里；东关四里；西关一里；南关二里；旧志不载北关，今仍之”<sup>①</sup>，可知，行政分区实际是由连接四门的四条大街城区自然划分成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城区构成的。因东西大街偏南，四个城区面积并不相同。道路作为分区的边界，在城区内部，也依据具体的道路结构继续细分。从里的数量上看，东北和西北隅因面积较大，各为三里。而里除作为行政管理单位外，还是户口统计单位，亦可知两区人口颇多。西南隅二

<sup>①</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里保》，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里,既有面积较小容纳居民有限的原因,也与其军事机关分布,占地较多,经济不甚发达有关,同样面积较小的东南隅则为三里,乃其商业发达之结果。

城关地区,在清代已经成为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从方志编修者角度看,当时也已将其视为城市的区域。四关中东关为四里,人数最多,且多于城内四区,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东关地区的繁盛。西关与南关各为一、二里,亦是对各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反映。北关地区因“紧贴邙山,故地甚狭”,没有明确的里数,可知在当时并未达到设置里保的程度。至编修乾隆《河南府志》时,仍然“按里保悉载旧志,数十年来无所改易,故悉仍之”<sup>①</sup>,说明在此期间,北关地区确实没有什么发展,也隐约透露出乾隆中后期以后户口编审制度的衰落,里保制作为一种行政制度持续下去,而实际功效却大打折扣。

## 2. 人口规模

清代洛阳城区人口数字没有明确记载,但据现存方志和民国初年的调查材料,并结合有关此时期城市化水平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清代洛阳城区人口做出大致推算,以期能揭示清代洛阳城的人口规模结构。总体而言,清代中前期,洛阳人口同全国情况一样,呈不断增长趋势,后期因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损失颇为严重,清末民初人口再次增长。“乾隆十年编审,洛阳县编户四万七千七百五十三户,男妇大小二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八丁口”<sup>②</sup>,户平均口数为5.2。民国初年,“据警察厅调查约五万两千余户,四十七万七百余口”<sup>③</sup>,户平均口数约为9口,与乾隆年间的5.2相差甚远,而引用材料为编者“于课余之暇,与学生诸君分项调查,缀成是篇”<sup>④</sup>,应当可信,且作者对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所作出的解释是“纳妾之风甚盛”,这种畸形组合关系,似能导致户均人口的离谱。

据曹树基的研究,乾隆四十一年(1776),河南全省城市人口比率为4.6%,大府城和大镇的平均人口为2.5万<sup>⑤</sup>。在农业社会里,如果没有大的变故的话,人口城乡之间的流动比较缓慢,尽管此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较之前提高。则可依据4.6%的比率,算得乾隆十一年(1746)洛阳城区人口约为11000余人。三十年间城区人口翻番,尽管存在一定的误差,却能大致反映乾隆年间城市人口增长的幅度之大。至1893年,河南城市人口比率略有提高,为5%<sup>⑥</sup>,因缺乏清后期

<sup>①</sup> (清)施诚:《河南府志》卷四《疆域志附里保》,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②</sup> (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二十五《户口志》,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③</sup> (民)苏从武:《洛阳县小志》第八章《人民》,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第35页。

<sup>④</sup> (民)苏从武:《洛阳县小志·序》,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sup>⑤</sup>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1页。

<sup>⑥</sup>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9页。



洛阳地区人口数据，暂以民国初年的调查数据为基数，二十余年间旱灾导致人口锐减，但清末民初又有一定的增长，从此角度而言，似乎有一定的可靠性。因而得出的数据为 23500 余人，与乾隆后期相近。而这些数据以民为统计对象，驻防军队与来自山陕等地的大量客商皆不在统计范围之内，如河南参将府所辖军队满员为一千人，乾隆时期修建山陕会馆所列数百家店铺的伙计等。可见，清中期洛阳城区人口当在三万人左右。清后期，因灾害频仍，人口损失较大，但也在两万左右。清代，洛阳城区人口的增减幅度颇大，也使得城区内的土地利用方式随之产生较大的变化。如东北隅和西北隅的大量荒地直至民国初年才逐渐得以开发。当然，城市人口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本节主题，且相关材料尚待发掘，日后仍需努力为之。

洛阳作为东西交通的重要节点，北魏已有专门胡店、胡市，隋唐时期已经有胡商的聚集。元代，回回人大量进入洛阳地区，如据偃师、伊川等地的家谱、碑刻等材料的记载，回民在这些地方屯田定居<sup>①</sup>。明代初年，河南地区因战乱，人口损失严重，大量移民迁入，其中即包括大量回民。

清代，河南大部分地区皆有回民分布。此时期，回民主要聚居于乡村，在府、县等城区较少形成聚居区。据嘉庆《洛阳县志》载，洛阳城内西北隅已有回回营存在<sup>②</sup>，据其聚落名称“营”判断，此时回民当为屯田军人。东关地区回民的定居时间，因清真寺为其聚居地标志，可从清真寺的修建时间上做一推断。据《马家坡清真教建寺输田碑》可知“余祖父世居马家坡，为清真教人，尊清真教训”，下文又有“余与汝济年同庚，已就是多岁矣”，而立碑时间为乾隆二十年（1755），可知其祖父当为明朝末年之人，可称之为“世居”。由此可以判定，东关地区在明代已经有回民居住<sup>③</sup>。至民国初年，东关地区“有回族百余户”<sup>④</sup>。因回民多以经商为生，故分布在水陆交通便利地方，而东关地区乃东西官道所经，向东可以至开封、周家口等地，进而可北上至京津，沿运河南下至江淮地区；往西则到西北地区，四方商品汇集，对于回民经商具有重要意义。再加之东关及以东地区地形开阔，既便于回民以清真寺为中心建立聚居地，也方便其进行牛羊的喂养，“东关回族亦有蓄之（羊）者”<sup>⑤</sup>。同治年间，河南地区回民并未参与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因此也就不曾受到清政府的镇压，回民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光绪二十一年（1895）《北窑清真老寺创修大殿碑记》“如予村清真寺，有远来已久，殿宝象壮观。乃至今村中人繁，因

<sup>①</sup> 胡云生：《河南回族社会历史变迁研究》，复旦大学 2005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35—39 页。

<sup>②</sup>（清）魏襄：《洛阳县志》卷八《土地记下》，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③</sup> 胡云生：《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回回民族》，《回族研究》，1994 年第 2 期。

<sup>④</sup>（民）苏从武：《洛阳县小志》第八章《人民》，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sup>⑤</sup>（民）苏从武：《洛阳县小志》第十一章《产业》，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而觉其地狭，予于同治年间接管寺事。□之□喜。常走陕西，因陕西荒乱，予举聂题”<sup>①</sup>。尽管对于本村清真寺之历史含混不清，却说明清中后期回民经过长期的繁衍生息，人口增长颇快。又因此碑所立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光绪初年的旱灾所造成的人口损失至此时已经逐渐恢复，并有超过之前之势，故“觉其地狭”，而无法满足日常礼拜之需求。同时“予于同治年间接管寺事…….常走陕西，因陕西荒乱”可知，回民起义对于陕西地区破坏之严重，而河南地区则未牵涉其中。据有关材料统计，清朝中叶和民国初期，洛阳东关、北窑、马坡、塔湾村形成的回族聚居区，人口达1万多人<sup>②</sup>。

据《河南回族汉文碑刻辑录》显示，塔湾村有东、西二寺，马坡有上、中二寺，北窑有老、中、上三寺，可知清代洛阳地区回民以村落形态聚居，一村之中至少有两座清真寺，与回民聚居区以清真寺为中心称为“坊”的一般情况颇有不同。而村与坊的对应关系，可以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塔西清真寺建班管物碑刻》“塔湾村户口繁多，亦系大方（坊）”<sup>③</sup>得知，一村为一坊，尽管塔湾村有东、西两座清真寺，但仍为一坊。大、小坊的划分标准乃以人口之繁盛程度而定。

### 3.居民结构

上文提及的嘉庆《洛阳县志》“里保”部分中有关城区的划分已经表明，洛阳城各分区之间在人口分布上存在差别，而差别的具体情况，则需要通过对居民区的具体组成情况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尽管城市较农村土地的利用方式更为集约，但从清代洛阳城的土地利用状况来看，所谓的集约当因地区而异。影响城内居民区分布的因素颇多，诸如地形、风水、交通通达性、社会地位、职业结构乃至宗教信仰等。

现存文献资料中，对清代洛阳城居民区分布情况无明确记载，但依据地名资料可以对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进而把握城区居民的分布和演变情况以及影响因素。由于道路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且随着地区的发展，新的道路陆续形成，因此街道形成的时间早晚与沿街建筑用途对于确定居民区的意义尤为重大。从乾隆《河南府志》、《洛阳县志》和嘉庆《洛阳县志》所记载道路的名称及近代实测地图来看，清代中前期，洛阳城内的居民数量颇为有限。整体而言，居民区主要以十字街为中轴，向两侧展开，所形成的街道颇为短窄，并未深入到区域内部，如吴家街以西的今广

<sup>①</sup> 胡云生：《传承与认同——河南回族历史变迁研究》附录二《河南回族汉文碑刻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286页。

<sup>②</sup> 洛阳市地情网 <http://www.lydqw.com/DB/BookContent.aspx?BookID=200906270013&Content=Digital>

<sup>③</sup> 胡云生：《传承与认同——河南回族历史变迁研究》附录二《河南回族汉文碑刻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平街、建安街附近地块至民国年间才建为运动场，同王街与吴家街之间南北向的桑园街，在清末民初，作为河南第三农业学校的实验场而开发出来形成街道<sup>①</sup>。西北隅居民区主要位于水陆堂街、吴家街以南，乡范胡同以东，临近北大街、西大街地区。东北隅地区在清代为主要的官署衙门聚居区，居民区较为集中，主要位于三官庙街以南，迎恩巷（县下坡）以东，高升街以西地区，此外北大街、西大街临街地区和莲花寺街、俭王街附近多有分布，且以店铺为主。西南隅在清代除为参将府和火药局等军事机构驻地外，居民区主要位于城隍庙街与魏家街之间和旧府下坡沿线区域。因东西大街偏南造成西南隅和东南隅二区面积较小，而东南隅因商业发达之故，整体上人口规模较西南隅为大，至当代，依然如此。东南隅地区，除河南府学中占据一定的空间和南部地区有孟家坑等坑塘的存在外，其余大多数地区皆居民颇多，且多富商大户居住于此，如温氏等，建有规模宏大的宅邸与宗族祠堂。

城外居民主要居住在南关和东关地区，南关地区商业发达，除有庄氏等富商外，多为前店后居的居住形式，人数颇多之山陕商人皆居于此，集中于盐店口、马市街、贴廓巷一线两侧。东关地区以新街、闸口街和东关大街为主要聚居区，此外，以北地区多为农民形成的小型聚落。

城内因西北隅与东北隅北部区域有坑塘分布，居民较少，多为荒地。其余部分于干道分布以求商业利益，亦有居于背街小巷以图僻静。整体而言，以通达性和环境作为居住的首选。同样基于风水与心理需求的考虑，一些地区为人们所舍弃。高升街以东地区尽管靠近东大街，濒临东门，交通便利，在清代却为监狱与刑场所在，故多为荒地，直到民国时期才逐渐开发，有人居住。同样，庙宇作为社区活动中心，无论从商业经营上考虑，还是精神需求来看，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故在玉皇庙街、大关帝庙街、清凉寺街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居民区。

#### 4. 民居类型

建筑景观因其兼具自然与社会属性，体现着强烈区域性而成为反映区域社会的一面镜子。传统社会，礼制被视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建筑规制是其中一个方面。尽管明初对于民居样式及房屋具体规制有严格的规定，但至明中后期开始，奢侈浮华之风盛行，各类逾制现象频出，住房是其重要的表现方面，但这一状况逐渐表现在社会富裕阶层，且经过明清鼎革的动乱，至清初经济凋敝，住房也甚为简陋。随着社会稳定，商业、科举等获取财富与社会地位渠道畅通，进而住宅之间的差别逐渐显现，构成城市特有的景观。

<sup>①</sup> 洛阳市地名志办公室：《洛阳市地名志》，1992年油印本，第166页。



邙山横亘洛阳城北，一直延伸到巩义境内，为典型的黄土台地。因黄土直立性好，便于开凿，且窑洞冬暖夏凉，成本相对较低，故临近邙山地区的民居，多以窑洞为主。明人王士性对洛阳地区的窑洞的特点与类型，做了准确的描述：“洛阳之窑，非必皆贫也，亦非皆范砖合瓦之处。遇败家，穴其隧道门洞而居，亦称窑，道傍穴土而居，亦称窑。山麓穴山而栖，致挖土为重楼，亦称窑。谓冬燠夏凉，亦藏粟麦不坏，无南方霉湿故也”<sup>①</sup>。

清初陈维崧在途经洛阳所作《巩洛道中书所见》一诗中，对于洛阳地区窑洞的分布特点有具体的观察：

巩洛饶陂□，水土互蟠结。扶幽布险势，凿孔露奇节。  
重□积□□，怪□□□□。居民数百家，伏处类巢穴。<sup>②</sup>

居民窑分布道路两侧，杂乱无序的布局在路边台地，形态各异。由“凿孔露奇节”、“伏处类巢穴”可知窑洞样式百变，做工颇为粗糙，且规模不大，反映明末清初的战争对于洛阳地区所造成的破坏，在民居上有所反映。

洛阳城仅北关地区有窑洞分布，其它地方因经济状况而各异，主要有草房、瓦房与宅院三种类型。从民国初年洛阳城住宅状况，探知清代的情形，从城内民居“多浅瓦房，平方极少”的情况看，居民生活并不富裕，住宅样式单调、简陋。这一普通民居的形制大致为：“如南方庙宇，矮而小，无楼，且有梁无柱，梁椽即架于屋壁。屋瓦有阴无阳，两瓦搭界之处用泥灰塗之，以土筑墙，砖砌少有”<sup>③</sup>，即便富有之家的房屋也多简单，“富者多一进数重，上房、厢房、过厅、客位俱备，建筑颇宏敞，惟窗户太少，空气流通极不便，光线亦不充足，是大缺点”<sup>④</sup>。这与江浙商人的园林相比，也是简陋之至的，反映出清代洛阳城及整个中原地区的衰落。洛阳城富商宅院，多临商业街市，有临街商铺。如位于营林街的史家院，建于乾隆年间，为南北纵轴线对称布局的二联四进院落，坐北朝南，砖木混合结构。贴廓巷的庄氏宅院，建于1839年前后，原有房屋100余间，为3处三进四合院建筑，沿中轴线布局，各有小门互通互隔，前有临街房，中有一、二厅堂，两侧均有两层厢房。<sup>⑤</sup>

<sup>①</sup>（明）王士性著、周振鹤校：《广志绎》卷三，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4页。

<sup>②</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九十八《艺文志二十二》，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③</sup>（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地理类·洛阳家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0页。

<sup>④</sup>（民）倪锡瑛：《洛阳》，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sup>⑤</sup>高元池、何肃然、贺廷栋：《洛阳建筑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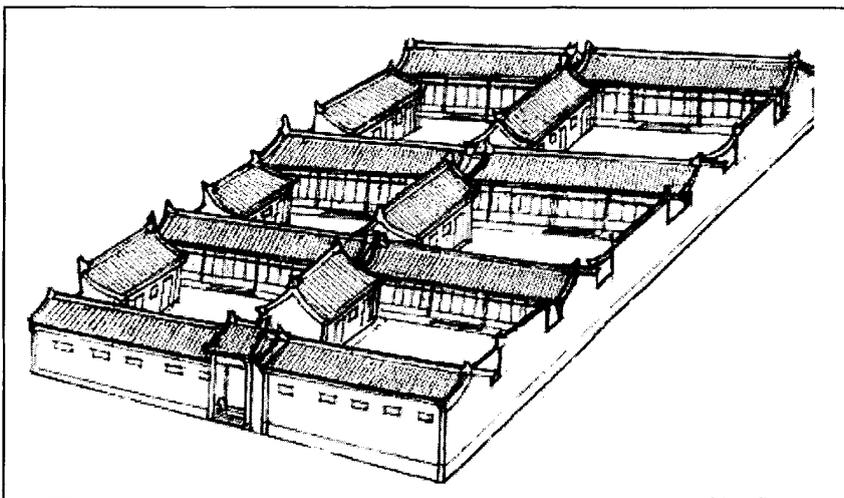


图 4.1 史家大院布局图<sup>①</sup>

明清时期洛阳为理学重镇，科举世家颇多，故而其宅院规模颇大，且分布较为集中：

洛阳城内最古老的地方，恐怕就要算东关附近了……可算是洛阳的住宅古迹区。这些住宅里所居住的人民，都是洛阳的所谓世家，那住宅的建筑，差不多是千篇一律的：每座住屋门前，一定有一个凉棚，从门口突出来，用木柱排列着……。那些房子是比街道高出数尺的，用大块的石卵砌成高高的屋基，从屋子里走到街上去，中间有一座桥梁式的阶台，阶下有泄水沟，看上去好像江南人家的水码头。<sup>②</sup>

这些宅院多沿街分布，且内部布局与装饰也具有洛阳本地特色，以彰显身份的悬挂匾额最为突出，“那房屋的布置也很特异，屋檐下满挂着许多匾额，有些是表扬功名的，有些是祝贺人家的。各家大门上，一定贴着一幅梅红金字对联……进了大门，便是一条宽阔的甬道，弄底向外，有堵小照壁，壁的四周是浮雕着图案的花砖，中间写着一个红色的‘福’字。从照壁转弯便是一个庭院，客屋在进门靠弄的一面，再进去是二重门，门内便是三面院屋，这是当做宿舍和厨房的”<sup>③</sup>。

<sup>①</sup> 据高元池等：《洛阳建筑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 页，《洛阳老城区史家院民居鸟瞰图》。

<sup>②</sup> (民)倪锡琰：《洛阳》，南京出版社，2012 年，133 页。

<sup>③</sup> (民)倪锡琰：《洛阳》，南京出版社，2012 年，133—134 页。



城关地区，除去北关与东关北部有窑洞分布外，其他地区的“院子既小，屋宇亦矮，室中空无，光线皆不充足，院中器物杂陈，尘秽满地，有丰年不加扫除者，亦可见其肮脏之习矣”<sup>①</sup>，生活困难，也就无力整修屋舍，至于庭院卫生状况则更无心为之。

传统房屋多为砖木结构，修建房屋所用的砖、木等材料主要来源于洛阳周边地区，所用之青砖，邙山等处即可烧造，木料则颇为不易。洛阳地区开发历史悠久，至明代，近处山地林木已被砍伐殆尽，惟有往更为偏远处寻找，洛宁、卢氏等山区便成为洛阳等处木材的主要供应地：

洛西惟宜阳锦屏翠柏浮天，他山亦鲜。永宁缘坡冒岭，多茂林修荫杂立竹园中亭亭可爱，且水泉滋润，故合抱者有。白龙头山以西松柏榆青黄杨等木皆为栋梁檁柱者，硕大且繁，其盛酹于卢氏。村民斧斤以时入伐之，缚为筏，春涨浮洛，而下郡城及偃巩诸邑，营造者资焉。其枝条供燔爨之用，□于城市获利。承平岁久，生齿日繁，取用者宏大减于昔。然贫富之民籍以衣食。<sup>②</sup>

洛阳城作为区域中心，依靠洛河的水上交通，实现了对边缘地区的资源吸收和利用。这样的运输方式也决定了木材价格的昂贵，对普通百姓而言，难以承受，故多就近利用茅草等材料建房，因而也造成了清代洛阳城内草房居多的情况。

## （二）清代洛阳城教育机构的设置

清代洛阳城政治与经济地位无法与前代相比，文化也衰落不少，却依然能称为文物之邦。传统的浸染使得洛阳城并未完全失去其文化地位，作为地方性城市，凝聚区域各类文化资源，在清代仍不失为理学重镇。清代洛阳城的文教机关以府、县学为中心，辅以书院、社学和学田等相关设施，构成了城区空间的重要景观。本节在分析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布与变迁的基础上，对府、县学、书院、社学等的布局结构、景观规模与运行机制进行探讨。

<sup>①</sup>（民）苏从武：《洛阳县志》第八章《人民·居住》，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sup>②</sup>（民）张楷：《洛宁县志》卷二《土产》，民国四年（1915）石印本，第205—206页。



## 1.府、县学

科举制作为传统社会最主要的晋升通道，被社会各界所关注，学额成为各地争夺的重要教育资源，府、县学既是官方指定的科举制的重要实施机关，也是进行文化思想统治的前沿，在地方政府的架构中具有多重意义，“储才之地，首重学校。唐贞观中，诏府州县皆得立学。明洪武初，更申其制，学校之设遍天下矣。党彗木序于古，教人之意为近”<sup>①</sup>。

府、县学作为政府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在府、县署周边，并体现一定的礼制观念。河南府学在明清两代，一直位于今文明街与东大街之间地块，处于河南府衙之南，体现了传统的城市布局思想，且二者距离较近，便于官员赴学宫参加春秋两祭等活动。洛阳县学“明洪武五年（1373），知县胡宏道以玉清观废址建……万历三十四年（1606），因福藩侵地建府，知县杜汝亮移建东关大隆岗”<sup>②</sup>，尽管因客观原因被迫迁移，但对环境依然有所选择，“学宫据龙岗之巅，奎宿居柳张之位”<sup>③</sup>，此后至清代皆位于此。

河南府学“旧在洛水南，金正隆初，知府孔彦舟徙建水北，元末毁于兵。明洪武二年（1369），知府徐天麟重建。景泰二年（1451），知府李达修。嘉靖六年（1527），知府刘璋重修。十年（1531），诏建启圣祠，又建敬一厅。万历四十三年（1615），知府宋如奎重修”<sup>④</sup>。又据“洛自神宗末叶，以封福藩庙地，悖礼孰甚焉。徙建以来，次第饬整，秩如翼如渐复其始”，知河南府学在明后期，因福王府侵占而规模缩小。至清代，更屡次兴修，“顺治八年（1651），分守道于时焯、许文秀，知府杨所修。十四年教授侯抒慷相继重修。康熙三十三年（1694），知府孙居湜修。雍正二年（1724），知府张汉修”<sup>⑤</sup>。从明清两代颇为频繁的兴修上，亦可看出，府学为地方政府所重视，乃至官员到任时，往往以此为要务，“方今右文之代，人才之出其中者，几何也，振兴有道，司土尚其加之意哉”<sup>⑥</sup>，也有将振兴文教视为政治清明的标志，“厘定敷意于下，政通人和，乃饬修文庙……侯之善政，固不可谓不在是，而谓善政惟止于是”<sup>⑦</sup>。

府学，除了作为科举教育的重要机构以外，更是承担着地区的教化之功能。从府学兴修者地方官的角度言，“乃学荒废不治，恐不足以兴教化，鼓舞多士”，故“移

<sup>①</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五《学校》，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②</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二十九《学校》，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③</sup>（清）范百顺：《洛阳县重修学宫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九·记三》，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④</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二十九《学校》，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⑤</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二十九《学校》，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⑥</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五《学校》，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⑦</sup>（明）孙应奎：《重修文庙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守兹郡傲而工之”<sup>①</sup>。府学内，除一般的教学设置之外，更多地体现出教化的职能，宣扬尊祖敬宗的伦理秩序。正殿祀至圣先师孔子，殿内东、西两侧配祀颜回、子思、曾子和孟子。然后为十二哲。东、西两庑皆为先贤、先儒。崇圣祠在正殿之后，内祭祀先人并加祭品。整体而言，建筑布局礼制色彩浓厚，成为宣传道统思想的重要场所。“又查四配十哲及两庑木主，厘定位次，而更新之，学宫之制成矣。至名宦、乡贤祠俱在右，文昌口其左，予谓不宜，乃移文昌于尊经阁上，移名宦左，乡贤右。旧启圣祠改为敬一亭，制悉合”。雍正六年（1728），又建忠孝节悌祠。可见，具体位置之布局皆为重视，形成自上而下的统一，且以建筑之宏丽来显示虔诚之信仰，充分体现了建筑所包含的教化与象征意义，“是殿不光而大之母，乃不足妥圣人祖宗之灵，以仰副圣天子崇圣追远之盛心乎？”因风雨侵蚀，而需不断修葺也就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孔子之道，万古一日也。庙之葺，复振儒教以扬圣化也”<sup>②</sup>。

洛阳县学“明洪武五年（1373），知县胡宏道以玉清观废址创建，正统、天顺间知县孙宏、张本济，弘治、正德间知县杨滋、黎禹相继修葺，嘉靖三十一年（1552），县丞吴英修葺。万历三十四年（1606），因福藩侵地建府，知县杜汝亮移建东关大隆冈，相传为法祥寺故址，明末毁于寇。顺治六年（1649），知县武攀龙修建。十三年（1656），知县叶琪。十八年（1661），知县杨苞。康熙二十四年（1685），知县佟学翰相继修葺。雍正八年（1730），知县王箴舆修。乾隆二十八年（1763），知县王宇修。嘉庆十七年（1813），襄奉调洛阳，即以是月兴修，越十月工竣”<sup>③</sup>，其布局结构则更体现出地方特色，反映“学校为风化本源”<sup>④</sup>的特质。大成殿，东、西两庑，戟门，圣域贤关门楼，明伦堂左右分别为克己斋、复礼斋，崇圣祠，名宦、乡贤二祠在泮池东西，文昌祠位于学宫东。“奎光阁，在学宫东南。明隆庆四年（1570），里人刘赞、刘绅购买伊藩废宫崇善楼建。顺治十二年（1655），守道许文秀修。康熙十年（1671），知府吴源起、知县王箴舆、教谕范百顺先后增修”，“万历年改建学宫，其名宦、乡贤二祠遂并入府学。本朝康熙三十七年（1698），知县钱肇修创建。乾隆九年（1744），知县龚松林重制栗主，祀典始备”<sup>⑤</sup>。

按照清代科举考试程序，童生考取生员是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考试分别由知府、州官、县令主持。童生在府、州、县学先参加初试，再进行复试，最后根据朝廷规定的生员名额确定考中秀才的人员名单，张榜公布，被录取者就成为府、

<sup>①</sup>（清）赵于京：《河南府学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六《艺文志九·记三》，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②</sup>（清）张汉：《府学改建崇圣殿记》，乾隆《河南府志》卷八十六《艺文志十》，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③</sup>（清）魏襄：《洛阳县志》卷三十六《学校志》，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④</sup>（清）范百顺：《洛阳县重修学宫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九·记三》，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⑤</sup>（清）魏襄：《洛阳县志》卷三十六《学校志》，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州、县学生员。岁考，由学政主持，各知府分别负责府学及所属州、县学考务。岁考考场统一设在各府州试院。<sup>①</sup>因此，府城具有一定的设施以备考试，其位于城西南隅，原为南察院，后为学政试士之所。其布局大致为：

正堂五间。捲棚五间。正堂左右耳房共十六间。东西考棚共二十间。正堂后，川堂三间。上房五间。西厢大书房三间。东厢房三间。西厢小房四间。书吏房十一间。厨房二间，在川堂东。门房一间。上厨房三间，在川堂西。仪门一间。东、西角门各一间。大门三间。官厅三间，在大门西。东、西鼓楼各一座。买办房三间，在东鼓楼后。杂事房三间，在西鼓楼后。听差房一间，茶房一间，在西鼓楼北。东、西辕门各一座。<sup>②</sup>

雍正年间，知县王箴舆建，乾隆八年（1743），知县龚松林重修。内部建筑分为众多单元，适应考试的各方面要求，礼仪性建筑也必不可少。演武场，旧为河南卫指挥使练军之所，后改为学政试武生、童生的场所。

清代，河南府学原额为二十名。雍正二年（1724），因升陕州为直隶州，遂“拨河南府学取进学童三名、武童六名，归陕州属”<sup>③</sup>。洛阳县学额相同，府学、县学共有“学田，一顷四十九亩，明万历中守道董光宏捐俸置，分给两学，以济贫生”<sup>④</sup>。此外，作为普遍性的文教附属设施，“文峰塔，在东南隅。雍正八年知县王箴舆、教谕范百顺先后增修。后圯。乾隆三十一年（1766），知县王守重重建”<sup>⑤</sup>，谚语“洛阳有座文峰塔，离天只有七丈八”，以之为风水塔。

## 2. 书院

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对于维系学术传承有着重要作用，同样在科举制时代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书院之设所以佐学校”。洛阳地区因唐宋时期为政治、文化中心，书院颇多，唐代之丽正、集贤书院，宋代的同文、颖谷书院。元、明时期形成的颖谷、同文、洛西等书院，“以不隶于官，皆荡然靡存”<sup>⑥</sup>。

清代，因政府控制严格，书院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顺治二年（1645）至雍正十年（1732），属于抑制政策背景下的沿袭存在期；雍正十一年（1733）至

<sup>①</sup> 王日新、蒋笃运：《河南教育史》上册，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603页。

<sup>②</sup> （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署廨》，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③</sup> 《清世宗实录》卷一五，雍正二年三月丙寅条，中华书局1988年。

<sup>④</sup> （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五《学校》，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⑤</sup> （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二十九《学校志》，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⑥</sup> （明）胡谧：《伊洛书院记》，雍正《河南通志》卷四十三《书院》，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光绪二十六年建（1900）间为政府支持发展时期；光绪二十七年（1901）是衰落和向学堂转变期<sup>①</sup>。洛阳城在清初即有灋东、天中、周南三座书院，雍正年间开始逐渐兴起，先后共有十余所书院出现<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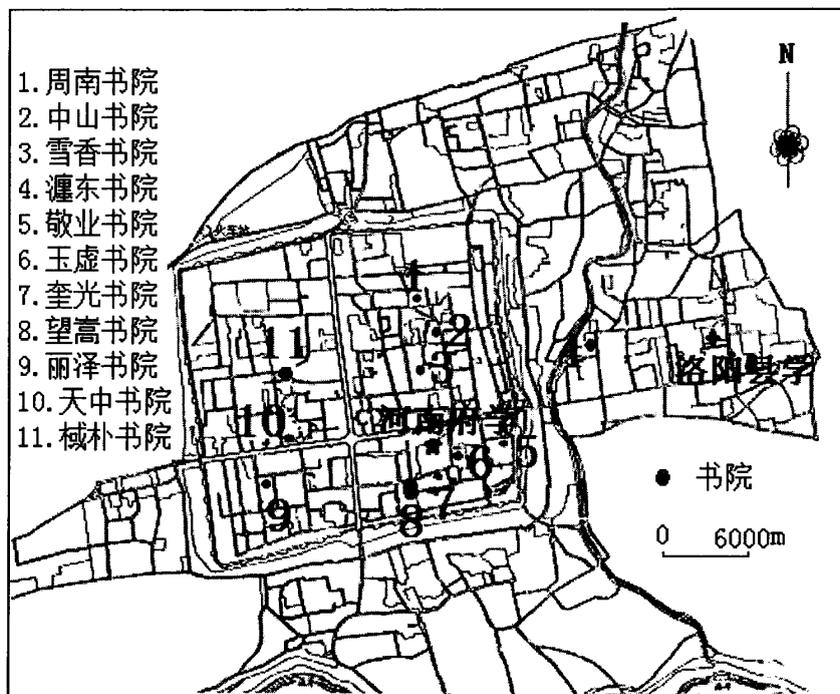


图 4.2 清代洛阳城教育机构分布图<sup>③</sup>

清代洛阳城成立最早的是灋东书院，崇祯时贡士郭永固捐修。康熙三十七年（1698），知县钱肇修整为义学。乾隆七年（1742），训导叶仲幹重修，知县龚松林题额立坊；天中书院，顺治中守道赵文蔚捐建，中有至圣像，系明嘉靖时毁像易主，由学宫移祀于此；周南书院，康熙二十八年（1689），知府汪辑建，中祀唐相狄仁杰，因名狄梁书院。四十五年（1706），知府赵于京、知县吴征移东北隅，改名天中书院。雍正四年（1726），知府张汉重修，易为周南书院，用前知县钱肇修所立义学之名也。此三书院在雍正鼓励发展书院之前已经存在，且灋东书院为明代之延续，但从修建原因来看，分别以义学、祀孔子、狄公为名，可窥知在当时尽管未曾

<sup>①</sup> 刘景纯：《城市景观与文化——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文化的地理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22 页。

<sup>②</sup> （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志》，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③</sup> 据高元池等：《洛阳建筑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 页，《公元 1933—1945 年洛阳县城地图》改绘。



禁止，但书院的发展还是并不充分。雍正年间，政府的支持力度才逐渐开始加大，书院数量不断增加。

乾隆年间，除上述三座书院外，奎光、望嵩、玉虚、丽泽、敬业和棫朴书院皆由知县龚松林捐修，“延师课徒其中”<sup>①</sup>。此外，龚松林于乾隆八年（1743）在洛阳城周边亦设立了数所，除中山书院在县东北隅县署西南外，其他皆在城外——黄鹤书院，在县东南路掘山村；洛浦书院，在东南路白家石责；伊川书院和龙门书院皆位于正南路李家寨。洛阳城拥有十一所书院，尽管在数量上与同级城市乃至省城相比不少，但发展却并不顺利，持续时间较短，如望嵩书院，至嘉庆年间已沦为富商温氏的别墅。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因“旧所立书院十所，仅有其名，惟灋东书院存房舍七间，不足以客生徒”，知县毛师灏详请总归奎光、灋东两书院。至三十九年（1774），知县蒋果又捐建雪香书院，位于府奎楼街，并“俟再筹备”<sup>②</sup>。

从上述书院的兴建和演变情况来看，其皆为官员主导建立的，即所谓的“官学化”。元明时期的民间自主办学转变为清代的政府主导，表明清代对于社会控制的加强。这种加强既表现在书院的设置上，也表现在书院内部组成上。周南书院“前堂三楹为狄公祠，祠后讲堂三楹，后堂三楹”，“祀仓颉于后堂，以汉贾谊以下十六人配”。同样宣扬尊祖敬宗的伦理思想。直至“知府曹公元仁加意培植，以位置来安。改西郭旧八蜡庙为狄公庙，迁祀焉。又别祀仓圣他所。于是，书院乃专为诸生玄诵之地矣”。当然书院仍以收徒授业为要务，其主要建筑多为教学活动而设置，周南书院“乾隆六年（1741），署府李光行、署县朱续志添设斋房六所，各三楹”。雪香书院“头门三间，门房一间，讲堂三间，斋房十六间，院长住斋六间，厨房二间”<sup>③</sup>。

书院的正常运行主要以学田的租税来维持，同时也会有一定的官员捐俸和政府公费补助。周南书院因知府有意培植，故其经费颇为充足，有“膏火田四顷十三亩一分四厘”又“本府盐规银九十五两五钱八分，各属公费中拨银三百八十两，租银三十七两，共银五百一十二两七钱零，为每年山长修脯及生徒膏火之资”<sup>④</sup>。而至乾隆年间，周南、灋东等十所书院所存“学田租地共二顷六十亩零。每年收租银十八两六钱零”，学田规模尚不及周南书院原额学田之一半，由此可知，书院的衰落主要因经费筹措困难所致。至乾隆中期，书院则更为拮据，奎光、灋东二书院仰赖“每年知县捐廉俸”。雪香书院则有知县蒋果“共捐廉银五百有奇”以作“每年院长修俸，生徒膏火之费”，并希望“可垂久远，将详请归并焉”<sup>⑤</sup>。

<sup>①</sup>（清）魏襄：《洛阳县志》卷三十六《学校志》，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sup>②</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二十九《学校志》，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③</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二十九《学校志》，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④</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二十九《学校志》，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⑤</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二十九《学校志》，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书院的选址与书院的官学化过程相一致，由乡间向政府权力集中的城镇集中。清代洛阳城的书院，除涧西、瀍东二书院位于城外，其它九所皆在城内。涧西书院位于县西关，而西关地区为洛阳祠庙林立之地，环境幽静，适宜读书治学。瀍东书院位于县东关大铜驼巷北，洛阳县学在此，故其位于县学之旁。城内书院的位置情况如下表：

由上图可知，城内东部和东南部，书院分布最多，而河南府学位于东南隅，玉虚、奎光两书院位于府学周边，丽泽、敬业两书院也相距不远；周南、中山两书院则靠近府、县衙门，总体上靠近政治与文化中心，“这是中国古代‘天人感应’观念和星象学说观念相结合而形成的‘文崇东南’观念和意识在文教机构选址和建设中的时间表现”<sup>①</sup>。西北隅的栲朴、天中两书院，所处的观音寺和旧卫口附近，为较偏僻之地，环境清幽。西南隅之丽泽书院在旧府南口道西，面积开阔，较为适宜兴学。

### 3. 经学

清代回民教育的主要形式是经堂教育，在清真寺内进行，有阿訇等学问之士讲授，主要以宗教内容为主，兼及传统汉文化。经堂教育既有小学的启蒙教育，涉及各方面，也有以讲授经典的宗教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对于回民而言，学习经典乃其生活一部分，“今夫清真之教，系出天方，虔诵天经，恪遵天经，俱穆民者也”<sup>②</sup>。

清代，洛阳回民主要聚居于东关地区，经堂教育亦随之集中于东关地区的清真寺内。据现存碑刻记载，“洛邑东关旧有清真义学一座”，有关其设立的具体时间现今材料颇有出入，有两种说法：其一为“清道光二年（1822），回族群众捐资，在东关清真寺内办起一所‘清真义学’”<sup>③</sup>；另一为“相传建于乾隆年间……脊檩上书‘大清乾隆七年（1743）修建’等字，在清朝统治时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歧视回族。虽建有清真寺而不书寺名。至道光二年（1822），始在大门上方用青石一块，上书‘清真义学’代替寺名”<sup>④</sup>。结合两则材料来看，清真义学至少是在道光二年（1822）已经兴起。

回族的经堂教育，除了对儿童的启蒙教育外，很重要的一部分为对教众的宗教教育。此教育在清真寺中皆有，而不需要有专门的学校，由阿訇主持。从清真寺的一般结构而言，除拜殿、厦房等外，讲堂必不可少。讲经教师需要专门聘请。“寺

<sup>①</sup> 刘景纯：《城镇景观与文化——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文化的地理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sup>②</sup> 胡云生：《传承与认同——河南回族历史变迁研究》附录二《河南回族汉文碑刻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

<sup>③</sup> 宋丕祥、寇北镇：《东关回小的变迁》，《瀍河文史资料》第一辑，1990年。

<sup>④</sup> 王帖三：《东关清真寺》，《瀍河文史资料》第一辑，1990年。



果告竣，复念业已有寺口诵经无人，先世志事，究有未备，须延师传教方可，第师资无出，久将渐颓，转觉口然不乐……夫议定计剑，施田六十三亩正，永为延师赡养之资。自兹以后，教学有备，圣训弗替，而先世志事，庶得以少继述云尔”<sup>①</sup>。寺庙修建之后，最为重要的是“延师传教”，以保证“教学有备，圣训弗替”，从而使诵经有人，即正常的宗教活动得以进行。经典学习在回民的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每个清真寺的主要职能之一。

从现有材料来看，清代洛阳地区回民的经堂教育不甚发达，究其原因当为不少。首先洛阳地区的回民数量较少，从清真寺的数量和规模上亦能说明此点。虽然回民整体上以经商为主，但从现有的碑刻材料来看，洛阳地区的回民则多以务农为主，经商者也以小商小贩为主，如此的经济能力也就限制了回民有更多的精力和能力投入到经堂教育上来。这同样也与清代的科举政策有关，科举考试主要针对汉人而言，满、蒙等民族则可通过特殊渠道而入仕。回民，在清代地位低下，颇受压迫，缺乏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社会地位上升的渠道，进而影响到回民对于经堂教育的积极性。经堂教育的主要职能是为宗教活动服务，为清真寺内日常活动的一部分。

#### 4.新式学校

清末，随着西方影响的不断加深，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下达《兴学诏》：“着各省所有书院于各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sup>②</sup>。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各地模仿西方课程设置而开始的新式学校逐渐出现。这些学校多在旧有教育机构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因适应教学需要的一些建筑设施，改善了城内单调的景观组合，促进了城内文教空间的调整，加强了洛阳城在豫西地区的文教中心地位。

洛阳地区因深居内地，接受新思想不易，故清末推行之教育改革，声势浩大，但影响颇为有限，即便至民国初年依然如此，“洛阳偏处河南西部，输入新思想之机会既少，而固守旧习惯之根性更深。教育固之亦不发达，私塾所在皆有且学生极多”<sup>③</sup>。可见，传统教育方式依然为地方社会所接收，新学的推行既有政局不稳、财力不支的原因，此外，地方传统的抵制也十分重要。

明清河南地区灾害频繁，社会经济比较没落，在清末实施新学时，“清季创立学堂，承科举垂废之际，教育系统盲无规划，河南风气尤为晚开，光绪三十年（1904），始有少数州县设立高等小学堂，已在省立高等学堂成立之后。又越二年，各县始皆

<sup>①</sup> 胡云生：《传承与认同——河南回族历史变迁研究》附录二《河南回族汉文碑刻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sup>②</sup> 河南教育志编辑室：《河南教育官报》戊申第十五期，《豫报》第一号，《河南教育资料汇编（清代部分）》，1983年，第2页。

<sup>③</sup>（民）苏从武：《洛阳县小志》第九章《教育》，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有高等小学堂一二所，大抵就书院、试院等遗址改造”<sup>①</sup>。省城开封开风气之先，其他地区则较为迟缓，“此外各属学堂，其新筑校舍之有规模，已据报者，如彰德、卫辉、河南、荥阳、许长、邓州各处”<sup>②</sup>。不同于清代中前期，洛阳城内书院繁盛，清末改革学制时，仅有三所学校。“河南府中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建于东关双龙巷，赵国显任监督兼教员，教职员八名，学额一百十三名，岁支银三千五百余两”，教师则多为开封优级师范学校毕业生，武昌起义爆发后，河南府中学堂学生响应。洛阳县所辖学校有两所，“洛阳县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于城内经历司门就周南书院改建，校长卫敬修，教职员七名，学额四十名，岁支钱一千三百余文”，“县师范传习所，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建于城内文昌宫，监学郭凤章，教职员五名，学额四十名，岁支银五百八十二两钱八百一十六千文”<sup>③</sup>。不同级别的学校之间经费与规模差距明显，此外，在后续的专业学校的设置方案中，因“河南全境多山，培植林业，地利可收”，而有设立林业学校的提议，尽管未曾实施，也反映了推行新学政策者不同以往的务实思想。针对文盲率过高的情况，又设简易识字学塾，其中洛阳城关九所，周边乡村四所。清末，洛阳生员史直创办慈严小学，原为其私人住宅后院私塾，后改为洋学。所用课本与公立学校相同，也聘有教师任教。但其教学形式仍未改私塾模式，仍以读写为主。现为西南隅办事处<sup>④</sup>。

从清末洛阳新学的布局情况来看，多以沿用旧有设施为主，故其空间分布亦延续原来书院的分布特征。民国初年，又相继在城内西北成立河南省立甲种蚕校，利用空旷地区建立实验场地。

### （三）清代洛阳城信仰空间格局

人类生存除了必需的物质条件外，人称之为人的关键在于精神世界的充足。出于对世界的无知，人们面对不同的困境就会寻求各有所司的神灵的庇佑，上至帝王将相，下到黎民百姓，无不为之。洛阳城处于中华文明发源地，鬼神信仰文化发达，加之中古时期以来王朝出于种种考虑的造神运动，使得洛阳地区的信仰活动尤为兴盛。明清时期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末期，专制统治达到顶峰，并在城市的空间格局上体现出来，其信仰机构作为思想统治的重要手段而受重视<sup>⑤</sup>。洛阳在北宋之前主要为都城所在，政治、文化职能突出，北宋依然为实际上的文化中心，其后则大为

<sup>①</sup>（民）刘景向：《河南新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

<sup>②</sup>河南教育志编辑室：《详覆抚院宣统二年六月以前主管学务事项折呈请核文》，《河南教育官报》第八十九期，《河南教育资料汇编（清代部分）》，1983年，第12页。

<sup>③</sup>河南教育志编辑室：《河南教育官报》戊申第十五期，《豫报》第二号，《河南教育资料汇编（清代部分）》，1983年，第60页。

<sup>④</sup>耿彤：《老城历史上的庙宇、殿堂、祠堂、庵的概况》，《老城文史资料》第五辑，1985年。

<sup>⑤</sup>参见刘凤云：《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衰落，成为一般的地方城市。历史传统并未随着洛阳城市地位的下降而消失，反而成为影响清代洛阳城市空间的重要因素。

承载各类信仰与寄托的庙宇与作为政府教化手段之一的坊表建筑及近代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天主教堂共同构成清代洛阳城的信仰空间。本节在梳理清代洛阳城信仰设施的类型、数量和历史变迁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信仰空间的架构和中心区的形成机制，并试图探究其与城区环境的关系。

## 1. 祠庙分布与集聚

明清时期，“河南布政使司虽治开封，而洛阳尤当车马之冲，为河南一大都会”<sup>①</sup>，明代中后期洛阳为福王驻地，清初作为河南提督衙门所在，其在河南地区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清代中期，凭借便利的交通位置和本区棉花等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山陕商人大量积聚于此，洛阳城商业十分繁荣。<sup>②</sup>在这样的环境下，洛阳城祠庙繁多，庙会兴盛。“城内及附郭庙宇不下数十处，每处在春夏季时，各演戏三天。三日之中一日，名曰大会”<sup>③</sup>，“迷信之风特盛，各处大仙堂均悬扁额灯笼甚多，又凡称之稍大者，则前即盖有小庙，或挂红立扁”<sup>④</sup>。

### (1) 祠庙类型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圣灵和供奉对象，因各自的灵迹而为人们所敬奉。祠庙的位置既有礼制秩序的考量，也与不同区域人们的信仰状况，乃至经济能力有密切的关系。不被政府承认却在民间广为信奉的祠庙，分布颇为杂乱，但仍旧是地方信仰状况在空间上的直观反映。祠庙的类型与位置的确定原因繁多，同时期分布格局也构成了清代洛阳城信仰空间的骨架。通过翻检方志、文集和地名档案材料，得出清代洛阳城的祠庙类型与位置情况如下：

#### 甲、官方祭坛

“天人感应”思想使得人们意识到天地等自然事物具有超能力，加之由来已久的祖先崇拜，清代洛阳城遵从当时的制度规定，具有诸如社稷坛、天地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厉坛和纳入政府祭祀序列的庙宇，如龙神庙，“雍正五年（1724），赴京迎请建祠，各府州俱有”<sup>⑤</sup>。官方祭坛因其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故其具体方位较为明确，且各个城市之间差别不大。

<sup>①</sup>（清）魏襄：《洛阳县志·序》，嘉庆十八年（1820）刻本。

<sup>②</sup>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sup>③</sup>（民）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引《洛阳风俗琐谈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

<sup>④</sup>（民）苏从武：《洛阳县小志》第十章《社会状况》，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sup>⑤</sup>（清）田文镜：《河南通志》卷十《礼乐·庙》，雍正十二年（1735）刻本。



## 乙、名人祠庙

洛阳地区不仅在历史上出现诸如程颐、程颢之类的理学大家，也是为数众多的名人学士的宦游和定居地。因此，为纪念先贤大儒、文官武将和地方名人而兴建的祠宇是洛阳城中的重要祭祀空间。人们对于名人的崇拜由最初的纪念、怀念逐渐经过各种传说的添加而视为神灵来敬奉。祠堂具体又可分为两种形式，即专祠和合祠。专门纪念一人而修建为专祠，如位于东关的贾太傅祠，西关的唐狄梁公祠。合祠则多因有共同功绩、相同的学派的等合祀一处，人数不等，如西关二程祠，东关夹马营南的明三贤祠等。此外还有将功绩、身份等相近的一类人共置于一处合祀的祠，如忠义祠、节孝祠、名宦、乡贤祠等。清代洛阳地区的祠堂，皆为身后祠。整体上看，清代洛阳城的祠堂以祭祀学问和政绩出众的人为主，也反映了人们对“立德立言”传统的推崇。

## 丙、鬼神信仰

除去政府主导设立和承认的祭坛、祠庙以外，普通百姓生活中的灾难困苦都需要诉诸于神灵，以求解决。在中国人心中，对神灵的崇拜是基于现实世界的种种考虑，亦所谓“灵”，是人们信仰的出发点和归宿。即便政府不予承认，乃至严加禁止，只要灵验，此神灵便为人们所推崇，香火不断。<sup>①</sup>

## 丁、家庙

宗族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对于人们来说极为重要，维系宗族团结的的纽带之一即为祠堂（家庙），通过定期的宗族活动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延续宗族的发展。清代洛阳城内生活有一定的世家大族，“洛阳的南城到东城一带，尽是这些所谓世家集居的地方”<sup>②</sup>。这些世家大族也建有一定的祠庙，成为洛阳城信仰空间的一部分，如西南隅顺城中街的温家堂；董家后裔遍及洛阳及豫西一带，在城内有董家家庙，即董老官祠堂；庄家祠堂在袁胡同北路路东。这些祠庙多位于家族聚居地。

表 4.2 清代洛阳城坛庙分布表<sup>③</sup>

名 称	位 置	名 称	位 置
社稷坛	县西门外	府城隍庙	西门内大街
县城隍庙	西关周公庙左	厉坛	北门外
风云雷雨山川坛	府城南城外	龙神庙	城内十字街东

<sup>①</sup> (美) 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12 页。

<sup>②</sup> (民) 倪锡琰：《洛阳》，南京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6 页。

<sup>③</sup> 据乾隆《洛阳县志》卷六《礼乐》；嘉庆《洛阳县志》卷十七《庙坛记》；耿彤：《老城历史上的庙宇、殿堂、祠堂、庵的概况》，《老城文史资料》第五辑，1984 年。



火神庙	城内十字街东	东岳庙	府城东关
旗口庙	西北隅	八蜡庙	十字街东
大关帝庙	义勇前街北段	关帝庙	山西东、西会馆
小关帝庙	东南隅	妥灵宫	府学门街东头
忠义祠	东关	府节孝祠	府学东
县节孝祠	城内东南隅	文昌祠	东北隅
仓圣祠	迎恩寺	阿衡祠	东关
汉萧曹祠	城内	贾太傅祠	东关
强项令祠	东关门	唐狄梁公祠	西关
白文公祠	龙门镇	邵子祠	安乐窝
九贤祠	安乐窝	四贤祠	县学
二程祠	西关	范文正公祠	西关
邵子祠	西关	朱子祠	西关
明三贤祠	东关夹马营南	刘文靖公祠	西关
王襄邑公祠	县西北隅	尤时熙祠	县城隍庙右
董尧封祠	东关	陈麟祠	县西北隅香行街
总制张君松祠	西北隅	李士元祠	郡学
知县俞君信祠	龙门镇	董笃行祠	同王街
尚书孙公应奎祠	东关	冯祯祠	县南
霍鹏祠	夹马营道东	寇学礼祠	北郭
阎贞女祠	南门月城内	曹节妇祠	东关夹马营南道西
刘赞、刘衍祚、刘广业合祠	县城隍庙东	崇圣祠	县学
周公庙	西关	名宦祠	县学
三圣祠	府城外夹马营	乡贤祠	县学
汤王庙	府城南	文昌祠	县学
朱买臣祠	府城东关	董恭敏公祠	府城东
朱文公祠	南关竹竿巷	苾宏祠	灏水西侧
僧王庙	吕氏街南	李靖庙	府城旧旌善坊
灵官庙	西郭社稷坛北	给谏刘贄祠	府城西关
崔府君庙	府城南关	灵官庙	西北隅旧府后
二郎神庙	府城西关	金龙四大王庙	府城小石桥
土地庙	正义街西	刘猛将军庙	府城西北隅
四龙庙	万安街东路北	三结义庙	新街北段路东
药王庙	菜市西街东口	火神庙	贴廓巷东段路南
劈山庙	大王庙西	火神庙	药王庙西



大奶奶庙	北 关	祖始庙	北 关
玉皇庙	北门内以西	三清庙	西郭社稷坛北
真武庙	人和巷东	真武庙	东北隅圆觉寺西
真武庙	南郭洛水北岸	真武庙	西郭文昌祠南
真武庙	演武场西道北	后土庙	北 郭
天齐庙	新建仓南	神州庙	吴家街西道北
宓妃庙	东郭泰山庙左	薄太后庙	东郭大铜驼巷
二仙庙	东南隅二仙巷	九龙圣母庙	西北隅同王街后

## (2) 祠庙的分布

官方坛庙，尤其是以自然崇拜为主的坛庙，中央政府从制度上做了具体规定，各个治所城市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地点设立，故出现了所谓的稳定状态，如厉坛，位于城北部，因季风气候，冬季寒冷，有肃杀之气；社稷坛和风云雷雨山川庙则位于城的西部和南部。明初“一切淫祠悉经厘革，定为百代不刊之典，而城隍之祠自都城通于天下，虽封爵不加崇，尚益”<sup>①</sup>，且以“城隍理幽事比于社稷臣，御灾捍患”<sup>②</sup>，多为主政官员重视，亦多加修葺，可知城隍的选址是有一定的考量的。城之西侧的位置安排，一方面因城隍神“理幽事比于社稷臣”，即为处理阴间事务的地方官，而“西方”在传统中国人之意识中为死亡之地，故将城隍庙布局在城西门附近含有此种考虑；此外，周公因营洛“与洛相始终者为何如哉。公之经天纬地，制作垂万世者不具论，德之在洛者”，故“洛之祀公也，人心之良”<sup>③</sup>，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洛阳城的守护神，这一点在县城隍庙位于周公庙左和历任官员对于周公庙维修之重视上体现出来。清代洛阳城内，官方认可的祠庙以关帝庙为多，主要分布在西北隅和东南隅两个城区，大关帝庙明代即建，而明代此区域为伊王府、府衙等之所在，关帝被视为武神而保佑之；同样关公亦被当做财神敬奉，东南隅、南关地区在清代为洛阳商业最为繁盛之地，商号林立，信众自当繁多，故庙宇较多。龙神庙、火神庙、八蜡庙位于城内十字街东，靠近官署衙门区，有保护建筑平安之意。东岳庙（泰山庙）位于东关，与崇祀之对象的方位有关。

<sup>①</sup>（明）佚名：《河南府重修城隍庙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②</sup>（明）刘泽演：《重修城隍庙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③</sup>（清）曹元仁：《重修周公庙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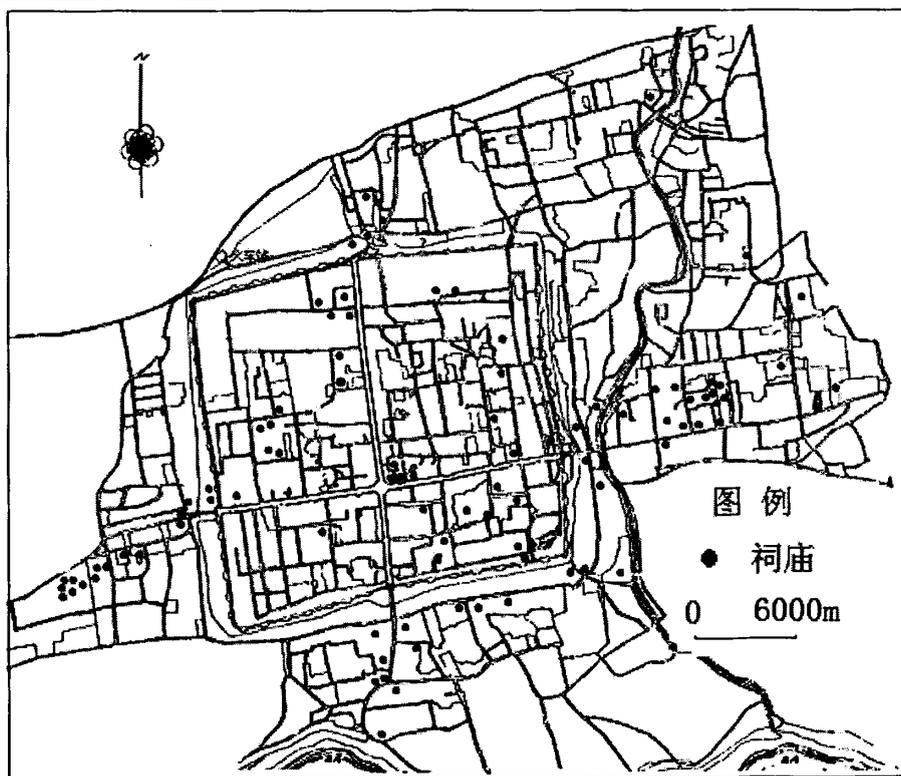


图 4.3 清代洛阳城关祠庙分布图<sup>①</sup>

清代洛阳城内之信仰建筑以祭祀先贤等的祠庙为多，整体而言，城区皆有分布，且较为杂乱，但仔细辨别所崇祀对象后，亦能发现祠庙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庙主的身份大致可分为名儒、圣王、名宦三大类，这些人生前多与洛阳有密切之联系，又因洛阳历史悠久而人物众多。忠义祠、节孝祠、崇圣祠、名宦祠等崇祀对象繁多且教化作用鲜明的合祠主要位于府、县学中，更是说明官学教育除了作为科举制度的机构外，亦具有浓烈的教化职能，且地方性鲜明。崇祀名宦的祠庙分布范围较广，以东关地区为主，贾谊祠、孙应奎祠、三圣祠、朱买臣祠等，南关、西北隅地区间有分布，如王邦瑞因“隆庆间，天子褒恤忠谊，诏卿大夫死职事劳勋最著者，有司得专祠于乡”而经有司“相采輿议檄所司专祠”，建祠于“郡治，付阴面阳”<sup>②</sup>。祠庙建于城内，有司以时祭祀颇为方便。有些祠庙则位于其有重要宦迹之处，白居易祠在龙门镇，因其晚年居住香山；俞信祠则因其主要功绩在龙门镇而建，寇学礼祠

<sup>①</sup> 据高元池、何肃然、贺廷栋：《洛阳建筑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 页，《公元 1933 年—1945 年洛阳县城地图》改绘。

<sup>②</sup>（明）王宏海：《少保王襄邑公祠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位于北郭亦因此种原因。唯一例外的为僧王庙，在南关吕氏街，祭祀清军将领僧格爾沁，而其与洛阳无甚关系，为自上而下之命令的结果。阎贞女祠和曹节妇祠，以其行为而被建祠宣扬，选址于其殉节处。要之，祠堂选址与祀主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

西关地区最早的祠庙当为周公庙，周公庙“相传为汉太学故址，洛有先圣庙起于唐”，周公作为洛阳城的创建者，“以公卜于洛邑”，受到后世的景仰<sup>①</sup>。县城隍庙则在周公庙左，充分说明了作为城市保护神的城隍和周公在洛阳当地社会认识中的密切关系。围绕着周公庙，二程、范仲淹、邵雍、朱熹等理学名儒和刘健、尤时熙等洛阳本地理学名士的祠庙渐次分布，形成了典型的以名儒信仰为主的集聚区。相对于西关地区而言，虽然东关在数量上具有优势，但是因其分布太为分散，且各个祠庙之间缺乏联系，没有形成集聚效应，因而未形成全城的信仰中心。

周公庙“历代之兴废不常，其远者已不可考”<sup>②</sup>，主持修建者多为地方官员，究其目的，乃“欲振兴文教”且在周公庙“复建文昌阁以佐之”<sup>③</sup>。周公被视为儒家创始者，明清两代历任官员不断修葺的动机也甚为明确。关于崇奉儒学的情况，在明陈宣《伊洛渊源祠记》中，有明确的表述：

弘治元年（1488）丙辰，宣来守是邦……再复九贤祠，两夫子皆在焉，然泛而不专也……是劝洛人之志道者朱永昌等并渊源祠于西郭洛阳门之左……如孔庙制，极其简朴，象意也。<sup>④</sup>

尽管已经复建了包括二程在内的九贤祠，但由于其“泛而不专”，无法凸显二程的重要性，其原因在于洛阳为二程之出生地，从“伊洛渊源”的祠名即可看出此考虑。在修建伊洛渊源祠后，人们似乎仍不满足，后世主政者通过另建专祠以崇奉儒学，强调对二程的崇奉，同时在实际上增强了西关地区对其他儒学祠庙的吸引力：

斯道有统，二子承之维，是洛土二夫子生焉，乃未建祠，实有司之缺也。范为此罹，乃作庙，谓偏侧不足以妥神灵，隘巷不足以来瞻仰，得城西关廂民舍数十丈，乃厚价构之庙，而后敬像，而后礼人情也。<sup>⑤</sup>

<sup>①</sup>（清）龚松林：《洛阳县志》卷六《礼乐》，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②</sup>（清）曹元仁：《重修周公庙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③</sup>（清）佟凤彩：《重修周公庙记》，乾隆《河南府志》卷八十六《艺文志十·记四》，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④</sup>（明）陈宣：《伊洛渊源祠记》，乾隆《河南府志》卷八十五《艺文志九·记三》，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⑤</sup>（明）于范：《二程夫子祠堂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二程作为洛学之创始人，其思想在明清时期为统治者所宣扬，为后世从学者所敬仰，在西关建立祠庙以后，具有重要意义。二程之后学，则皆以二程为宗，其祠庙也围绕二程而建。如尤时熙祠，尤时熙乃明代洛阳名儒，虽然官员认为其“宜从祀学宫，疏奏不报”，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但其弟子则自行建置，“于是门弟子私议盖祠于乡……祠卜于洛城西关，坐坎向离，盖都邑公以官田易民田为之祠”<sup>①</sup>，尽管为占卜所的基址，事实上说明民间自发修建理学祠庙同官府建造相同，皆以西关地区为首选，况且尤时熙祠修筑过程中本就有官员的参与。明末洛阳城毁于战火，西关祠庙亦不能幸免，“兵燹之后，荡然为墟”，至清初，“莅斯土者，肇修礼祀，次第具举”，而独尤时熙祠最后才修，其中原因似与其未入国家祀典有关，即便如此，从修建者的角度而言，其功能是相同的，“所以敦教化而励人心者乎”<sup>②</sup>。

有关理学诸子祠庙的选址，黄绶在《重修朱子祠堂记中》对此有形象的记述：

洛阳南门外有汉寿亭侯庙，庙后有文公祠，噫何偪也。公之与侯，时与事相去远矣。揆之配食合食之意，两无所取，况前后俾窄，展拜无他，神可宁乎？吾独怪梵宇元宫辉煌金碧，而继孔孟之绝学，衍斯道于将来者，乃不得一宏敞无碍之地，而奉一食焉。其于□崇大义重祀典之心未必不大相刺谬也。于是卜城之西隅，协吉迁公之主而祠焉。其左为理学尤夫子祠，其右为康节邵子、明道、伊川、二程、文正范公祠，昔之人亦以似隙其地以待改祠，我公道固乐其同也……祠与安乐窝，仅隔一衣带水，彼此相望，邵、朱两公讲学垂教之心更□人得之于观感起发之际，义固取其足以益于世也。<sup>③</sup>

从中可知，朱子祠原来位于南关地区，与关公庙相邻，由于两者之间“时与事相去远矣”，而缺乏合祀的必要，且建筑狭小，与朱子的地位不相称，且不利于弘扬孔孟之道，基于种种原因，而确定迁移。之所以选择西关地区，是主事者经过深思熟虑的，既有行占卜，又择吉日，同时，“其左为理学尤夫子祠，其右边为康节邵子、明道、伊川、二程、文正范公祠”，“祠与安乐窝仅隔一衣带水，彼此相望”，众多名儒祠庙的集聚成为其重要原因，或者吸引力，如此的安排反映了主事者的用意，“义固取其足以益于世也”，通过宏大的庙宇和严整的仪式宣扬儒家思想。

<sup>①</sup>（明）杨东明：《西川尤先生祠堂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②</sup>（清）董笃行：《重修理学尤夫子祠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③</sup>（清）黄绶：《重修朱子祠堂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邵雍祠“创祠宇于二程之东，以明景仰无穷之志”<sup>①</sup>，范仲淹祠“既建程夫子祠于中，邵先生祠于左，复辟西偏之地为公祠堂，使天下知之忠心”<sup>②</sup>。纪念吕维祺的会忠祠“在周公庙后”<sup>③</sup>。经历明清两代，西关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周公庙为中心，囊括二程、朱熹、邵雍、范仲淹、尤时熙等祠宇在内的儒学名士祠庙的聚居区。

### (3) 西关信仰中心形成原因

西关地区由于众多儒学名士祠庙的聚居而成为明清时期洛阳城的信仰中心，从其形成过程看，在明代已经祠庙林立，“洛城西郭祠宇林立，由来尚矣”<sup>④</sup>。然而，西关地区之所以能成为儒学祠庙的集聚地，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 甲、历史传统与主流思想

周公被视为儒家的创始人，且作为洛阳城的最早创建者，周公营洛“与洛相始终者为何如哉。公之经天纬地，制作垂万世者不具论，德之在洛者”，故“洛之祀公也，人心之良”<sup>⑤</sup>，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洛阳城的守护神，此一点在县城隍庙位于周公庙左和历任官员对于周公庙维修之重视上体现出来。儒家思想自从汉代确立其正统地位之后，至明清时期未曾动摇。洛阳城长期作为政治中心，正统文化对于该地区的影响相当深厚，明清两代在思想统治上采取高压态势，科举考试更加强化了人们对于儒家思想的遵从，在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上，都促使人们对儒家思想的崇奉，而周公庙不仅作为洛阳城创建者的化身，本身亦是政府统治的重要凭借，奠定了儒学影响的广泛基础。同时，西关诸祠庙除了作为祭祀场所之外，部分也承担着一定教育职能，如二程祠“谓诸生当习业其所，乃作讲堂于庙后，亦五间六楹七楣；谓生徒当有所栖，乃作号房于讲堂东西”<sup>⑥</sup>，尤时熙祠“后为讲堂七楹，以备门弟子及后起者之会讲于斯”<sup>⑦</sup>。

#### 乙、明清洛阳地区的理学传统

乾隆《河南府志》载：“迂固作儒林传，后代史家因之。宋史始标道学之目，其由伊洛而推者輿。盖圣门千秋绝学至二程子而续其传，而又得吕、邵诸贤为友，刘、李、尹、张诸儒为之弟子，一时并萃于百里之中，悠游二水之上，伊洛也，宛

<sup>①</sup>（清）武攀龙：《新建康节先生祠堂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②</sup>（清）武攀龙：《新建范文正公祠堂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③</sup>（清）张汉：《会忠祠记》，乾隆《河南府志》卷八十六《艺文志十·记四》，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④</sup>（清）董笃行：《重修理学尤夫子祠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⑤</sup>（清）曹元仁：《重修周公庙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⑥</sup>（明）于范：《二程夫子祠堂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⑦</sup>（清）董笃行：《重修理学尤夫子祠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若一洙泗矣”<sup>①</sup>，对洛阳城在北宋时期洛学的繁盛和源流情况有清晰的追述，以表明洛阳地区理学的历史传统，同时也为明清时期洛阳理学兴盛，成为北方理学重镇的重要基础。

“元明白姚文献、曹月川二先生外，道学渊源转相师授于今不乏。我朝（清）耿逸庵先生为尤著焉”<sup>②</sup>，乾隆《河南府志》载，明清两代河南府道学名士共17人，其中13人为洛阳县人，其结成绩真率会、敦谊会、瞻逸会、崇雅会、初服会、伊洛大社等文人集团，其中多数为官神致仕之后的逸老之会，但也有不少的文会，成员之间相互唱和、切磋学问，具有浓厚的理学气息，如吕维祺所创立之伊洛大社“立伊洛会。先生虑伊洛久淹，圣学不明，以姚虞唐……等来学，五十余人作伊洛社，讲学于程明道书院，以初二、十六为期，又以初三、十七为文会。谓诸子曰：‘理学举业，初非两事’，从游渐众，至二百余人”<sup>③</sup>。吕维祺作为晚明洛阳地区的理学巨臂，不仅发扬了理学传统，同时也促进了洛阳地区学术的转型。<sup>④</sup>文人结会和讲学在洛阳城的流行，增强了理学在洛阳地区的影响力，理学名士祠庙的建立既是这种影响的结果，同时也起到了强化的作用。

### 丙、西关地区的局地环境

西关地区的祠庙，作为祭祀建筑，为符合各种礼仪规范，其规模较大，如刘健祠“大门三间，内东西厦各一间，二门一座，内东西厢房各三间，堂三间，堂之后空地一丈二尺，东西阔三丈五尺，南北长五十丈一尺，周匝墙垣”<sup>⑤</sup>，朱子祠规模“约地长二十三丈七尺，南阔五十一尺一寸，北如之，正祠三间，门三间”<sup>⑥</sup>，如此大的占地规模对于城内面积狭小的洛阳城来说，提供足够的空间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虽然刘健在“嘉靖二十年（1541），考口一省乡贤，公居首，钦准立祠”，但是“因无高阜官地，延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据前命有司修建”，从准许立祠到最终祠庙建成，期间耗时近二十三年，究其原因为“无高阜官地”，既说明了祠庙的立、修，需经过政府考订批准，程序繁琐，多择“高阜之地”而建，同时也反映出土地空间的重要性。其他如二程祠“偏侧不足以妥神灵，隘巷不足以来瞻仰”；朱子祠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为“前后口狭，展拜无他”，建于西关原有各祠庙之间的空余土地，而有“昔之人亦以似隙其地以待改祠”，原有基址的狭窄与西关地区土地充裕成为鲜明对比。

<sup>①</sup>（清）施诚：《河南府志》卷四十《人物志三·道学》，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②</sup>（清）《河南府志》卷四十《人物志三·道学》，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③</sup>（清）施化远：《明德先生年谱》卷四，齐鲁书社1997年。

<sup>④</sup>扈耕田：《吕维祺与明清洛阳学术转型》，《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sup>⑤</sup>（明）温如春：《太师谥文靖刘公祠堂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四》，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⑥</sup>（清）黄绶：《重修朱子祠堂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从西关土地的获得途径来看，多由官绅或出资购买民田，或进行田产置换，二程祠“得城西关厢民舍数十丈，乃厚价构之庙”；尤时熙祠“盖都邑公以官田易民田为之祠”；刘健祠“动支本府库调二百八十两，修建祠地，价买张策等，有契约存照”，说明了西关地区祠庙土地的来源和交易情况。同时作为祭祀建筑的祠庙，其选址在传统社会具有价位严苛的要求，体现在各个祠庙建设前的占卜上，尤时熙祠“祠卜于洛城西关”，朱子祠“卜城之西隅”等，从风水上说明西关地区的优越性。按西关地区在明代至清初“此地半系军地，为卫出租”，且在清代户口相对而言稀少，且涧河距城约七里，其间地形平坦，环境条件较为优越，且位于东西大道之侧，交通便利，为往来客旅所能见到，因此也较能引起过往官员的注意而倡导修缮祠庙。

## 2. 寺观

洛阳地区佛教历史悠久，白马寺乃佛教名刹，在佛教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北魏洛阳城的佛教寺院多达一千多所，唐宋时期数量依然可观。宗教信仰利于巩固统治，教化民众，明清两代对佛教多有扶植。明清时期佛教世俗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民众之联系更加紧密；道教作为本土宗教，从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民间性，故民众的参与程度较高。此一时期，佛、道合流的趋势更加明显，民众的佛道不分则是鲜明的体现。清代洛阳城的佛教信仰颇为繁盛，寺院因之而多。道教因其广泛的民间支持和与佛教的联系，在清代洛阳城亦较为兴盛。

寺院、道观作为正式的宗教性建筑，不同于一般的信仰建筑，其规模较大，结构也更为完整，故占地面积和所需费用更大，此一点从主持修建人的身份即可看出，多由地方官员或士绅捐资修建，有些亦作为主持宗教事务的官府机构的驻地。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寺庙、道观的分布与城内街道、商贸空间和文教场所的联系密切，其空间分布的变迁与特征，对于清代洛阳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有重要的影响。

表 4.3 清代洛阳城区寺观情况表<sup>①</sup>

名称	位置	兴建过程
福先寺	府城北郭	康熙三十五年邑人王善言修
法藏寺	西北隅，旧府后街	正统六年伊府承奉阮普秀建，顺治五年僧纲司方龙募修
迎恩寺	东郊夹马营以东	明福藩建，乾隆七年知府曹元仁、知县朱永庆修
莲花寺	县东北隅府署后	康熙十五年修
圆觉寺	东北隅新建仓西	康熙十二年总兵官林顺捐修

<sup>①</sup>据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一《寺观》；嘉庆《洛阳县志》卷二十二《伽蓝记》；耿彤：《老城历史上的庙宇、殿堂、祠堂、庵的概况》，《老城文史资料》第五辑，1984年。



寿春寺	东北隅延福宫南	——
万泉寺	新建仓南道东	——
观音寺	西北隅, 旧府后街	景泰五年伊藩建, 康熙四十八年尼道任重修
十方院	东北三里瀍水西岸	万历二十六年给事中刘质建
兴福庵	南郭雷家口南道东	——
海潮庵	东郭石堰头	——
地藏庵	北 郭	康熙四十八年僧常魁修
云集庵	地藏庵东南	——
千祥庵	东 郭	明季福藩宫人建, 康熙十四年僧天成修
感应庵	东 郭	乾隆二年僧慧科修
石佛堂	西门内木植市道南	——
三圣堂	南郭锁市湾西道南	——
无量殿	东南隅马蹄街道北	康熙四十年僧庆印修
白衣阁	县东郭闸口街北	——
白衣阁	西郭真武庙前	康熙二十四年邑人王起龙修
白衣阁	人和巷马王庙东	——
观音堂	东南隅人和巷东南	——
观音堂	西南隅安国寺道东	——
观音堂	参将署西道南	万历十六年邑人温溶修, 名温家堂
观音堂	马王庙南道西	乾隆七年邑人王希舜等修
观音堂	西北隅水陆堂道南	——
上清宫	府城北	明伊王妃方氏建, 雍正八年知府张汉修
玉虚观	在玉皇阁	金大定间建, 康熙五十四年里人郭内广修
云溪观	东北三里瀍水西岸	顺治十年邑绅邱起凤、康熙四十五年道士李太先后重修
延福宫	县东北隅	明弘治二年, 伊藩建
吕祖庵	县北瀍水西岸	康熙四十八年邑人任钟英修
清真寺	新街中段	——
清真寺	东关大街东头	——

清代洛阳城 4.5 平方公里（包括关城）范围内，分布有 50 座寺观，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1 座，分布密度之高，在当时的府级城市中十分罕见，也说明洛阳地区宗教传统的势力之强。但从具体的城区来看，却具有一定的差异，进而反映出不同城区之间的社会信仰状况。

北郭地区因临近邙山，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缺少必要的信仰群体的支持，故此区域寺观在所有城区中最少，仅有福先寺、地藏庵和后土庙。

东关地区，为清代洛阳城经济发达地区之一，人口最多，交通便利，地势平坦开阔，寺庙较多，且因有回民分布而集中了洛阳城区的清真寺。此区域在明代为福



藩的重要宗教区，迎恩寺为福藩宗寺“城东北郭尽处，从朝贡孔道，且不妨民居也”<sup>①</sup>，交通因素与信众支持是这一地区成为清代洛阳城继西关之后的重要文化中心地。

南关地区，仅真武庙、三圣堂和兴福庵三所寺观。而南关地区为清代洛阳水陆码头，经济繁盛，信仰却不甚发达，且此三座建筑颇为狭小，影响力也不十分显著，当与南关地区其他信仰发达有关。

西关地区，从上节可知，在祠庙等信仰方面为洛阳城的文化中心，而寺观等仅有白衣阁、三清庙和真武庙三座，情形与南关地区相似，说明信仰之间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总体而言，清代洛阳城四关地区中东关地区的寺观分布最多，其他地区则因各样原因寺观数量甚少。

表 4.4 清代洛阳城寺观祠庙分类表

城 区	寺、庵	宫、观、庙	清真寺	祠	坛	教堂	合 计
东 北	4	6	0	1	0	0	11
西 北	3	9	0	3	0	1	16
东 南	3	3	0	3	0	1	10
西 南	2	2	0	0	0	0	4
东 关	6	8	2	17	0	1	34
西 关	1	4	0	8	1	0	14
南 关	3	9	0	4	1	1	18
北 关	3	2	0	1	1	1	8
全城合计	25	43	2	37	3	5	115

从城内寺观分布情况来看，东北隅有莲花、寿春、万泉等7座寺观，分布密度较大，此区域明代为福王府所在地，清代则为衙署集中区，但相对于明代而言，土地利用程度已经降低许多，故空地较多，寺庙也多由官员捐资修建。东南隅地区仅有无量殿、白衣阁、观音堂和真武庙4座寺观，数量较少，与本区为府学所在地和商业较为发达、面积较小有关。西南隅仅有石佛堂和观音堂，为城内乃至整个城区范围内寺观分布最少的地区，同东南隅一样，本区面积狭小，清代为主要军事机关的聚集地，居民区规模较小，故而寺观较少。西北隅有7座寺观，与东北隅相同，此区面积较大，清代土地利用程度低，各类衙署机构较少，且南部地区商业繁盛，故寺观较多。

<sup>①</sup>（明）邢绍德：《福藩奉敕创建迎恩寺碑记》，乾隆《洛阳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四·记二》，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 3.坊表

坊,在中国古代城市中乃隋唐时期的坊市制中用于城市管理的具有坊墙和坊门,定期开闭的制度及物理实体。唐宋坊市制度崩溃以后,坊依然存在,至明清时期已具有牌坊、街坊、乡坊和坊图等多种意义,而具体到清代洛阳城,坊之意义则为牌坊,是传统社会政府进行统治、教化的礼仪性建筑。耸立在街头巷首的牌坊构成了城市的立体空间,而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则是对当时城市社会状况在空间上的反映。清代洛阳城内的牌坊状况,主要记载于乾隆《洛阳县志》等志书中,通过对清代洛阳城牌坊的类型与分布状况的分析,探讨政府教化在洛阳城的空间分布的一个侧面。

清代洛阳城的坊表,按照类型可分为崇德、明神、官治、仕宦、科名和旌节六种,每一类型的牌坊有其特殊的指向性与分布位置,对于分析相关地区的功能分布和居民状况具有重要的作用。崇德坊多位于教育机构和先贤名儒祠庙之前,以彰显其美德风尚,如县学东、西之修口坊、景贤坊,府学前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坊。明神坊,则皆位于重要祠庙之前,如关帝庙前之忠昭日月坊,玉皇阁前之玉帝庙坊。官治坊位于衙署之前和名宦祠庙之前,县大堂前之圣谕坊,东门内之强项侯董公坊,察院前之澄清坊。几乎所有的官府建筑前都有至少一个牌坊,此亦是中国古建筑的一大特点,通过牌坊来强调建筑的职能,寄予一定的期许或要求。仕宦坊则多为纪念本地区有功名且有一定杰出贡献之人士,且一人之坊表不只一座,如王邦瑞之特简口枢坊和大司马坊。科名坊与仕宦坊较为相似,关于所处位置不详,但从明神等类型牌坊的安置特点来看,位于相关祠庙周边的可能性极大。因此,从以上五种类型的坊表的分布特征来看,其位于一定祠庙或行政机构之周围,增强权威和彰显功绩,以达到教化之目的。从建筑结构而言,可看作是衙署、祠庙等的附属物。

旌节坊即贞节牌坊,为传统社会对妇女的迫害,宣扬纲常思想之工具,但其所立方位之特点,对于了解当时的居民居住情况有一定的帮助。如西北隅大关帝庙西,康熙二十六年(1687)所建之坊对象为举人董维翰之妻,而董氏一族为洛阳大族,由董维翰之举人身份可知,董氏成为洛阳大族原因之一为其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其在洛阳地区的地位。此外,关于牌坊住所的信息,提供了清代洛阳城内街道的信息,如乾隆五年为庄景口妻刘氏所建之祠位于东南隅米巷街,在“里保”中没有记载。乾隆四年为董九苞妻子刘氏所建之祠,位于东南路李村西街,可知李村当时的街道至少两条,村内甚至以街道为名进行划分,对于本身文献记载就少的豫西地区乡村聚落形态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由于牌坊从推选到最终朝廷准予建立,需要经历诸多环节,立坊在传统社会作为一种荣耀,成为一种争夺的社会资源,



因而家族地位对于牌坊的建立与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具有偶然性的分布亦是对社会空间的另一种角度的反映。

#### 4.教堂

基督教在唐代即已传入中国，后因中西方文化冲突等原因，传播范围极其有限，至清末，《天津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得外国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地传教之后，基督教逐渐从沿海地区传入内陆。洛阳作为进入西北地区的重要通道的节点城市，亦成为重要的基督教传教区。教堂作为基督教（天主教）的信仰中心，其数量与分布可反映当地的信仰状况。

清代，在洛阳城区传教的基督教派主要是信义会和内地会。内地会首先进入洛阳传教，“清光绪十六年（1890）瑞典牧师罗贯民在豫西一带传教”<sup>①</sup>。河南内地会的总会设在洛阳，隶属于位于山西运城的总会。罗贯民在北关龙泉沟建洋楼开始在洛阳地区传教。光绪三十年（1904）在北大街建教堂，后又在丁家街建一小教堂。在洛阳传教的内地会牧师还有包罗道、培礼德等。内地会到洛阳以后，发展速度很快，先后在洛阳北关的龙泉沟、北大街和丁家街建立教堂。

信义会由美国传教士付一民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来洛后，在兴隆街南头东侧购地建堂（即美国福音堂），设堂布道，发展教徒。后来，在老城东大街建立布道所。继而，在兴隆东街教堂以北设立福音医院，对外行医传教。<sup>②</sup>信义会在洛阳后来居上，在敬事街、东关兴隆街建立教堂、牧师楼、医院等。信义会先后在洛阳城区设立了东大街、敬事街、东关和南关四所教堂。

天主教在洛阳的传播起于清咸丰八年（1858），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入洛阳传天主教。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天主教传教士柏长青、鲍慧玲、彭伯炎三个意大利籍司铎，由郑州教区来洛传教，在南关马市街建立天主教堂，发展教徒，设点布道。宣统二年（1910），南关天主教堂迁到当时由英、比合修的洛阳车站教堂，占地约9亩左右。<sup>③</sup>

<sup>①</sup>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志·民族宗教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sup>②</sup>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志·外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sup>③</sup>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志·民族宗教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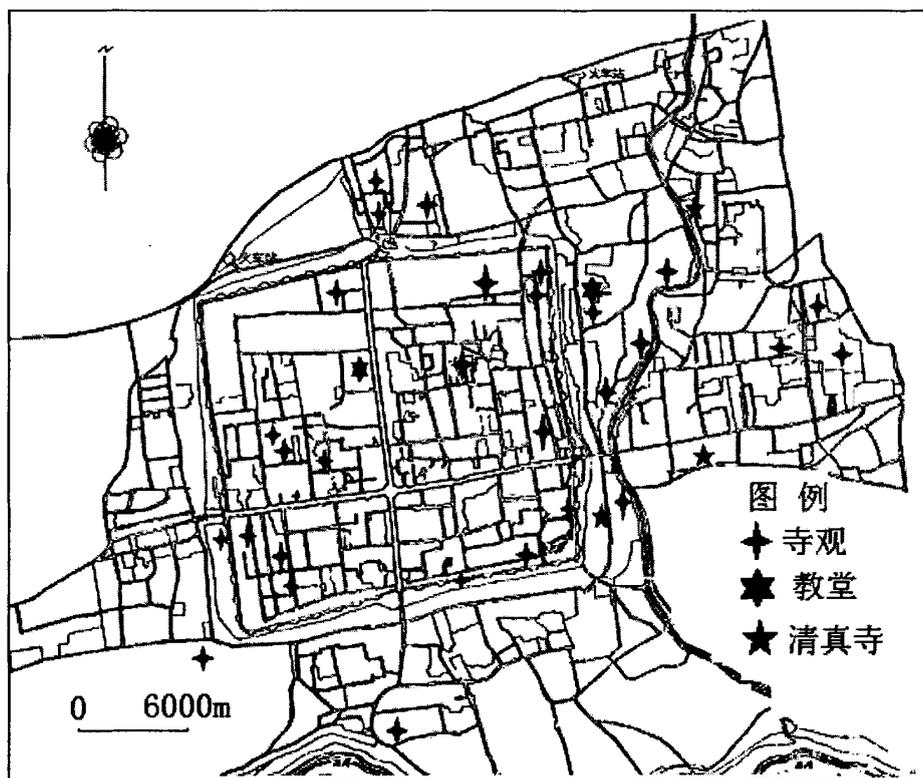


图 4.4 清代洛阳城区寺观、教堂分布图<sup>①</sup>

由上可知，清代洛阳城先后共有教堂 9 所，但从信众数量上来看并不乐观，民国初年，甚至一度出现衰败情形，“耶稣教，有教堂两所，一在北关为美人所建，有牧师五人；一在城内为瑞典人所建，牧师四人，然信教者不甚多，惟城北之海资附近有信徒百余户而已”，“天主教，信者甚少，惟城北大杨河村中央寺之天主教堂及车站意人所建之天主教堂二所”<sup>②</sup>，无论是教堂数量，还是信众人数似乎都不甚多，直至民国二十年左右，洛阳全县信众才有 13000 余名<sup>③</sup>。从清代洛阳城教堂的时空演变上看，传教早期多在城关地带建立据点，罗贯民在北关，付以民在南关，在具备一定信众基础之后才开始在城中建立教堂。城内教堂主要分布在西北隅和西南隅，与这些地区居民区较少，空地较多，人们对教会的敌视较弱有关。

此外，为减少传教过程中的阻力，西方传教士在华多以行医方式来吸收信众，清代洛阳城内有福音医院和天主教圣心医院两所，其中圣心医院在 1920 年迁至车

<sup>①</sup>据高元池、何肃然、贺廷栋：《洛阳建筑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 页，《公元 1933 年—1945 年洛阳县城地图》改绘。

<sup>②</sup>（民）苏从武：《洛阳县志》第十六章《宗教》，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sup>③</sup>吉素丽：《论基督教在近代洛阳的传播》，《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



站附近后，规模较大，占地五亩，有一幢两层楼宿舍和临街院等共 60 余间房。教会医院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洛阳的医疗状况，促进了传教活动的开展。

## 小 结

清代洛阳城人口数量同清代全国人口变化趋势相近，人口数量大致在两到三万之间，与豫西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密切相关。清后期，灾害频发，使得洛阳人口损失比较严重，至建国初期，人口逐渐恢复到清代乾隆年间水平。科举制度下，人们为寻求社会地位的上升而趋之若鹜，同时政府为加强对社会之控制，使得书院官学化程度加深，且向城市高度集中。东关地区回民亦形成其民族特色的经堂教育。儒学，作为政府实行文化职能的主要机构，其空间布局既考虑其主要集聚效应和与政治中心的结合，又注重环境等因素，故以城内东部和城关地区为主。清代洛阳城具有浓郁的信仰色彩，城内各类信仰设施，数量庞大，每种信仰建筑有其各自分布考虑，同时也在整体空间上形成了以西关和东关为中心的信仰区。清后期，西方传教士进入洛阳，并建立教堂等设施，因为地方社会的敌视态度，初期，教堂多位于城外关厢地区，后逐渐在城内设立，并有医院等相关机构。人作为城市核心之所在，学校、祠庙等机构皆需要一定的民众参与方可实施，人口分布状况对于其具有重要影响，却又不尽然。帝制时代，各类官方建筑从不同层面显示统治权威，占据大量土地，挤压居民用地，而学校、祠庙等建筑既需要相当规模的土地和较为优越的环境，却又不能脱离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社区，故各类建筑之间的集聚与背离状况较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当就其具体状况进行动态分析。此间，亦有例外如坊表者，其高耸的建筑，占据空间小，各类建筑尤其是旌节坊对于居民状况的反映，说明了城市建筑之间的联系性与指向性。



## 五、清代洛阳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与特点

城市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样，政治变动、自然灾害诸种因素会对城市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城市空间结构乃至社会面貌的变化。传统社会里的城市除为地方行政中心之外，往往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而成为区域交通与经济中心，进而集中区域内各项资源。洛阳因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清代河南地区诸多城市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要旨之一，即为分析城市的特点与性质，确定城市职能和地位，揭示区域城市结构，以促进城市的协调发展。此外，城市比较研究对于理清城市发展脉络，确定城市特色具有重要意义，西安与洛阳作为历史上重要的都城，一定时期总是相伴而生，唐代之后，两者逐渐衰落，却又因各自的区位条件的差异而在清代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通过对清代洛阳、西安的对比研究，以揭示清代洛阳城的具体发展状况和特点。

### （一）清代洛阳城空间格局的发展变迁

城市空间格局并非一成不变，因此对于清代洛阳城市空间格局状况，当从动态角度看其时空演变状况，且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化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动有密切关系。市镇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从上文可知，其与城内主干道的延伸有一定的关系，而市镇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也绝非仅限于经济上之联系，具有更广泛的互动关系。

#### 1. 城市功能分区的变迁

清代至民国年间，洛阳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比较缓慢，因此采用倒推的方法，由结果追溯起源，似乎更能说明变迁过程。民国年间，倪锡英到洛阳游览，对当时的洛阳城有相当全面的描述，在他的游记里对当时洛阳城的分区情况做了一定的介绍，因清末至民国洛阳老城变化较小，因而对于了解清末洛阳城市空间格局状况有巨大帮助：

洛阳城内和附郭，可以划分为五个区域，这五个区域，大概是这样分布着：

- 交通区——北关及北关外车站附近
- 文化区——西关内附近
- 政治区——西关外西宫附近



商业区——城中及南关附近

住宅古迹区——东关附近。<sup>①</sup>

倪锡瑛所述分区中之“政治区”乃民国初年袁世凯开始大规模修筑，至吴佩孚在洛阳期间所建之西宫兵营，后逐渐发展成为有别于老城，街道宽阔笔直，绿树成荫的新型城区。民国年间，政府和军事机关多分布于此。除此之外，其他四处在清代皆已有之。北关乃因1908年洛汭铁路开通及以后东西延伸线的完工而成为东西交通动脉，同样，铁路从运输效率和运量上皆优于传统运输方式，交通区自然便发生转移，且幅度在各功能区的变化中为最大。之前，洛阳城所凭借的交通方式为陆路，洛河水运只有在丰水期能上溯洛宁、卢氏，下至偃师、巩义，水运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东西官道并未横穿洛阳城，而绕走城南，南关地区因位于水陆交汇之地，在明清一直都是交通中转区，直到清末铁路开通才衰落下去。

清代，洛阳城最显著的特点乃是其宗教信仰发达，祠庙总量达100所以上，城区内基本上是“路口都有庙堂分布”<sup>②</sup>的程度，且祠庙类型较多，各自有其一定的分布规则，以官方主持之自然崇拜类的坛庙分布最具有规律性，而此类祠庙在数量上比重较小，故对于全城祠庙分布格局的影响不大。整体而言，环境条件和信众基础是影响清代洛阳城祠庙布局的两大因素。西关地区，因明代至清前期为河南卫属地，开发力度小，空余土地较多，形成以周公庙为中心，以儒学先贤祭祀为主的，兼及社稷坛、城隍庙，延伸至西门地区的信仰中心。东关地区则因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而成为以地方名宦和民间神灵崇拜为主的，不同于西关的信仰中心。城内则主要分布在分别以官署和府学为中心的东北隅和东南隅地区，但从祠庙的集聚程度和数量规模来看，不及西关和东关地区。西关地区尤以其祠庙的集聚性而傲视全城。清后期，洛阳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民生凋敝，民间祠庙多为颓败，惟剩西关地区祠庙较为繁盛，洛阳城的信仰中心由原来的东、西两关地区，变为西关一中心，且至民国年间有所加强。清代洛阳县城作为河南府附郭县，而有府、县两级官学，城内之书院也主要依附于官学附近，形成以府学为主，县学为辅的格局。清末改革学制，地方学校仍以旧有府、县学为基础进行改革，又因洛阳地区民间私塾之风牢固，基督教学校亦未兴起。清代，洛阳城的教育中心为以河南府学为中心，兼及周边大量私塾的东南隅地区。

清代，洛阳城政治空间格局的变迁主要集中在前期，明末，农民军将洛阳城夷为平地，府、县衙门皆荡然无存。河南府衙明代位于西大街北，清代成为城守营火

<sup>①</sup> (民)倪锡瑛：《洛阳》，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

<sup>②</sup> 耿彤：《老城历史上的庙宇、殿堂、祠堂、庵的概况》，《老城文史资料》第五辑，1984年。



药局,“闯寇乱俱毁于火,仅存元时瑞麦颂,隋唐朝市图及戒石碑。本朝初于城西南隅,寄治民舍。康熙二十八年(1689),知府汪辑移驻东北隅,旧提督府。在明福藩废府内。顺治间为提督府。康熙七年裁缺,堂名仍曰‘第一’”<sup>①</sup>。清初在西南隅,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移至东北隅。洛阳县署“万历四十二年(1614),修建福府,移城东北隅,迎恩巷之北”<sup>②</sup>,此后一直并未变化。县丞、主簿等僚属机构多位于府、县衙门附近。清代洛阳城的政治中心由原来较为分散,到东北隅中心地位加强。西南隅地区则以参将府及城守营的相关辅助机构为主,成为军事中心。

清代,洛阳城的商业中心一直较为稳定,以南关地区为主,涉及东南隅和东关部分地区。尽管清末北关地区铁路开通,但却未曾撼动南关地区商业中心的地位,只是城内十字大街两侧店铺逐渐增多,且形成了颇具洛阳特色的古玩市场。北关地区虽然有新式交通优势,但多以运输洛阳地区所产的棉花等货物为主,有一定的客流量,周边地区多为旅店和饭铺,未曾形成南关地区那般专业性强、品种繁多的商业中心。

居民区为城市分布最为广泛的功能区,在传统社会,居民集聚程度的高低可以作为区域发展的指标,当然,也必须注意区分居民结构情况。清代洛阳城整体的居住分区情况,从不同城区的里数即可看出一定的差别,具体而言,以东南隅、南关和北关地区为主,且这一地区集中了洛阳城的大多数富商、大族,以至上文论及的此一地区有许多深宅大院。西北隅和东北隅地区,居民分布较少,北部有大量荒地,清末才陆续有人居住,至抗战时期才人烟繁盛。北关地区因铁路开通,逐渐兴起了新安街等多条街道,居民数量也逐渐增加。整体而言,清代洛阳城的居民分布仍以南部和东关为主,至清末逐渐开始北移,但北部地区所占比重仍较小。

## 2. 城乡空间格局

城乡关系是市镇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的相关研究已由简单的关注市镇的经济职能,逐渐扩展至文化、行政等各方面。同样,有关市镇起源的研究,已经注意到明清时期赋役制度变革对于城镇兴起的作用及城市与市镇的互动关系。<sup>③</sup>因此,市镇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绝非简单的经济上的衔接而已,且不同地区市镇的成因也需具体探讨,不可一概而论。

清代,洛阳地区的市镇发展水平从上文可知,与当时全国平均水平接近,市镇与洛阳城之间的关系,从当时的行政区划上看,市镇并未成为县以下政区的中心,

<sup>①</sup> (清) 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志·署廨》,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②</sup> (清) 龚松林:《洛阳县志》卷二《地理志·署廨》,民国十三年(1924)石印本。

<sup>③</sup> (日) 滨岛敦俊著、朱海滨译:《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而是与其他村庄一样从属于里保之下。如谷水保有谷水镇，水南保有桃源镇，康家庄保有龙门镇，姬磨保有白沙镇。<sup>①</sup>由此可见，洛阳地区的镇在行政地位上与村庄无异，因而也就无法建立起市镇与城市之间所特有的行政联系。

洛阳城位于水、陆的节点位置，市镇多沿河流或陆路分布，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区内道路交通格局。山区的木材、山货，平原地区的棉花、油料作物皆需仰仗交通，永宁、宜阳、嵩县等地的货物经伊洛河或官道运至洛阳，北上山西或南下湖广。洛阳盆地内各镇，作为本区域内的集市，通过定期的集市，汇集本区内的棉花、粮食等物，输送至洛阳城内消费，或经由洛阳城内的客商店铺再转运至其他地区贩售，形成层级分明的市场网络，各自承担着不同角色。从县域角度而言，新安、孟津、偃师三县，距洛阳较近，且经济较其他县发达，与洛阳城的联系更为密切。

民间信仰和庙会游玩是清代洛阳城与周边城镇联系的重要方式，并且为双向互动。洛阳城中春季庙会繁多，城周边居民亦趁此机会参与到节日狂欢中，并置办一年中所需之物，尤其是农具之类手工制品。而乡村庙会因其特殊性而吸引城中居民参加，并逐渐形成市镇，以关林和白马寺为代表。关林庙会在明代时“每岁五月十三、九月十三，是日远近毕集，焚香者不论男妇，接踵而至，不吝数万余”<sup>②</sup>，且从历次修建关林庙的情况“乡城之殷实，而过客之好义，而外郡之闻风，咸踊跃输将，争先恐后”<sup>③</sup>，捐款人中洛阳城内商贾士绅较多看，洛阳城内居民参与程度可想而知。此外，每有官员途径洛阳，大多至关林游览，康熙四年，河南都督许天宠因关林“缘年久屋漏，其左傍侍者为雨滴所损，余游历之际，目击倾圮”，其捐资修建目的之一为“仕宦行商，道经帝墓者，望庙貌而拜礼，益生敬畏之思已”<sup>④</sup>。关林因清代关公信仰之兴盛而信众广泛，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提倡，祭祀活动与商业行为两者相互促进，扩大了关林庙会的影响力，同时也吸引了洛阳城及周边民众的参与。洛阳周边城镇中与关林相类似的为龙门镇，位于龙门山下，靠近伊阙，对岸为香山，交通位置重要，为洛阳南下至南阳的重要通道，且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北魏开始开凿之龙门石窟和香山上之寺院，加之白居易晚年在此定居，成为后世以文人为主的游览胜地。文人、仕宦的足迹密切了位置较远的龙门镇与洛阳城的关系。

清代，洛阳城与周边市镇之联系主要体现在经济与文化两方面，由道路格局而形成的经济联系构成城镇之间关系的基础，当然，治所城市与其所辖区域内的村镇必然具有行政关系，而由于镇在清代尚不具有行政地位，因此经济关系成为其纽带。

<sup>①</sup> (清)施诚：《河南府志》卷四《里保》，乾隆四十四年（1799）刻本。

<sup>②</sup> 明《关王冢施茶铸造铜炉金钟玉磬碑记》，郭挺彩：《洛阳关林志》，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sup>③</sup> 清道光十年《重修关林祠宇碑记》，郭挺彩：《洛阳关林志》，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sup>④</sup> 清康熙四年《重修帝傍侍者记》，郭挺彩：《洛阳关林志》，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独特的自然风光,使得关林和龙门成为洛阳诸镇中最为特殊者,其余市镇如翟镇、白沙镇等多以其重要的交通位置成为洛阳地区巨镇,规模甚至超过龙门镇,却只是府城的交通节点,发挥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无法成为龙门镇那样,与洛阳城在文化信仰上产生密切联系。

## (二) 清代洛阳城的性质与特点

与汉魏、隋唐洛阳城相比,清代洛阳城黯然失色,似乎一文不名,缺乏显赫的政治地位,灾害多发而经济落后,在时人笔下洛阳的城市形象亦是沧桑破败。而经过仔细分析有关清代洛阳城的资料,并与当时中原地区乃至中部地区的其他同等级城市相比,洛阳城所具有的优势依然明显。尽管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但在教育和宗教信仰方面的传统依然存在,并得到新的发展,经济方面因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西部山区的开发,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又因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西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商业往来的重要通道,山陕商人大量聚集,使洛阳城焕发新的生机。因此,有必要对清代洛阳城的地位做一定位,梳理洛阳城市发展的完整轨迹,这对于洛阳城市史而言至关重要。

### 1. 中原文教重镇

科举时代,读书不仅仅是学习求知之事,更成为获取社会地位、维护家族乃至地方利益的重要方式。同样,明代中期开始,因捐纳等风渐行,本已经困难重重的科举通道愈加拥堵。至清代中期,人口大量增加,应试成功几率更低,一方面使得士子决意科场,另一方面又使得人们更加重视这一教育、政治资源。上文已经提及,学额在明清时期对于各地方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成为相互争夺的资源,其逻辑为,增加生员名额,即有可能增加本地的取士人数。<sup>①</sup>因此,对比清代河南各地府学的学额情况,可以从官方视角审视河南府(洛阳城)在河南全省官学教育中所处的位置。<sup>②</sup>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河南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学额数量与江浙地区有很大差距,如靖江县学为25名,超过河南府学学额。

府州县学依据所在府州县人口、文化之发达程度,赋税数额之多寡,按学生员名额的多少分为大、中、小。进士数量是判断科举考试是否成功的标准,同样,进士作为经历儒学教育而取得成功的知识精英,其数量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衡

<sup>①</sup> 参见梁志平、张伟然:《清代府州县学学额及专设学额的运作: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1辑。

<sup>②</sup> 尽管府学一般是对于整个府级政区而言,但在传统社会治所城市往往也等同于行政区划,故河南府学之学额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洛阳城之状况。



量一个地区教育状况的标志。清代，河南地区共产生 1693 名进士<sup>①</sup>，位居全国第 6 位，总数比明代有所增加，名次也上升一位。<sup>②</sup>这一名次对于灾害频发的河南地区而言已是相当不错。通过比较河南各府州之间的进士分布情况，并结合各地的人口数量来衡量教育发展水平，可大致反映府级政区之间在科举制下的教育情况。

洛阳在清代河南地区的进士数量处于中等偏上的地位，而明清时期的比重，据郭林林研究，河南府明清两代进士总数为 234 名，其中洛阳一县就有 171 名，<sup>③</sup>占全府总数的 73%，可见洛阳在河南府内的绝对优势地位。这与洛阳为府治所在，集中府内主要的教育资源有关。从全省来看，清代洛阳城共有书院 14 所，作为官学的重要补充，书院亦以科举考试为主要目的，此不能不为洛阳地区成为河南进士分布较多地区创造条件。据王洪瑞研究，清代河南共有书院 292 所，河南府有 56 所，仅次于开封府<sup>④</sup>，但从县占有书院的情况来看，洛阳一县有书院 15 所，其中位于洛阳城者有 13 所之多，数量位居河南各县首位。

除去书院之外，洛阳城及周边还有数量庞大的私塾，时至民国初年，尽管经历清末学制改革运动，“私塾所在皆有且学生极多”<sup>⑤</sup>。作为洛学发源地，洛阳地区的理学传统一直未曾中断，明代洛阳名儒有尤时熙、吕维祺等多人，为当时理学中心，延至清代，理学传统犹存，却未出现如明代享誉全国的学者，一般之生员则皆志学之，如李永福“与同县刘温夫、郭尧民讲学一月，会母死”，李桐“家有小园，时花叠石，读书其中，足不入口市。有友数人，谈伊洛心性之旨”<sup>⑥</sup>。可见洛阳士子延续理学之风，但因科举之不成功，明代 121 人，清代仅为 50 人，故有影响者较少，却也能反映清代洛阳理学传统深厚。

## 2. 中原宗教重镇

清代洛阳城乡寺观、祠宇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城区范围内至少分布有 115 所祠庙，且类型齐全，佛、道、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皆有，清后期，基督教、天主教传入，民间信仰多样。城区有数量庞大的寺院、佛庵，白马寺和龙门石窟，分别作为佛教第古刹和艺术宝库而影响广泛，除去每年的定期佛会与庙会之外，途经洛阳的宦游行旅也多到两地拜谒，尤其龙门，自然与人文景观合一而成为洛阳最为著名之

<sup>①</sup> 由于名录记载的失误，有关河南进士数量不只此数，如曲剧、付春锋：《明清进士提名碑录清代河南进士校补》，《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第 4 期。

<sup>②</sup> (美) 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02 页。

<sup>③</sup> 郭林林：《明清河南进士籍贯地理分布初探》，《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 2 期。

<sup>④</sup> 王洪瑞：《清代河南书院的地域分布特征》，《史学月刊》，2004 年第 10 期。

<sup>⑤</sup> (民) 苏从武：《洛阳县志》第九章《教育状况》，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sup>⑥</sup> (清) 魏襄：《洛阳县志》卷四十四《道学传》，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地。嵩山位于河南府辖登封县，乃中原地区佛教与道教中心。每年“三月中岳庙会百姓贸易经营者十有八日”<sup>①</sup>，远近而来朝香参拜者络绎不绝，规模甲于中原绝大多数庙会。尽管距洛阳城有一定的距离，但多数官方祭奠多从洛阳出发，缩短了洛阳与嵩山之间的距离，也使得洛阳作为佛教名城的地位得到了加强。

明清时期关公崇拜，官方对于关羽的封号愈来愈高，以至于最后有的封号，关羽集武神、财神等多种信仰于一身。由于政府提倡和民间热衷而使得关林的影响和规模不断扩大。从现存的碑刻记载来看，清代对于关林的修建次数频繁，程度也为明代所不及。且为最高统治者所重视，除屡下诏令勤为修葺，遣官致祭或官吏率众祭拜外，清末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安返回北京途中，经洛阳而专程至关林参拜。关林的信众范围，从碑刻记载来看，涉及河南府辖各县，卫辉、开封、汝州等地信众捐款参拜，间有外省人士参与（多为商人）。整体而言，关林庙的信众多以豫西地区为主，形成此区域的关公信仰中心。

中原地区文化积淀深厚，鬼神信仰繁多，清中后期，灾害频发使得此信仰更为虔诚，整体而言，各地民间信仰皆为兴盛，类型亦大同小异。洛阳城因其信仰的普遍程度，居河南各府级城市前列，各类祠庙 100 余所，在 4.5 平方公里的城区内，密度达到 20 所每平方公里，且洛阳城区人口在清代河南各府城中适中，城区面积则较小，两者更加说明洛阳地区的信仰繁盛为他处所不及。且从民众的信仰热情来看，“本县迷信程度甚深……乡人妇女多拜天师马佛，此外有夫仙道拜仙，家有拜物教，凡略大之树皆以大仙所居，为之挂红立扁而祠之。此外，又有善道为佛、道二道之混合道，每逢庙会则支棚讲演”<sup>②</sup>，此为民国初年之情形，经历清末和民国初年的社会改良，民众的“迷信”程度尚且如此，清代的民间信仰繁盛程度从所记载之祠庙与庙会之频繁即可窥知一二。各类祠庙中，名儒、名宦的祠庙比重最大，反映出洛阳地区深厚的历史传统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清代洛阳城无论是从寺观祠庙的数量，还是民众的信仰程度而言，在河南地区都是相当显著。信仰的形成既要有强烈的现世需求提供契机，也须有一定的渊源来表明其权威性，在清代洛阳城，两者无疑产生巧妙的结合，因而也就形成洛阳城在清代河南地区宗教信仰重镇的地位。

### 3. 中原商贸重镇

明清四大名镇中，开封府下辖的朱仙镇名列其中，周家口亦因其位于水运要道，兼为漕粮北上的辅助通道而成为河南著名的商业大镇，赊店镇以其秦豫交界要冲而

<sup>①</sup>（清）陆继尊：《登封县志》卷九《风土记》，咸丰五年（1855）刻本。

<sup>②</sup>（民）苏从武：《洛阳县小志》卷十六《宗教》，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商业繁荣。学界对于清代河南地区商业的研究中多将豫西地区列为不甚发达之列，原因多归为多山地，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当然，在传统交通方式下，无论是运量，还是运费、效率，水路皆比陆运有很大优势。而豫西地区除去伊、洛河部分河段通航外，其余只有陆路交通，无法与豫东和豫南地区相比。

有关清代洛阳城的商业状况，许檀先生利用现存的山陕会馆碑刻资料对清中期洛阳的商业情况进行考察，根据商人捐款数额推算“清中叶洛阳商业的年经营额至少可达400到500万两”，同时，通过对捐款商号数量的分析，指出“丝绸、布匹、杂货是洛阳商业中最重要的行业”<sup>①</sup>。此为有关清代洛阳商业最为出色的研究，其研究主要关注于清代中期的商业状况，清前期和晚期因资料限制而未能论述，清前期尽管缺乏如会馆碑刻那样集中的资料，不过依然可以从有关文献的零星记载中看出当时洛阳的商业状况。从清中期开始，豫西地区的棉花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洛阳也因之成为棉花、布的重要交易场所，又因外国势力的进入，洛阳地区亦卷入更大范围的市场空间中去，据民国初年，“洛阳为河南西部都会，故商业殊有可观，以洋货、在洋布庄、京广杂货庄为多，每日输入箱包约二百余件以上。出口货以大布米麦为最多，布每日输出计在千疋以上，米麦多运李楼、铁谢等处，每不多数十车，计百石以上”，丝织业此时已经较为没落，尽管“口李养蚕者甚多，所出丝品，质亦佳”，但产量甚小，“年产额约两千余斤”<sup>②</sup>，根本无法与机器缫丝相比。洛阳城，作为区域贸易中转地的地位逐渐被铁路交通发达的郑州所取代，而成为较为典型的消费城市。

## 小 结

清代洛阳城在明代的基础上修建起来，城池规模与元明相同，城内各空间则在清初与清末有所变化。清初被战火夷平，府署位于西南隅，至康熙年间迁至东北隅，与县署相邻，构成全城的政治中心。北关地区因濒临邙山地区，清代大多数时间萧条，至清末因汴洛铁路开通而得到开发，承担起交通区的职能，而商业中心依然被南关地区所掌握，说明习惯对于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洛阳城在清代虽然为府级治所，却因其重要的交通位置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依然成为河南地区的文教、宗教和商业重镇。

<sup>①</sup> 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sup>②</sup>（民）苏从武：《洛阳县志》卷十一《商业》，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



## 余 论

清代洛阳城背邙面洛、左瀍右涧的地理形势，为城市建设提供了一个较为优越的条件。从历代洛阳城址的变迁路径来看，洛河发挥着中轴作用，不仅为洛阳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水源和交通条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的空间形态。洛阳所处的“天下之中”的位置，交通地位重要，因此，尽管宋代之后，城市地位下降，但从金、元、明和清代洛阳城的规制上来看，其军事防御功能突出，山河相间的形势也强化了其防御能力。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豫西山地开发加剧，洛河下游河段泥沙含量增大，而洛阳城所处地势与洛河水位高差较小，加之城北邙山作为历代墓葬集中区，植被破坏严重，发源其上的瀍、涧也因之而山洪多发，使得清代洛阳城水患颇为严重。城池体系、城内坑塘地貌和街道体系与沿河堤坝共同构成了清代洛阳城的防御体系。

城市，作为人类生活最为集中的空间，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相对于单纯的物理空间，城市的社会空间更具有可变性。社会空间建构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之上，在有限空间内高度集中地体现着人地的相互关系。清代洛阳城的政治、信仰、商贸空间等的分布与变化，虽然有一定的规范性因素的存在，但更多的是在城市历史传统和具体环境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务实选择。这在清初洛阳城内府、县衙位置的变化上体现的最为明显。作为地方城市，清代洛阳城为河南府衙与洛阳县衙所在地，府、县衙及其附属机构作为政治中心而构成城市的政治空间，但在清代位置的变迁过程中，国家礼制与政治权威的因素则影响较小。清初，河南府衙寄居民居，后又迁入河南提督衙门，而洛阳县衙则在明代因福王藩府的修建而迁移，反映出经济因素对政治空间布局的制约，也说明了当时政府较为务实的态度。

清代洛阳城的道路结构在隋唐洛阳城的基础上，随着城区的不断开发而有所扩展，切割和固定着城市的空间布局。基于交通通达性而形成的商贸空间则由明代官方设置的固定集市，向沿街店铺转变，集中于水陆交通便利的东南隅与东关地区。清末，由于洛汭铁路的开通，原来极为荒凉的北关地区才逐渐兴起。交通状况的改变对商贸空间的转移起着决定作用，从宏观而言，洛阳位于西北地区与东南地区的交通节点上，交通便利，但具体而言，交通最优处则在区域内由于技术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城区地形和道路交通格局也决定了清代洛阳城的人口分布状况，东南隅、南关和东关地区因其便利的交通和发达的商业而成为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此外，西北隅和东北隅则因其空间较为开阔、祠庙众多，及可提供较为优越的居住条件而



吸引一定数量的住户。人口的分布状况也在清代洛阳城内类型不同的房屋结构上体现出来，北关地区临近邙山而多窑洞，东西大街以北地区则以草房和瓦房为主，其南地区则多为世家聚居区，以宅院为多。

由于悠久的历史传统，清代洛阳城的文化较经济与政治地位而言，异常发达，不仅其进士人数在河南地区名列前茅，更体现在其地方文化的兴盛上。城区范围内，祠庙分布密度之高，超过了同时期的西安。宋代以后，洛阳地区理学传统兴盛，在官方支持、民众参与的情况下，西关地区因其较为优越的环境，形成了以周公庙为中心的儒学信仰中心，与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而以世俗信仰为主的东关地区遥相呼应。

相较于物理空间而言，城市社会空间的内涵则更加丰富，同样，城墙等建筑不仅作为国家控制和礼制权威的象征而存在，其本身也因对城市社会的影响参与到城市社会空间的建构之中，只是其可变性较小。就清代洛阳城而言，其城池规模在清初即已固定，但城墙内外的城市社会则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并影响城市的社会空间乃至物理空间状况。

本文于清代洛阳城的研究还相当粗浅，仍停留在对城市空间的简单描述，难以详尽其变迁过程，更无法对清代洛阳城社会空间进行动态地分析，对城市与其周边环境的互动关系的关注亦不充分。以上诸多不足，努力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不断地弥补。



## 参考文献

### （一）史书文集

- [1]（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 1976 年。
- [2]（明）陈子龙，徐孚远等编：《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 1962 年。
- [3]（明）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康熙二年（1663）刻本影印。
- [4]（明）吕维祺：《南庾奏议》，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 2009 年。
- [5]（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 [6]（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
- [7]（民）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 1977 年。
- [8]（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 [9]（清）龙文彬：《明会要》，中华书局 1956 年。
- [10]（清）夏燮：《明通鉴》，中华书局 2009 年。
- [11]（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 [12]（清）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 1992 年。
- [13]（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四部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 [14] 《清朝通志》，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8 年。
- [15] 《清朝通典》，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8 年。
- [16] 《清朝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8 年。
- [17]（清）郑廉著，王兴亚点校：《豫变纪略》，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 [18]（清）曹肃孙：《洛阳曹氏丛书》，《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148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
- [19]（清）田文镜：《抚豫宣化录》，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 [20]（清）刘喜海：《洛阳存古录》，丛书集成续编，台湾新丰出版公司 1989 年。
- [21]（清）汪阶：《中州杂俎》，安阳三怡堂 1921 年。

### （二）方志

- [1] 成化《河南总志》，胡谧纂修，成化二十二（1486 年）年刻本。
- [2] 嘉靖《河南通志》，邹守愚修，李濂纂，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刻本。



- [3] 顺治《河南通志》，贾汉复修，沈荃纂，顺治十七年（1660年）刻本。
- [4] 康熙《河南通志》，顾沂修，张沐纂，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刻本。
- [5] 雍正《河南通志》，田文镜等修，孙灏等纂，雍正十三年（1735年）刻本。
- [6] 乾隆《续河南通志》，阿思哈，崇贵纂修，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刻本。
- [7] 民国《河南通志》，河南通志馆编，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铅印本。
- [8] 弘治《河南郡志》，陈宣修，乔缙纂，弘治十二年（1499年）刻本。
- [9] 顺治《河南府志》，朱明魁修，何柏如纂，顺治十八年（1661年）刻本。
- [10] 康熙《河南府志》，张圣业修，董正纂，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刻本。
- [11] 雍正《河南府续志》，张汉纂修，雍正六年（1728年）刻本。
- [12] 乾隆《河南府志》，施诚修，童钰、裴希纯纂，乾隆四十四年（1799年）刻本。
- [14] 顺治《洛阳县志》，武攀龙等纂修，顺治十五年（1658年）刻本。
- [15] 乾隆《重修洛阳县志》，龚松林修，汪坚纂，民国十三年（1924年）石印本。
- [16] 嘉庆《洛阳县志》，魏襄修，陆继恪纂，嘉庆十八年（1813年）刻本。
- [17] 民国《洛阳县志略》，苏从武纂修，民国九年（1920年）石印本
- [18] 民国《洛阳县志》，雷福祥修，孙诒鼎纂，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稿本。
- [19] 弘治《偃师县志》，魏津纂修，弘治十七年（1504）天一阁刻本。
- [20] 乾隆《偃师县志》，汤倬修，孙星衍等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刻本。
- [21] 民国《偃师风土志略》，乔荣筠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石印本。
- [22] 康熙《宜阳县志》，申明伦纂修，康熙三十年（1691年）刻本。
- [23] 光绪《宜阳县志》，谢应齐修，刘占卿等纂，光绪七年（1881年）刻本。
- [24] 康熙《新安县志》，韩佑堂修，李瓚纂，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刻本。
- [25] 乾隆《新安县志》，邱峨修，吕宣增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刻本。
- [26] 民国《新安县志稿》，张钊修，杨堃纂，民国十五年（1926年）稿本。
- [27] 康熙《孟津县志》，孟常裕纂修，徐元灿增补，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刻本。
- [28] 嘉庆《孟津县志》，赵卓彤修，宋缙纂，嘉庆二十年（1815年）刻本。
- [39] 光绪《嵩县志》，龚文明修，陈奂如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增刻本。
- [30] 嘉庆《浞池县志》，甘阳声修，刘文运纂，嘉庆十五年（1810年）刻本。
- [31] 乾隆《卢氏县志》，李行修，侯肩负纂，乾隆十二年（1747年）刻本。
- [32] 光绪《重修卢氏县志》，郭广树修，李旭春纂，光绪十八年（1892年）刻本。
- [33] 乾隆《永宁县志》，张凯纂修，民国四年（1915年）石印本。
- [34] 同治《洛阳龙门志》，路朝霖纂修，光绪十三年（1887年）本。
- [36]（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中华书局，1994年。



- [46] (民国)李建人:《洛阳古今谈》,洛阳:史学研究社,1936年。
- [45] (民国)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
- [44] (民国)倪锡英:《洛阳》,南京出版社,2012年。
- [37] 洛阳市交通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交通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 [41] 洛阳市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地理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 [38] 洛阳建筑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建筑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
- [39] 洛宁县志编纂委员会:《洛宁县志》,三联书店,1991年。
- [40] 宜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宜阳县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

### (三) 文史资料

- [1] 洛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洛阳文史资料》第3、4辑,1988年3月;第5辑,1988年9月;第6辑,1989年6月;第12辑,1992年9月;第15辑,1994年12月;第28辑,2007年3月。
- [2] 洛阳市老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老城文史资料》第2辑,1989年3月;第5辑,1994年4月。
- [3] 洛阳市西工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工文史资料》第7辑,1994年2月;第8辑,1994年11月;第9辑,1995年12月。

### (四) 今人论著

#### 1. 著作

- [1] 唐凤纪:《洛阳今昔》,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
- [2] 萧燕冀:《洛阳史话》,中华书局,1980年。
- [3] 陈长安、宫大中:《洛阳关林》,中州书画社,1982年。
- [4] 林福瑞、陈代光:《河南人口地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 [5] 崔静一、冷文:《洛阳历代城池建设》,洛阳市地方志编委,1985年。
- [6] 贺官保:《洛阳文物与古迹》,文物出版社,1987年。
- [7] 张圣成:《河南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
- [8] 顾朝林:《中国城市地理》,商务印书馆,1989年。
- [9] 孟令俊:《洛阳古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 [10] 郑文华:《大哉古市新貌:关林庙会古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 [11] 陈长安:《关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 [12] 马雪芹:《明清河南农业地理》,台湾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
- [13]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 [14] 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 [15] (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
- [16]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 [17]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 [18] (日)斯波义信著、何忠礼等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 [19] 李振刚、郑贞富:《洛阳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
- [20] 赵金昭:《洛阳文化与洛阳经济》,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
- [21] 范天平:《豫西水碑钩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2] 刘凤先:《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 [23] 赵振华:《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朝华出版社,2002年。
- [24] 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大象出版社,2004年。
- [25] 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
- [26]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27] (美)林达·约翰逊主编,成一农译:《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28] 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 [29] 任崇岳:《中原移民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 [30] 张萍:《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
- [31] 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
- [32] 郭挺彩:《洛阳关林志》,三秦出版社,2007年。
- [33] 薛瑞泽、许智银:《河洛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
- [34] 胡云生:《传承与认同:河南回族历史变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 [35] 张民服、戴庞海:《豫商发展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 [36] 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
- [37] 史红帅:《明清西安城市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38] 刘景纯:《城镇文化与景观——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城镇文化的地理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39] 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
- [40]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视野》,三联书店,2009年。
- [41]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 [42] 栾莉舒:《白马寺》,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
- [43] 李炎:《南阳古城演变与清“梅华城”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
- [44] 李永文:《河南地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 [45] 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46] 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
- [47] 吴迪:《古都洛阳》,杭州出版社,2011年。
- [48] 齐渊:《洛阳新见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49] 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译:《清代地方政府》(修订本),法律出版社,2012年。
- [50] (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13年。
- [51] (日)斯波义信著,布和译:《中国都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 [52] 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低层看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 2. 论文

- [1] 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和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年第34卷第4期。
- [2] 黄明兰:《明朝伊藩王世系补正》,《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
- [3] 黄以柱:《河南历史城镇地理初探》,《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
- [4] 施其仁:《伊洛河流域暴雨主要特征及其成因分析》,《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
- [5] 黄以柱:《河洛地区历史经济地理简论》,《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
- [6] 王兴亚:《明代河南植棉业述略》,《河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 [7] 陈代光:《洛阳历史地理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1988年第1期。
- [8] 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
- [9] 陈铮:《清代前期河南农业生产述略》,《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 [10] 吴庆洲:《中国古代的城市水系》,《华中建筑》,1991年第2期。
- [11] 吴庆洲:《中国古城的选址与防御洪灾》,《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 [12] 赵广华:《明代河南科举与人才的消长》,《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 [13] 胡云生、张玮:《洛阳瀍河区的回回民族》,《回族研究》,1994年第2期。
- [14] 王兴亚、马怀云:《明清河南庙会研究》,《天中学刊》,1995年第1、2期。
- [15] 王兴亚:《明清时期的河南山陕商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 [16] 张民服：《明前期中原经济发展探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 [17] 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
- [18] 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 [19] 葛兆光：《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 [20] 曹树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
- [21] 严艳、吴宏岐：《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 [22] 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 [23] 张民服：《明代中原商路与商品经济》，《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
- [24] 邓玉娜：《清代河南集镇的发展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 [25] 田冰：《试论明清时期河南城镇发展的特点》，《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
- [26] 成一农：《清代的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 [27] 张民服、张鹏伟：《清代中原商路与城镇的发展》，《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 [28] 丁德超：《近代河洛地区农村庙市研究》，《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 [29] 丁德超：《近代豫西北农村集镇研究》，《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 [30] 李久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洛阳古都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 [31] 许檀：《明清商业城市研究感言：理论、资料与个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 [32] 屈寒飞：《洛阳金元古城城南地段保护与更新研究》，《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



- [33] 吉素丽:《论基督教在近代洛阳的传播》,《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 [34] 张战军、胡慧霞、郭全美:《中国古都的城市形象——以洛阳为例》,《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 [35] 李久昌:《区域权衡:古都洛阳崛起中的长安、开封因素》,《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 [36] 户华为:《关林之祀与明清洛阳社会的变迁——以关林碑刻为中心的考察》,《中州学刊》,2008年第6期。
- [37] 张丹:《洛阳庙会传承的审美意义》,《洛阳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 [38] 宋仑、李刚:《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 [39] 樊如森:《民国以来的黄河航运》,《历史地理》第二十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 [40] 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 [41] 万晔等:《河南黄河—洛河地区地貌结构与特征》,《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1期。
- [42] 毛阳光:《从〈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看民国洛阳时期洛阳的盗墓风气》,《四川文物》,2010年第2期。
- [43] 王巨:《谷水与洛阳诸城址关系初探》,《考古》,2011年第10期。
- [44] 宫万瑜:《洛阳周公庙与五贤祠的兴衰》,《中原文物》,2011年第2期。
- [4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三座伊藩家族墓发现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4期。
- [46] 霍宏伟:《洛阳老城十字街与隋唐城街道遗迹》,《考古》,2012年第8期。
- [47] 赵方方:《明清时期洛阳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国名城》,2013年第1期。

### 3. 硕博论文

- [1] 户华为:《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明清洛阳社会的变迁与士绅的应对》,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 [2] 张鹏伟:《清代中原商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郑州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 [3] 田莹:《隋唐洛阳水环境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 [4] 韩维鹏:《明清时期洛阳关林庙会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 后 记

最初知道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存在，缘于大一时在学校图书馆的一次闲逛，而后自由散漫地读书，使得自己对历史地理学有了比较肤浅的认识，心中便逐渐萌生了从事历史地理学学习和研究的想法。由于当时本科学校并无历史学专业，一些历史学出身的老师也因在市区与学校之间奔波而无暇指导，我凭着高中时积累的肤浅知识，下定了考研的决心，作为从事这一钟爱学科的途径。为了给自己打气，大三时便报考一次，无知者无畏，竟然勉强过线，更加坚定了我研习历史地理学的信念。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来华师读书，现在的自己是怎么个模样。三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一路走来，有过豪言壮语，也曾迷茫彷徨，至现在，才逐渐地寻找到努力的方向。

感谢导师张全明教授，在学习和生活中，给我以关怀和鼓励，使我得以初窥学问的奥妙，并顺利完成学业。三年来，我从王玉德、蔡靖泉、吴琦、黄尚明、冯玉荣等老师的课堂上，在环境史、区域文化、考古学、社会史等方面受益良多，由衷感谢各位老师在学习上所给予我的帮助。

孙颖涛、张崇荣、李锐、辛亚莉等同学的关心和帮助，使平日颇显枯燥的读书生活充满了乐趣，真诚的祝愿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未来。

感谢我的祖母、父母和兄长，祖母年逾八旬，依然关心我的学习，父母为了我们两兄弟读书，付出了太多，兄长的宽容和体谅使我少去了许多忧虑而能专心读书，家人的支持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张乐锋

2014年5月于南湖之滨